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1—2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14
	一、五四运动.....	1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7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
第二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	14—27
	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4
	二、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4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28—62
第一节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8—40
	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28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34
第二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40—51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40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44
第三节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	
	51—62
	一、国民党背叛革命统一战线	51
	二、两湖地区革命继续发展。陈独秀出卖革命	55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60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63—173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63—86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63
	二、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67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71
	四、反对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78
	五、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1
	六、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82
第二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86—106
	一、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	86
	二、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88
	三、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	93
	四、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95
	五、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96
	六、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101
	七、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03
第三节	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106—128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	106

	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全国有利革命形势的丧失·····	109
	三、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14
	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	119
	五、遵义会议——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的标志·····	124
第四节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128—138
	一、四渡赤水。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师·····	128
	二、党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	130
	三、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134
第五节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38—159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138
	二、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141
	三、红军东征和西安事变·····	145
	四、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50
	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	154
第六节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159—173
	一、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	159
	二、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63
	三、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一场斗争·····	169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九月）	

	174—274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74—201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	174
	二、洛川会议。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77
	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186
	四、《论持久战》的发表	192
	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被克服	198
第二节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粉碎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	202—229
	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202
	二、《〈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206
	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210
	四、《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214
	五、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人民抗日力量的大发展	222
第三节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斗争	229—244
	一、解放区的暂时严重困难	229
	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234
	三、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英勇斗争	238
第四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243—256
	一、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光辉文献的发表和整	

	风运动的胜利·····	243
	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252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	256—274
	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干 涉中国革命的斗争·····	256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64
	三、解放区的大反攻。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270
第五章	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 年十月）·····	275—362
第一节	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准备自卫战争··	275—295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形势·····	275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的发表·····	279
	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	283
	四、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 的破产。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290
第二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	295—317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295
	二、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302
	三、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310
第三节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317—337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317
	二、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和整军运动·····	321
	三、党的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的发表·····	325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国爆发的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五四运动是在列宁号召之下，是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爆发起来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打倒了沙皇，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世界就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处在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

十月革命以前，整个世界为帝国主义所统治，走遍天下，都跳不出帝国主义的魔掌。十月革命则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社会主义苏联，它震动了全世界，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

中国从一八四〇年以后，就被视为一块肥肉，所有帝国

主义国家都象恶狼一样扑向中国。中国遭到了侵占和瓜分，逐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

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救民，曾经向西方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说：“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窝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包围在中国北面数千里封疆的帝国主义锁链完全被摧毁了。这对中国民族是个大解放。十月革命喊出的“打倒世界的资本主义”、“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两大口号，对中国人民是无比巨大的鼓舞。中国人民沸腾起来了。人们到处都在议论列宁、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劳农专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先进的革命者，热情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

工具”。

毛泽东同志于一八九三年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村。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他在勤奋钻研古今中外的革命经验的同时，曾多次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考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创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从湖南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一面认真攻读马列著作，一面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革命真理。同年十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鲁迅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来了》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为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成为最先进的阶级了。

在中国先进分子的推动下，到一九一九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从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抛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激发了千千万万的优秀青年，向光明的前途猛进。宣传新文化的刊物《新青年》已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阵地，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拿起批判的武器，猛烈地向孔孟之道开火，激发人们起来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生气勃勃的局面。中国人学得了马列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民主革命已经

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的爆发点，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在大战结束前一年也参加了协约国，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当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提出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的要求时，帝国主义的这个“分赃会议”，不仅蛮横地拒绝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出卖民族和国家。消息传来，举国愤慨。

五月四日，北京十三所学校青年学生三千多人开始造反了。他们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冲击，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廿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订“廿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陆宗輿（订“廿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由北京开始的这一风暴，第二天立即席卷全国。湖南、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等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青年女学生和男学生一样，在这一斗争中，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做了反帝爱国的壮举。

毛泽东同志热情地称赞五四时期的青年造反有理。因为它“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青年运动的方向》）青年在这一运动中起了先锋队的作用。但是光靠它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工农大众。

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镇压的手段，逮捕成百

成千的人，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强。六月三日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首先是上海的纺织、机械、电力、市政、海运、印刷等各业六、七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斗争。接着沪宁、沪杭、淞沪等铁路工人罢工，使上海水陆交通完全断绝。接着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济南、武汉等地工人相继罢工。在工人罢工推动下，全国许多工商业者举行罢市。这样，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发展成为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群众运动。

以中国无产阶级为主力军的五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上海工人一开始即申明，罢工不仅仅是声援学生，而是要“格政府之心、杀灭亡之祸”，要反帝反封建。他们罢工期间得不到工资，生活极端困难，宁愿忍饥挨饿，仍然坚持斗争，表现了无比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中外反动派指使特务破坏，军警镇压，甚至帝国主义调动军舰麇集黄浦江口进行军事恫吓，他们也无所畏惧。外国巡捕企图撕毁革命标语，罢工工人立即捣毁他们乘坐的汽车，给予严厉的惩罚。在天津，集合了唐山等地数十万工人，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北洋军阀政府恐慌万状，在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强大斗争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官职，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件事震动了世界，帝国主义也开始感到中国人民力量的不可侮了。

在革命高潮中，毛泽东同志于七月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五四运动及时进行了总结，认为五四运动是作为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这一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使“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僻易”。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只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敢于造反，和反动派相对抗，就可以取得胜利。五四运动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拼命的飞跑。”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地指出，革命人民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只要革命人民努力奋斗，拼命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认识阶段，到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能够看出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看出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马列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工人阶级以自觉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中国的解放斗争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于革命的领导和领导者宇宙观的不同，革命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了不怕天、不怕鬼、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封建军阀的大无畏精神；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随着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一扫而光了。

五四运动教育中国人，只要实现民众大联合，以马列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武器，就可以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从五四开始，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自己的阵势，不断地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马列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在中国开始发芽、生根，并发展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反动军阀把马列主义的传入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封锁她。在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又主编《新湖南》。《新湖南》又被查封了。毛泽东同志就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马列主义是封闭不住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宣传马列主义的团体和刊物。譬如，在天津，周恩来、马骏等同志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恽代英同志在武汉组织了“互助社”，出版了《互助》。在成都、杭州、广州、开封等地，都有了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据统计，五四运动后，半年时间内，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已达到二百多种。

到了一九二〇年，马列主义的传播有了更大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第一次和中国人民见面，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成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列宁的《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一部分）、《一九二〇年三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书也都翻译过来了。毛泽东同志为了宣传马列主义，这一年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推销各种书报。这一书社在推动马列主义传播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
马列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传播就遭到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围攻。当时帝国主义的各种思潮向中国渗透。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等都到中国来“讲学”，作报告，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于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还有来自俄国、法国、日本的无政府主义都纷纷跑了出来。它们都标榜自己是最新的科学、最革命的学说。“主义”多得很。**“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马列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要经过战斗的。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年七月，混进五四革命统一战线的文化买办胡适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大毒草。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株大毒草，在理论上用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在政治上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他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实际上是不让中国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则是要中国人民实行他的“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毛泽东和李大钊等同志立即对胡适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彻底批判。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的中国，社会黑暗到了极

点，国家腐败到了极点，人民痛苦到了极点，它的崩溃是势所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是根本无济于事，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彻底铲除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要求新民学会树立起鲜明的马列主义旗帜。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树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同年九月，李大钊同志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认为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一大变动。”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要得到根本解决，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变革。“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戳穿了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这一论战也表明，五四时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分裂了。

继胡适之后，一九二〇年，地主资产阶级政客梁启超，张东荪之流，又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叫嚷“劳资合作”，说什么可以通过“教育”资本家的方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鼓吹“绝对自由论”，声称“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这两种反动思潮殊途同归，矛头都对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再次担负起批判的任务，严厉驳斥了这些反动谬论，他指出，张东荪之流口头上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却反对劳农专政，说什么通过“教育”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既“不妨碍自由”，又可避免“流血”和“战争”，这完全是用来骗人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但掌握着国家政权，而且掌握着教育权，他们实行的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反动统治培养忠顺奴仆的。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权，建立劳农专政，怎能取回教育权？而且资产阶级的本性是无止境的压榨

被剥削阶级，要他们放弃剥削，信仰共产主义，是绝对办不到的。凡是反动统治者，不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自动收场的。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决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不加区别一概否认国家政权的谬论，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人民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并要牢固地保持它。不如此，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同时，还揭露那些“故为曲说”迷惑群众的人们，如果不是糊涂虫，就是有意维护地主买办阶级反动统治的政客。

马列主义同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斗争，教育了群众，提高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的结合，锻炼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就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马列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起来的，是经过几年的理论上的准备的。从一九二〇年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积极投入建党的活动。

一九二〇年五月到十月，全国一些大城市，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出现了这样的组织。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通俗刊物都出版了。他们把立足点放在工人群众中，这是党成立

的先声。

为什么要建立党呢？立党为公，是为了革命。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党，人民要推翻敌人简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要把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一九二〇年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指导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经验，并组织会员赴俄学习马列主义。九月，以“新民学会”的左派为骨干，在“俄罗斯研究会”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十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同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并引导他们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开展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了解并掌握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小组成员深入工厂，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仅长沙一地，就在铁路工人、泥水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中建立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为发动工人群众，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努力清除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亲自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热情帮助和教育下，当时湖南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成为英雄的革命战士。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长沙大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步组织起来。五一节时，举办了数千工人的游行示威大会，并提

出了“加强团结”的战斗口号。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一个生动体现。

当时，在十月革命推动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许多国家中纷纷建立。但是破产了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国际资产阶级的需要，继续宣扬“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在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这种反动思想相呼应，反对在中国建立一个象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他们有的鼓吹“温和的革命”，主张以教育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走和平改良的道路。有的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鼓吹所谓“绝对自由”，否认一切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也在谈论社会主义，并且因为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思想。他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把马列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他看不见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一九二〇年五月，他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中还胡说：“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这些反动思想，成为建党的最大障碍。

毛泽东同志决定给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以致命的打击。从一九二〇年夏至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同志多次组织新民学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问题。在写给蔡和森同志的信中，毛泽东同志反复阐述了马列主义的观点，坚持列宁的建党原则。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只有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能有神经中枢。

毛泽东同志对“以教育为工具”的所谓“温和的革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种论调，听起来很动听，“事实上做不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共产党人不首先夺取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掌握教育权。要想用“说服”的方法让剥削阶级“回心向善”，去信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决不会自行收场，只能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它们。因此，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唯一正确道路。至于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总是保护剥削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权力，这种主义永远实现不了，只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才“最宜采用”。

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组织必须吸收有马列主义觉悟，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同志”入党。

一九二一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坚定声明：“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的根据”。

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这些光辉思想，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规定了建党的正确路线，指明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方向。这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成熟了。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员已发展到七十名。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十二名，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等同志。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大会共四天，因租界巡捕的搜查，所以最后一天只好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船上去进行。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

大会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时，曾经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合法主义的右倾观点，认为党是公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反对党从事工人运动，反对党搞阶级斗争，反对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一种是关门主义的“左”倾观点，主张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奋斗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一切公开形式的斗争，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应一概拒绝他们入党。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的意见。大会决定按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自己的组织。

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革命纲领，并作出了关于党的实际工作的决议。

大会确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群众的马列主义教育，积极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庄严地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鸦片战争开始，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最后都失败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第二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

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中国民主革命之中。至一

九二二年，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显示出它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党的第一个地方委员会——中共湘区委员会在长沙成立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培养党的干部的湖南“自修大学”也创办起来，还出版了《新时代》杂志，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党把工人群众相继组织起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工人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曾以主要精力深入到长沙各行各业及安源、衡阳、平江、岳阳等地工人中去，从事调查访问和宣传工作，了解工人的疾苦，启发工人的觉悟，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榜样，强调工人要团结，要革命，要自己起来奋斗，只有团结战斗，才能打败剥削者和压迫者。毛泽东同志还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一九二一年秋，毛泽东同志跋山涉水，徒步来到安源。安源煤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广大工人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剥削下，苦大仇深。毛泽东同志卓茅棚，下矿井，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破除“天命论”，使工人们认识到，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和官僚买办压迫剥削的结果。工人阶级要争取解放，就要组织起来，团结战斗。毛泽东同志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鼓舞着人们前进。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在群众中广泛传诵着。安源工人唱出了一首动人的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
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之，

打从湖南来安源。

提议要给办工会，

劳动工界结成团。

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安源开办了工人夜校，发展了党员。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路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同年五一节，安源工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下，举行了示威游行。

为了把各行各业工人迅速组织起来，毛泽东同志这时派郭亮、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瓚等同志深入工人群众中，长沙的铁路、纺织、泥木、人力车等的工会和党组织因此相继成立起来，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

铁路、矿山和海员是党进行工作的重点。在京汉铁路，陈潭秋、李汉俊、林祥谦等积极在江岸总段开展工作。一九二二年三月，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了。从此，党组织就自南而北发展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在此基础上，进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

工人阶级一旦有了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就充分显示了它团结战斗的精神和革命的彻底性。

斗争实践使党认识到，为了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就必须独立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这个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对中国重新加紧侵略之际。它们一方面支持中国军阀打内战，一方面于一九二一年冬到一九二二年春召开共同宰割中国和东方殖民地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对中国实行“协同”侵略，使中

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的买办阶级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唱赞歌。美帝国主义的忠顺奴仆胡适，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反动政治主张，认为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政府，则帝国主义不必打倒，封建军阀不必打倒，中国就可以得救了。他的罪恶目的在于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这是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列宁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两次发表的对华宣言，相继传到中国。宣言宣布凡沙俄时代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沙俄帝国主义政府“用侵略的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向中国掠夺的一切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这些虽因列宁不久去世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未能实现，但它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更加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心和决心。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大会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大会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

两种态度，两个会议，使中国人民从对比和鉴别中认识到，要得到自身的解放，必须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个代表，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大会发表了宣言，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工

会运动与共产党》等决议，修改了党的章程，并决定出版《响导》周报，作为党中央机关刊物。《响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蔡和森同志主编。它在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宣传党的主张和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制定党的纲领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宣言在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了我们党的纲领。

这个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个部分。最高纲领，即党的最终目标和主要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即党的当前奋斗目标 and 最近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个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它明确地规定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和当前的战斗任务；它第一次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它指明了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和排挤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能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这个纲领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的。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学说。列宁首先把

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民族区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在这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的基础上，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与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斗争，才能战胜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援助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并同它实现紧密的联盟，否则，一切企图实现共产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那就是空想”；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起就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就是根据列宁上述思想制定的。它是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二、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在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二大”团结战斗、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鼓舞下，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满腔热情地到工农群众中去，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指南。一九二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马克思诞生一〇四周年紀念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报告。各大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工人都活跃起来。党的秘密刊物在群众中流传着，各地的工人在夜校中和阶级斗争中，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提高了

自己的觉悟。毛泽东同志的《民众的大联合》是湖南许多厂矿工人的主要政治教材。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教育下，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已经严密地组织起来，进入全国政治罢工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预见到全国罢工高潮即将来临，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全国十二个城市百余工会都派代表来参加。工矿有安源、开滦各工会；铁路有长辛店、江岸、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城市有长沙、上海、武汉、济南、太原、江西等各处工会。这次大会在统一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与会代表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大口号的鼓舞下，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决心团结群众，加强联系，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去。

在第一次劳动大会召开之前，工人罢工的风暴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一九二二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从那以后，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达到顶点。历时十三个月，大小罢工一百多次，参加人数达三十多万。南自广东香港，北至河北山海关，东起上海，西到武汉，从产业工人到手工业工人，从成年男工到童工女工，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在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影响较大的在南方有：香港海员大罢工，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长沙铅印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等；在北方有：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唐山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矿山、铁路和航运等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得到了一些发展。战后不久，帝国主义立即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的摧残，中国人民“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而“倒悬于各帝国主义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中国工人阶级更是深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和剥削，在毫无安全保护的条件下，一般工作达十四小时，有的甚至长达十五小时以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中国工人阶级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力量。他们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展开了一次英勇的搏斗，谱写出中国革命史上一曲曲战斗的凯歌。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英国资本家多次拒绝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苏兆徵同志就领导全体海员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达三万多人。香港英国当局妄图用镇压的手段扑灭工人的斗争，竟封闭了海员工会，逮捕工人领袖和罢工工人，并企图实行武装镇压。工人们立即掀起了以恢复工会、保障工人政治权利为中心的激烈斗争。这样，海员的斗争就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支持和声援。香港的经济生活瘫痪了，变成了死港。罢工坚持了八个星期，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欺骗、镇压等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迫使香港英国当局取消封闭工会的反动命令，承认工会是代表工人的合法机关，释放了被捕工人，增加工资约百分之二十，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罢工取得了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完全胜利。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伟大斗争。它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为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到来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这次工运高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在工人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安源路矿当局企图用拖欠工资、封闭工会等手段对工人进行威胁和恫吓，并决定请赣西军阀派兵镇压，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纷纷要求罢工反击。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就要爆发了。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于九月八日再次来到安源，与安源党支部共同研究了当前形势，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定下了罢工的决心，并对罢工斗争作了周密的部署。罢工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信给安源党组织，指示他们关于罢工斗争的策略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号召工人同志们进行坚决的英勇的斗争，直到取得彻底胜利。这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窜到安源。他非常害怕反动势力，匍匐于反动势力之前，诬蔑罢工是“挺而走险”，蓄意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安源的工人阶级用革命行动回答了刘少奇“一反二压三贩卖”（即罢工前反对罢工，罢工开始后压制工人革命，最后出卖工人，向敌人投降）的机会主义工运路线。

九月十四日，震撼全国的安源大罢工爆发了。工人们高喊着“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同反动派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安源工人在敌人刺刀面前威武不屈，粉碎了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镇压和破坏，占领了矿井和锅炉房。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迫使敌人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党组织领导了罢工，罢工斗争锻炼了党组织。这次罢工后，安源路矿由一个党支部发展成十三个，成立了地方党的委员会。安源工人的组织力与战斗力越战越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是在安源大罢工和全国工人斗争的推动下举行的。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齐聚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进行破坏和镇压。工人愤怒了。二月四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声令下，三个小时内，京汉路全线实现了大罢工。工人们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为人权而战，为自由而战”等口号，涌上街头，举行示威。

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怂恿军阀政府用武力解决，武汉英领事直接参与屠杀罢工工人。二月七日，吴佩孚派出反动军警包围移至江岸办公的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三十二人，伤二百余人，造成了“二七惨案”。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施洋，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就义，表现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

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激起了全国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怒火。在党的号召下，立即掀起了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高潮。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举行了两万多人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暴行，捐款救济“二七”遇难工人；道清、正太、津浦、粤汉、京绥、京奉等铁路工人和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工人，举行同情罢工；香港、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工人和市民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积极声援和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共同的革命目标把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为了本阶级和中

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英勇奋斗。

“二七惨案”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野蛮镇压，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受到很大摧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只有安源工会“巍然独存”。

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悲观得很。毛泽东同志则从这些罢工运动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很集中，特别能战斗。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研究了由罢工高潮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重新部署力量，引导工人阶级坚持其所负的历史使命，继续前进。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罢工高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十分强烈地激动了成千成万的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当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后，他们就不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们愿意参加革命，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毛泽东同志非常生动地描述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态度：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根据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那时的革命，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课题。党在二大前后研究了中国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通过党员个人的接触和《响导》周报的批评帮助，促进他们的转变。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时代》创刊号上深刻地指出，要战胜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力量，结成一个革命联盟。一九二三年春，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到党中央，专门领导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出席的代表三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并制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和策略上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陈独秀不懂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他无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诬蔑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不承认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只能作为助手参加。他攻击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别树一帜”、“出风头”，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在党内的反映，它从右的方面取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刘仁静、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革命，农民和资产阶级不能进行民主革命。他们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这种观点否认无产阶级要有革命同盟军，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从“左”的方面取消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这两种倾向都背离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反对合作是不对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错误的。应该是既要合作，又要强调独立自主。三大通过的宣言正确指出：“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重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受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内忧外患更复加于两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以及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由于有独立自主的思想，规定我们党必须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发动和引导工人农民参加民主革命，注意警惕和阻止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的倾向，所以国共

合作后，工农群众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扰，大会对领导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反，还声称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陈独秀的这一错误后来发展到自愿放弃领导权的严重地步。

“三大”以后，我们党更加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加快了统一战线的步伐。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有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我党民主革命纲领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节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后，历史的车轮就经过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来。中国革命进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通过宣传和组织把各革命阶级、阶层和愿意革命的人们都动员起来，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党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运动上，在斗争中积极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以斗争求团结，不断扩大革命势力。

毛泽东同志利用统一战线这一有利的条件，指导着湖南、上海，特别是广东的革命工作，把党的方针、口号传播到群众中去，组织群众结成广泛的联合战线。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彭湃、韦拔群等同志会集广东，筹划

命革大计。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一九二四年夏秋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以陈延年同志为书记。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阶级开火。广东、上海、湖南等地的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在广州，党掌握了各行业及各重要工厂的工会，组成了统一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并组织了广州工团军。在上海——中国工人最大的集中地，工人阶级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在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东兰则组织了农民协会，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猛烈进攻，并且积极的要求武装自卫。农民自卫军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建立了我国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党支部。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工人从城市，农民从乡村都加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

从这时起，我们党也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性，派周恩来等同志参加孙中山主办的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把黄埔军校变成统一战线的学校。还选派了许多优秀党团员到军校中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及其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中国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认识到反帝反封建不能分割，处在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帝国主义是使中国以至整个世界不得安宁的祸根，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认识到除了军阀、地主买办等卖国贼和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以外，工农兵学商，都应联合起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在这样的基础上，普遍于全国的反帝斗争开始了。矛头所向，直指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协定成立，废除了帝俄在华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把沙俄崩败的史实，重新在远东确定一次，这更激发了中国

人民的反帝怒潮。

一九二四年六七月，广州沙面英国租界炮制“新警律”，不许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我党发动了沙面数千工人大罢工，广东、湖南工农商学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迫使英国低头认罪，取消这一律令。英国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十月，又唆使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团陈廉伯发难，阴谋扑灭广州革命势力。我党于十月十日再次领导广州人民举行了大示威，并推动孙中山先生对商团采取坚决镇压手段。十四日在工团军和黄埔学生军合力围歼下，一举歼灭了商团军，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破坏革命的阴谋。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指出，目前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在于广大人民组织起来，推翻直系，解除军阀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在革命人民伟大力量冲击下，直系军阀内部发生分化。冯玉祥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倒戈，占领了北京，并宣布倾向国民革命。我们党及时提出并发动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人民民主运动。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就越易于追随无产阶级参加到革命中来。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我党的主张，离粤北上，到北京召集国民会议。一路上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广东的反帝风雷激荡全国。党的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一九二五年三月，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代表参加了我党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各地工会代表成为会议的骨干，这就使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迅速传播到社会各革命阶层，把革命的火种散播到全国。

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反对帝国主义思

想和文化侵略的斗争成为这一浪潮的重要内容。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利用传播基督教、开办教会学校等方式，从思想上“蛀惑劫制”中国人民的罪行，撕毁了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纱。这一斗争在全国广泛展开，连偏远的城镇也参加进来。党通过这个运动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大大增强了革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一年多来形成的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群众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大发动，成为推动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因素。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这次大会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全国统一的工人组织机构。

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已经发展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在北起奉天（沈阳）南至广州的辽阔区域里，各行各业——从铁路到纺织，从人力车夫到菜园工人，都普遍举行了罢工斗争。这些罢工，少则几百人，多至数万人，互相呼应，连接不断。在斗争中有五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工会，形成有组织的战斗力量。农民斗争也方兴未艾。在此前后，湖南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一百三十六万多人。广东三十七个县六十二万人加入了农会。河南农会会员也发展到二十七万多人。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了。五月，上海的工人阶级揭开了高潮的序幕。

上海，当时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场所，也是中国工人最大的集中地。帝国主义的大亨们勾结中国反动军阀，

利用他们豢养的买办走狗残酷地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从一九二五年二月起，在刘华等同志的领导下，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就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在这一运动面前发抖的不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有英、美、法等国际的掠夺者。帝国主义妄图用武力把罢工镇压下去，这就使矛盾一触即发。

五月十五日，帝国主义者残暴地枪杀了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杀伤工人十余名。这一屠杀激起了全中国革命人民的民族义愤。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学生二千多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租界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英帝国主义竟野蛮地向群众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一面用机关枪屠杀中国人民，一面又劝诱中国人民“读孔圣学书”，实行“中庸之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也不听信帝国主义的任何说教，他们决定把反帝革命烈火烧得更旺。六月一日，上海二十万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五万学生罢课。在工人阶级推动下，绝大部分商人也罢工了，形成了全市轰轰烈烈的“三罢”运动。弄得洋鬼子没有面包、没有菜吃，洋行活动停滞，外国资本家愁眉苦脸，无可奈何。上海总工会很快成立起来，进而组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六月六日，党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要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而不要听信帝国主义关于“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六月十一日“工商学联合会”召开二十万人群众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提出的十七项条件，其中包括撤退外

国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自由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内容。

帝国主义这时用停止供电、借款等手段威胁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反帝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动摇，主张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买办资产阶级遂乘机拉拢民族资产阶级开市，破坏“三罢”运动。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反动军阀，武力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工会。但是英勇的工人阶级毫不屈服、毫不动摇，采取了新的策略依然顽强地坚持战斗。

五卅运动是坚决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证明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也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力量，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则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五卅运动极大地震动全国。反帝浪涛很快从上海扩展到北京、天津、长沙、汉口等地。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运动。湖南等地广大的农民群众也投身于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之中。这就构成了一幅全国革命高潮的宏伟壮丽的画图。

当时革命的广州曾给五卅运动以最有力的支持，而五卅运动也推动了广东的革命。一九二五年，盘踞在广东的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势力被迅速扫除，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起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中共广东区委为了扩大五卅运动成果，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发动了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一年零十个月之久，成为世界罢工史上的奇迹。

省港大罢工于六月十九日开始。香港罢工工人很快就增至二十五万，并纷纷返回广州。广州工人在罢工宣言中说，帝国主义者“食上海汉口青岛市民及工友之肉，即食我等沙

面工人之肉。上海汉口青島市民及工人一日不胜利，我等一日不返工。为上海案而奋斗，为解除我等自身痛苦而奋斗”。六月二十三日，广州罢工工人会同农民、学生、商人和革命军人团体举行十万人反帝示威游行。帝国主义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造成了血腥的“沙基惨案”。愤怒到极点的革命人民迅即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广州香港的罢工斗争，并组织了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封锁香港，使香港航运停顿，公共事业瘫痪，成了“臭港”、“死港”，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

在五卅运动所开始的革命新高潮中，中国社会各革命阶级迅速地觉醒和发动起来，以工农为主力军的革命力量愈战愈强。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显著提高了，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这些重要条件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势力，由小变大，迅猛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使广东成为中国的希望。

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威势引起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的仇视和恐慌。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魔爪，威胁引诱资产阶级，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妄图扑灭新兴的革命力量。资产阶级右翼老爷们，出于阶级的本性，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掀起了一股一股逆流。他们伪立名目、组织派别，还发明了些什么“主义”，进行反革命宣传。作为蒋介石政变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的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相继出笼。他们集中力量攻击共产党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反对统一战线，叫嚷“共产党占领了国民党”，要从共产党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戴季陶在孙

中山一九二五年三月去世后，阉割孙中山思想的革命内容，把新三民主义说成是以孔孟之道的“仁爱”即“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的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主义真实信徒的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暴露了他们反对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他们还暗杀了坚决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制造白色恐怖。右派的这些倒行逆施，是为了取消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改变孙中山的路线，开历史的倒车。

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从敌人对革命的镇压中认识到对阶级敌人必须实行镇压。他们联合革命左派粉碎敌人的捣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还查封了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报，镇压了一小撮右派分子。

在这一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给右派以猛烈的抨击。毛泽东同志主办了《政治周报》，并亲自撰写了很多战斗文章，指出当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并以第三国际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为“有力的后援”时，资产阶级的新老右派必然跳出来。他们梦想进行“不要外援欺压工农的‘独立’革命”，实现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但其结果却只能“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与戴季陶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阐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一天还有资本家地主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这种斗争就是无法避免的”，只有为资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才反对这种斗争。“爱”有鲜明的阶级性。工农群众只能爱自己的朋友，决不能爱压榨与剥削自己的敌人。不少地方的革命群众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罪行。这些斗争深刻地揭露和

打击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使他们的篡权阴谋不能得逞。

做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本应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中，可是他却在机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竭力掩盖阶级和阶级矛盾，对右派迁就姑息，胡说什么右派也是“以国民革命为目的”，共产党应该“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他硬是要给蒋介石戴季陶涂脂抹粉，把蒋介石这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封为“左派领袖”。不准揭露和打击右派的阴谋活动，生怕由此引起统一战线的“分裂”，甚至把已经被驱逐出广东的牛鬼蛇神又请了回来。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把革命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陈独秀的路线就是一条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相呼应的是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实际上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从理论上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陈独秀出卖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同志完成的。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思想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领导权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主要阐明了以下基本思想。

(一)要取得革命胜利，党就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分清敌和友。

毛泽东同志写道：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这就把路线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并且清楚地告诉我们，路线对革命的成败有着决定的意义。只有党坚持正确的路线，才能得到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那么，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这就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分清了敌友，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陈独秀不分敌我的路线，实质上是失败主义的路线。

(二)革命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

毛泽东同志说：“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作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同志热情赞扬党成立以来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伟大力量，高度评价他们在革命中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深刻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

别能战斗。”

无产阶级以其阶级的先进性和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革命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相反资产阶级早已失去了领导革命的资格。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全局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三）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重要最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说：

“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总之“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领导者只有有了被领导者，才成其为真正的领导者，才叫真正掌握了领导权。陈独秀张国焘之流，闭眼不见广大农民的革命性，他们或者向右投入了资产阶级怀抱，或者向“左”使无产阶级变成一支孤军，实际上都否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指出了农民这个无产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这就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在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上，从而在实际上保障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四）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动摇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指出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

“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在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怎样正确对待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就为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将上述思想概括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个光辉的结论，科学地奠定

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路线上理论上击破了陈独秀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去继续扩展中国革命，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举行更猛烈的进攻。

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著作，是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社会各阶级、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典范。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向，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策略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毛泽东同志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受到五卅革命运动鼓舞的中国人民就举行北伐战争，在全国范围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实现党的“二大”纲领而战斗。

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并领导了政治学校的工作。农讲所的任务是：第一搞农运，第二搞武装。毛泽东同志担任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还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著名报告。周恩来、肖楚女、陈延年等同志也在这里任教。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名学员在毛泽东同志的

教导下，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开展调查研究，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法，懂得了革命必须刀对刀、枪对枪、用革命武力消灭反革命武力的道理。农讲所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学员绝大多数由党派到湖南等地作党和农运工作，积极推动了革命和战争的发展。

北伐的武装部队也组成了。共八个军，称为国民革命军。军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党派遣李富春同志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在部队中，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明确了战争的目的，面目为之一新，充满了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因此，北伐军的作战方法也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

一九二六年五月，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遣军，挺进湖南。七月初，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把主攻方向放在统治湖北的吴佩孚身上。

关于北伐，早在一九二五年底，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是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进行北伐，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一伟大斗争。毛泽东同志还写信给湖南省委，指示他们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全力迎接北伐。湖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发动人民革命，并以湖南工团联合会为主，联合四百多个团体组成湖南人民讨吴战争委员会，展开大规模的革命行动。工农群众在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引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们不仅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后方，还直接参加攻城陷阵，与北伐军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进攻湖南泗汾的战役中，敌扼守铁江并置机枪于泗汾桥对河扫射。当地工人、学生组成的平民救国团

和农民武装队从两旁抄袭敌军阵后，用鸟枪、梭标等直接向敌阵进攻。敌人军心惶惑，叶挺独立团乘机猛冲过泗汾桥，敌军大败而逃。北伐军直趋长沙。郭亮同志领导长沙工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袭击守敌叶开鑫部。七月九日叶开鑫弃城逃跑。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的一千多人的保安队，消灭了自湘潭溃退入城的敌军，保卫了长沙。敌人退守平江岳阳一线。八月十九日北伐军总攻平江，农民携带各种旧式武器及锄头向敌人大举围攻，冒弹冲锋，敌军大乱。当天平江即被攻克。二十二日，岳阳也因农民带北伐军从小道插入敌后，出其不意实行猛烈攻击而占领。从此，北伐军推进到湖北境内。吴佩孚派重兵于汀泗桥凭险死守。叶挺独立团以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勇猛冲杀，机智战斗，一举突破敌人重兵顽抗的军事要隘，又乘胜追击，大破吴佩孚主力于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门户。九月，北伐军相继攻克汉阳、汉口。十月十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武昌城，全歼守敌二万余人，解放了武汉。盘踞在长江中游的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吴佩孚完蛋了。革命力量扫荡了中国舞台上反动政治势力一个有力的支柱，这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中国的军阀从此陷于动摇、纷乱与瓦解之中。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向江西发动进攻。由于方志敏同志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等斗争，创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组织基础，因此，北伐军进入江西后，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拥护和参加战斗之下，在短期内就击败了孙传芳十倍于北伐军的反动武装，使江西全省转到革命统治之下。

在革命阵营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敌人营垒发生破裂，这对革命是有利的。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而参加革命。四川军阀

杨森也投靠到革命力量方面来。统治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另一个走狗，此时也众叛亲离、土崩瓦解。他的部下大批倒戈、起义。革命势力势如破竹，由长江中游发展到上游和下游。

在革命胜利发展的高潮中，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汉口、九江英国租界，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北伐军逼近上海市区的有利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继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后，又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同志领导下，制定了起义计划，把全市划分为七个作战区并组成了各级指挥机构。起义前，铁路工人发动大罢工，断绝敌人对上海军阀部队的援助，使上海守敌更加惊慌失措。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开始。八十万工人同时实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各区武装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分头向敌军及各警署进攻。群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与敌人展开肉搏巷战。入夜，除闸北外，六个区战斗胜利结束。全市工人武装立即进攻闸北，经一夜激烈战斗闸北也被占领。

在工人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密令进抵上海附近的白崇禧按兵不动，企图坐观工人失败。但是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不仅迅速地完成了从军阀手中直接夺取上海的艰巨任务，而且卓有成效地维持了上海的革命秩序。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比的战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自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仅半年多时间，革命军民就在

胜利的北伐战争中消灭了几十万反动军阀军队，打垮了英美帝国主义的两个忠实走狗吴佩孚和孙传芳。毛主席曾热情地歌颂这次战争：“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论联合政府》）

为什么北伐战争能够如此迅速地获得胜利呢？

1.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学会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化，奋身而起，打碎奴隶枷锁，积极投入革命，直至用武装起义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手中夺取政权，因此才保证革命力量能够“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

2. 党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在军队中灌输了革命思想，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形成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直接搏斗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极大地增强了革命力量。

3. 党在北伐战争中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在军队中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改造了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骨干作用，有力地带动和影响了北伐军作战。特别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铁军”——叶挺独立团，更是功勋卓著，对推动整个战局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这就是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广州出发向长江流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历史的

前进。

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在长江一带视察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浙江、福建等省的农民运动在猛烈地发展着，到处都在大造地主阶级的反，天下大乱。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一直得到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密切关注，毛泽东同志曾屡次指示湖南省委以极大的努力开发农民这个“革命宝库”。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和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同志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从广州农讲所回到湖南的大批学员又都站在斗争第一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因此湖南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旗帜和中心。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举行。毛泽东同志应邀出席并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指出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并严厉驳斥了所谓“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谬论，号召农民结成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联合战线，以打倒革命的敌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大大鼓舞了湖南全省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和宣言中明确规定，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的民主政权。他们说：“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害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

在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指引下，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使湖南等省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农民推倒了孔庙，拆掉了节孝坊，砸烂了木菩萨。几千年来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族权、神权、夫权受到猛烈冲击，尤其是被封

建礼教压迫得九死一生的妇女，也开始抬起头来做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采用清算、罚款、大示威等手段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坚决斗争，直至组织人民法庭，审判处决罪大恶极分子，使地主阶级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政权随之倒塌。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运动兴起之处，农会的梭标队迅速发展，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的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在经济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平抑谷价，管理粮食，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奸商和地主囤积居奇，以保障农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此外，还扫除各种社会恶习，开展各种建设，改造农村。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他们大办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平均每乡都有一所。广大农村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新景象。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地主资产阶级忧心忡忡，深感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这时鼓吹农民应该同地主“联络感情”，只须“把自己所耕的土地做得十二分好”，而不应去造反闹革命。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兼北伐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看到自己的亲戚故旧、同僚部属被农会到处捕捉，恨得咬牙切齿，叫嚣非“取缔”农运不可。他们疯狂攻击农民运动是什么“痞子运动”，“破坏社会秩序”，“扰乱北伐后方”等等，在他们看来，农民运动完全是“糟

得很”！反动分子们制造谣言说，“官兵寄回家的钱被农会没收分配了”，挑动北伐军和农民冲突，还组织地主武装，勾结反动军官，捣毁农会，捕杀农会干部，甚至进行公开武装叛乱。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他们被农民打翻了的“天堂”，搞反革命复辟。

陈独秀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潮流所吓倒，搬出了孔老二的“中庸”、“忠恕之道”，限制和反对农民运动。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泡制的“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案”中就规定，不许农会“带有阶级色彩”，不许农民“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不许农民收缴地主武装和建立自己的常备武装。公然提出要“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继续维持封建地主的统治。革命农民不理他这一套。陈独秀就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屁股后面暴跳如雷地斥责农民运动“过分”、“乱来”，还摆出架势叫嚷要“纠偏”。

很显然，农民问题已经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实际上是一场坚持革命还是实行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政治斗争。

为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进攻，继续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三十二天的实际考察，并写成了光辉的马列主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以极其丰富生动的语言描写和总结了湖南农民革命的经验及其伟大成果，热情歌颂群众的革命创造，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坚定地表示这场农村大革命好得很！全然没有什么“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在

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主要阐明了以下基本观点：

（一）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认为，目前正在广泛兴起的农民运动是一场极其伟大的革命。他说：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完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必须经过激烈的大变动，因为：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基于上述观点，毛泽东同志对所谓农民运动“糟得很”和“过分”的议论予以痛斥：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一些人的所谓‘过分’……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清楚地划分了革命和反革命，马列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界。不仅戳穿了反动分子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的卑劣用心，而

且彻底揭露了陈独秀在貌似“中庸”的伪装下充当地主资产阶级帮凶的丑恶面目，有力地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二）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是农民革命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原理运用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中，指出，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是革命的首要任务，他说：

“农村革命是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保证是“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他认为已经出现的广大的农会梭标队就是这样的农民革命武装。毛泽东同志写道：

“这个广大的梭标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标，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标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陈独秀不许农民建立常备的武装组织，不许农民武装“干涉行政”（即打倒地主权力），怕因此会吓退了资产阶级，破坏了统一战线。陈独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斥责的那种“胆小鬼”。

（三）必须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孔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个极大的绳索。”反动的孔孟之道就是这“四个绳索”的精神支柱。农民运动

兴起之后，不仅推翻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而且必然触及各种封建宗法制度，对孔孟之道进行革命的大扫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批判了孔孟之道的革命农民，思想更加解放，觉悟更加提高，他们“不信天命信农会”，“不信天命干革命”，从而有力地促进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描绘这一深刻变化的情景时写道：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这里，毛泽东同志就指示了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真理：革命必须批孔，批孔推动革命。

（四）贫农是农村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村大革命的先锋。毛泽东同志说：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由此，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

坚定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篇都贯穿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革命思想。她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的大风浪中不转向，不迷航。如果坚持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把自己看成救世主，视群众为群氓，就必然从思想感情到政治立场都与群众相对立，为革命群众运动所淘汰。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她有力地驳斥了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农民问题上的严重危害，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大革命，为革命的继续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的伟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对于彻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和确定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 第一次大革命

一、国民党背叛统一战线

北伐战争的胜利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吓得国内外反动派目瞪口呆，也威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更加高涨起来，帝国主义支撑卵翼下的军阀，对人民大革命已经镇压不了，也阻挡不了，帝国主义就用屠杀群

众恫吓革命。还在一九二六年九月，英国军舰就炮轰万县，屠杀中国人民五、六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国主义的军舰向南京开炮，打死打伤我国军民二千多人。但就在这时，英、美等帝国主义又纷纷宣布对华新政策，摆出伪善的面孔，声称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说什么中国“关税应有自主之权”等等。

帝国主义使用了各种手段来扼杀中国革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并且交错使用。当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即将复灭，武装干涉又对它非常不利，于是加紧分化革命阵营，在革命阵营里寻找代理人，从内部破坏革命。他们看中了窃取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新右派头子蒋介石，便命令它的高走狗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把蒋介石拉出去。

蒋介石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一九二四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但他却伪装革命，耍两面派，一面口喊革命，一面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五月炮制了“整理党务案”，十一月在南昌建立了反革命中心，策划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事件。而亲美派政客王正廷，亲日派政客并和北洋军阀有密切联系的重要角黄郛、张群、江浙财阀虞洽卿，纷纷跑到南昌与蒋介石谈判反共条件。一心想篡夺北伐战争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在取得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阶级的支持后，随即加紧了贩卖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蒋介石先后发表两次反共演说，诬称“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并开始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捣毁工会、农会及左派掌握的国民党党部，一直屠杀到上海，以博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欢心。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从直鲁联军手里夺取过来的。在上

海工人举行第一次第二次起义时，北伐军蒋介石所部已进至上海郊区，但却趑趄不前。第三次起义胜利后，蒋介石立即进入市区，抢夺胜利果实。并向帝国主义表示：“保证与租界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帝国主义立即答应，驻上海的三万多外国侵略军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并送给蒋介石一张特种通行证，允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上海大资产阶级虞洽卿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的犒赏。青红帮头子黄金荣等则答应给蒋介石组织流氓打手，供他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蒋介石有了帝国主义作靠山，有了买办资产阶级供给经费，又有了流氓打手，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四月二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等人提出一个所谓弹劾共产党总文告，为发动政变制造舆论。接着，秘密召集多次反共会议，部署力量，成立了戒严司令部，宣布禁止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实行新闻检查和封锁，竭力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

党已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陈独秀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反而粉饰太平。四月五日，他和参加蒋介石秘密反共会议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乔装打扮，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和摧残工会之事”，并要群众和这个独夫民贼“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不讲反帝反封建，不讲打倒土豪劣绅，不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等于替蒋介石解除党和群众的思想武装。

蒋介石正是利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

镇压。十二日凌晨一时，蒋介石指使青红帮流氓臂戴“工”字袖章，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自卫还击。蒋介石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并对工人进行疯狂屠杀。由于事前没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二千七百名工人纠察队被全部解除武装，队员死伤三百余人。

面对着蒋介石的屠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党的干部率领广大群众开展反蒋斗争。四月十三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群众大会，一致决议：收回工人武装，严惩祸首，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通电全国全世界。会后群众冒雨游行，高呼“还我武器”、“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队的屠杀。工人牺牲者一百多人，伤者不可数计。到十五日，工人被杀者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多人，流亡失踪者五千多人，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在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查封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二千一百多人。肖楚女同志就是这时牺牲的。

在北方，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与蒋介石相呼应，血腥屠杀革命者。四月六日，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二十八日，李大钊同志被反动派绞杀。

国民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和他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大会时订立的革命三民主义，屠杀人民，投靠了帝国主义。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权。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蒋介石

石暂时地得势了。毛主席曾严厉痛斥国民党的叛变：“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贩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论联合政府》）

二、两湖地区革命继续发展。陈独秀出卖革命

蒋介石的叛变使革命遭到局部失败，但并不能决定革命的全部命运。蒋介石当时统治的范围主要的是苏浙皖等省。两湖和江西还在革命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部分资产阶级还没有公开举起叛旗，但实际上革命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来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筹建并主持了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集中宣传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农民运动已深入发展到要求土地的阶段，必须大力建立农民武装，巩固农村政权，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亲自给农讲所学员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指示学员要主要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和农民武装问题。

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着。党领导的全国工会会员达三百万左右，仅武汉工人纠察队就有五千人，枪三千枝。全国劳动童子团也发展到十五万人，并且用木棍等武装起来。工人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

进到要求参加政权；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进到要求参加国有企业的管理和对资本家企业实行监督。同一期间，农会会员增长到九百多万，其中湖南五百一十八万，能影响的人数在一千万以上。湖北农会会员二百八十万。两湖广大农民普遍摧毁了地主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武装发展极快，仅湘乡一县农会就有梭标十万枝，潭湖七、八万枝。不少地方农民夺取地主团防的枪枝，组成农民自卫队中的常备队。革命农民依靠手中的政权和武装，丈量、插标、没收分配地主耕种的土地，使农村大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

湘鄂赣三省工农群众在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指引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高潮。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央农讲所八百多名学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严惩蒋介石，下午召开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革命人民下定决心，向反动势力进攻。四月初，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清除了隐藏在农讲所内部的反动分子三十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四月二十六日，长沙二十万人民集会，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湖南省总工会揭露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八十条，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湖北省农民协会在讨蒋通电中写道：“誓率领全省一百五十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及全省农民，联合全国革命界同胞与此獠决一死战……”。江西四十万农民通电声援上海工人。武汉三十万革命群众举行反蒋大会。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工农群众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

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北伐军在河南击溃了奉系军阀的主力，取得很大的胜利。

这时，我们党直接领导和可以控制的军队已有三、四万人，其中有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和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等。

但是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被土地革命所吓倒，继续“四·一二”前的反动论调，污蔑工农运动是“无组织无行动”，千方百计压制工农运动，特别是压制农民运动，甚至阻止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上发表。陈独秀下令“纠正”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行动，还要在国民党内工作共产党员必须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和指导。陈独秀的所作所为，灭无产阶级志气，长地主资产阶级威风，使潜藏在武汉地区的反动势力乘机猖狂向革命进攻。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次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迅速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重要提案。但大会在陈独秀把持下，拒绝讨论这些正确意见。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由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在提交大会批准时也被否决。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竟然把毛泽东同志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甚至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表决权。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斥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决议，但是仍然选陈独秀做党中央的总书记。陈独秀依然顽固坚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蒋介石勾结广东、四川等地反动军阀向武汉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和颠覆。武汉革命势力最大的一个错误是把和蒋介石狼狈为奸的汪精卫请出来、封为“左”派领袖，幻想与他“合作到底”。汪精卫在“左派”桂冠掩饰下，与蒋介石里应外合，破坏革命。从查办“过激”言论，到公开申明保护地主利益，到强令解散农民协会，步步紧逼。陈独秀则步步退让。

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又指使反动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两会一切附属机关，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可是，陈独秀对此仍然无动于衷。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农讲所学员，配合叶挺指挥的革命军，给夏斗寅以坚决反击，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当时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把叛军消灭干净。可是陈独秀却为了“不破裂合作”，不许追歼。“马日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赶回湖南，与郭亮等同志一起在浏阳北乡召开会议，决定动员和组织长沙周围各县农民迅速武装起来。五月三十日，十万武装农民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长沙。他们高呼着“梭标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革命口号，坚决要粉碎许克祥的叛乱。许克祥只有一千人枪，龟缩在长沙城里。农民军斗志昂扬，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陈独秀却下了一道罪恶的命令：“农民不得进城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结果，敌人乘机增派军队，肆行屠杀。十天里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

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换得的是敌人反革命活动的更加猖獗。六月六日，江西省长、反动军官朱培德在江西驱逐共产党人，宣布“停止全省的工农运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将军队从河南前线调回武汉镇压革命。六月十九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徐州开会，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

形势一天天险恶，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为了挽救危急中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坚决斥责陈独秀投降主义，主张对反革命的武装镇压针锋相对，进行斗争。

建议中央及军委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坚决反击敌人，不作“鱼游釜底”。当时我们党掌握的军队加上武汉工人纠察队及各地工农武装，完全可以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统一的革命武装力量。但是，这个英明的主张遭到陈独秀的拒绝。共产国际在对中国的紧急指示中，要求迅速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一支可靠的军队，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和改组国民党中央，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陈独秀不仅不执行，而且扣压文件，封锁这些指示。挽救革命的最后机会又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丧失了。

六月三十日，不可救药的陈独秀操纵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要我们党完全放弃革命领导权，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当然处于……领导地位”；要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以避免“政局之纠纷”；规定“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这个决议，实际上是陈独秀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

陈独秀为“避免”和反革命派“冲突”，竟然自动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时，在五卅运动期间就已叛变革命的叛徒刘少奇、伙同向忠发，利用他盗取的湖北省总工会领导职务，积极推行陈独秀路线。他们把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枪支弹药，连同童子团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齐，拱手交给汪精卫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刘少奇被汪精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汪精卫提供“工运情报”。同时，汪精卫又将刘少奇假“逮捕”，指示刘“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刘少奇表示“竭尽全力以赴”。刘少奇还向汪精卫集团密告我党在“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要汪贼“速除”。

刘少奇是不折不扣的叛徒、内奸、工贼。

七月十四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了“反共”和大屠杀的计划，十五日，公开叛变革命。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危害，面对大资产阶级的突然袭击，革命人民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被葬送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年后，就领导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发动了广东战争、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一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党是生气勃勃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革命积极性非常之高。我们党依靠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举行了革命战争。革命势力由弱小变得强大起来。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

但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即这个阶段的后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自愿地放弃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这次革命遭到失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俾

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以能够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陈独秀在革命高潮中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拒绝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陈独秀利用职权，实行家长制统治，组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强制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那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而革命又猛烈地发展。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因此在这次革命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极端重要。在这个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和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心骨干。其结果，就不能分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就不能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因此，只有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战胜机会主义的袭击，夺取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村大革命。无产阶级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不是

“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证明，反帝反封建必反孔。孔孟之道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封建势力的护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思想基础。反帝反封建和反孔斗争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只有把反帝反封建和反孔斗争结合起来，打倒孔孟之道，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意识形态，打烂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孔孟之道的思想绳索，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才能夺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胜利了才能巩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它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种子，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当我们党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反革命王朝。“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论联合政府》）

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政权，是在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阶级实质上它和旧军阀政权一样，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但是，它比旧军阀的反革命统治更加残暴、更加凶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使奉系军阀在东北“易帜”归附他。至此，它在形式上暂时“统一”了中国，逐步建立了一支包括二百个陆军师及部分海、空军的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建立以CC系和蓝衣社为骨干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渗透在各个部门。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残酷地吮吸着人民的膏血，逐渐形成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最反动的一个法西斯王朝。

蒋家王朝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搞复辟的孔孟之道，并将这个复辟、分裂、卖国之道同基督教、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内容庞杂的反动思想体系，作为维护其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端尊孔的反动大儒，他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便亲自跑到曲阜朝圣，吹捧孔老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老二成了蒋家王朝顶礼膜拜的偶像，孔孟之道成为这个反动王朝的“党魂”、“国魂”，这完全是为了适应他们一次反共反人民复辟卖国的需要。历史上尊儒反法的信徒，在政治上都是复古派，在外交政策上又都是投降派。蒋家王朝是一个卖国王朝，蒋介石就是一个大卖国贼，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充当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他一上台，便接二连三地向帝国主义表示自己的忠顺。一九二七年九月，他携带亲日派政客张群访问日本，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换取日本对自己的支持。十一月，又通过美国大买办宋氏家族和美国签订美蒋关系密约，进一步和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竟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英美等帝国主义表示歉意和赔款。同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民一万多人，蒋介石又无耻下令不准抵抗，甚至提出“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政权投降卖国的反动面目。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在经济方面，对华投资显著增长：一九一四年为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到一九三一年竟增加到三十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帝国主义加速对华商品输出，使中国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为九千四百三十一万海关两，

一九三一年便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帝国主义还派遣了大批“顾问”，直接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部门，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蒋介石反动政权，对内则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它首先采用灭绝人性的“斩尽杀绝”政策，妄图以此扑灭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的五年中，被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达一百万人以上。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运动的领袖，如罗亦农、向警予、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在这个时期先后英勇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广大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经济权利，被剥夺干净。革命工会被解散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积极分子被大批开除，工资下降，工时延长。如武汉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工资，劳动时间由十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被迫害，土地更加集中，赋税空前繁重。如江苏许多地方的附加税，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正税的十倍到二十六倍，湖南则超过十倍到三十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由于苛捐杂税成十倍地增长，日益走向破产。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处在无权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受到新的打击，濒于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如上海民族资本的工厂，一九二七年后的四年间，倒闭、改组的达五百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摧残下，革命的主观力量大大削弱，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党员人数由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工人斗争暂时被镇压下去，当时尚有斗

争也只是防御性的。工会会员由二百九十万减少到三万人左右。农民运动常常是此起彼落，处于散漫而不集中的状态。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人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井冈山的斗争》）另外，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反对工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营垒，革命营垒中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力量的缩小和工农运动的低落，表明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

但是，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重新到来。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但一个没有解决，而且愈来愈激化。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总代表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对工农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把他自己摆在了与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人民为敌的地位，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因此，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打击下，也对蒋介石的统治表示不满。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虽然貌似强大，但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一九二八年底，它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它的内部始终是四分五裂。所谓国民党，就有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等等派别；所谓国民党新军阀，也有蒋、桂、冯、阎等系和各省许多小军阀。这些军阀和国民党的各派，在各帝国主义指挥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连年混战不休。这就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统治力量，给革命

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因此，革命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高潮是没有疑问的。

当时，摆在我们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奋斗，继续革命，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就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正确分析形势，深刻总结经验，抓住主要矛盾，指明前进道路，并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将革命逐步引向胜利。

二、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蒋介石、汪精卫以及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懂得了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战争和战略问题》）

为了挽救革命，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军和南昌军官教导团，共三万多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一点，在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贺龙等同志指挥下，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三、四小时的激战，歼灭了全部守敌，革命红旗飘扬在南昌城。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召开了五万人的群众大会，颁布了革命纲领，发表了宣言。

南昌起义虽然实现了，但起义的领导机关没有认识到武

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因而起义之后，仍企图重新占领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并指望首先打通海口，取得外援。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向南进发，经江西的临川、广昌、瑞金、会昌，进入福建的长汀、上杭，再进入广东的潮州和汕头。九月下旬和十月初，这支没有根据地作依托、没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的孤军，虽经英勇转战，终于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在汕头以北的汤坑、揭阳、乌石等地遭到严重失败，部队大部分失散了。剩下的部队，有二十军的一部分退至海陆丰；以二十五师为主的一部分部队，在三河坝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后，由朱德、陈毅同志带领，退出广东，经过江西的大庾、崇义和广东北部，进入湖南南部坚持斗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一面鲜艳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因此，八月一日作为光荣的建军节载入革命史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坚决地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

党的八七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但会议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没有注意掩盖着另一种“左”的倾向，以致后来被瞿秋白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深刻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放弃领导权特别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

导权的严重错误，提出了党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首先领导改组了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八月十八日，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改组后的第一次湖南省委会议上，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明确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在于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这次会议成立了领导秋收起义的最高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书记。

省委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不顾艰险，奔走于湘赣工农群众之中，组织革命武装。八月下旬，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约八千人。第一团以原武汉警卫团为主，包括一部分平江农民自卫军，驻在修水；第二团以安源工人和安源矿警队为主，包括一部分萍乡、醴陵农民自卫军，驻在安源；第三团以浏阳农民自卫军为主，包括一部分平江农民自卫军，驻在铜鼓。

九月九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部队以第一团为右路，由修水取道长寿街向平江进攻；第二团为左路，由安源向老关、醴陵进攻，再北上进攻浏阳；第三团为中路，由铜鼓向浏阳进攻；计划一、三团取胜后，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进攻长沙。毛泽东同志亲临第三团指挥战斗。起义部队先后取得了白沙、醴陵等战斗的胜利。但在攻打浏

阳、长寿街等地时，部队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在城市暂时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必须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九月十九日，起义部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命令在文家市集中。当天，毛泽东同志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会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进军途中，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九月二十五日攻克莲花县城，二十九日进驻永新县的三湾村。

在三湾，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克服了由于战斗失利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接着，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一，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人员虽少了，但队伍更精干，战斗力更强了。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置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党的前委统一领导，使工农革命军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井冈山的斗争》）三，实行了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废除繁琐礼节，实行经济公开，取消雇佣制度，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继续南下。十月月上旬，部队到达宁冈的茅坪，开始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与此同时，党还在湖北的通山、崇阳和黄安、麻城，江

西的横峰、弋阳，广东的海陆丰等地组织了秋收起义。

紧接各地的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城，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起义后，队伍没有及时转到海丰、陆丰农村，同当地农民起义力量结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反动军队五万多人，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围攻广州城。经数天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起义领导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在战斗中牺牲。

以上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回击，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各地起义武装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来源。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战争和战略问题》）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为重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轨道。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周围有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六个县，方圆五百多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发展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井冈山地区人民富有革命斗争的传统，特别是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周围各县是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盛产稻谷、

茶叶和木材等经济作物，便于筹粮筹款。这里地处崇山峻岭，峭壁耸立，地势险要，可进可守，利于军事割据。因此，毛泽东同志首先选定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

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右倾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斗争。一九二七年十月，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时，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各县农民自卫军原有枪枝九百七十，仅保存一百二十七枝，其余概被交绅缴去。农民协会被解散，群众革命情绪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从建党、建军和建政入手，进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莲花县召开了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指示要抓紧重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同年十一月，又在茅坪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一九二八年一月，又在遂川召开了遂川、万安县委联席会议，都指示要抓紧重新建党。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先后派出军队中党员干部到乔林、三湾等地帮助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亲自深入永新秋溪乡，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在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指引下，边界地方党的组织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边界先后建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酃县成立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各地群众革命斗争，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加强了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同志根据打茶陵的经验，

在宁冈砦市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即：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单纯军事观点，正确解决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同志给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即：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一，捆稻草；二，上门板；三，买卖公平；四，说话要和气；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正确处理部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确立人民军队对待敌军的正确政策以及对整个革命军队的建设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帮助建立地方武装，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宁冈砦市创办了教导队，培养各县赤卫队的指挥员。对原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了团结、改造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将袁、王部队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边界各县除酃县外，都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革命武装的建设和发展，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创造了条件。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在边界各县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封建势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乘军阀李宗仁、唐生智混战之际，毛泽东同志派红军攻占茶陵，成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率部队，攻占遂川县城，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二月，

毛泽东同志又率领部队，攻占宁冈，活捉伪县长，并建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井冈山军民四个月艰苦奋斗，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初步建立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建立，就受到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执行瞿秋白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宁冈，取消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并强行把部队调往湘南，因而使边界被占领了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暴动失败，四月毛泽东同志率部队返回井冈山。这时，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农军，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也来到宁冈砬市和毛泽东同志的队伍会合。

两支革命军队会合后，于五月四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共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边界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有赤卫中队，县有赤卫大队。如莲花县原来只有一支枪，这时也建立了县红色独立团。红四军成立后，井冈山红军队伍的力量更加强盛，并由此发展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战斗力量。

这时，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有五个县委和一个特别区委。党的区、乡两级组织也普遍建立。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选举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委，作为边界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同月，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也在茅坪苍边村成立。

在此期间，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军事“会剿”，

扩大了根据地。由于当时正值南方反动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因此从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起到六月间，反动军队连续“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至少有八、九个团，多时达十八个团。红军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作战原则，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并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一次又一次的粉碎了敌人的“进剿”，取得了很大胜利。尤其是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一仗，击溃敌杨池生、杨如轩部三个团，缴枪一千多支，我第三次占领永新。当年群众这样歌颂：“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龙源口大捷后，边界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边界的全盛时期。

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边界各县的土地，约有百分之六十、七十至八十为地主占有，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是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分配土地只在少数地区试行。龙源口大捷后，毛泽东同志立即派遣红军广大指战员，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同“左”倾盲动主义打击中间阶级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实行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争取中间阶级，反水农民照样分田和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等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土地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翻身农民唱出了发自肺腑的颂歌：

井冈山连青天，汪洋大海不见边；
比起恩人毛委员，高山见低海见浅。

经过土地革命，边界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农业生产显著发展。如宁冈的粮食产量，一九二八年较一九二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送鞋送粮，支援前线。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还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四月以后，井冈山根据地所以出现上述“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局面，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政策是：

“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政策，曾受到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对。一九二八年六月，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湖南省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 toward 湘南冒进。毛泽东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召开了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坚决抵制了湖南省委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四军不去湘南，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但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的杨开明，乘毛泽东同志远在永新时，于七月中旬强行把红军大队从酃县拉往湘南，攻打城市，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八月失败”，使红军约损失了一半，边

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占领，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群众蒙受重大灾难。这时，毛泽东同志除留部分红军坚守井冈山外，亲率部队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在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八月三十日，我井冈山守军，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同志在桂东与红军大队会合，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率领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途中，接连击败了敌人，于九月下旬回到井冈山，并陆续收复大部分失地，重开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四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论调，再次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了前委。前委统辖军委和特委。毛泽东同志再次担任前委书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走向胜利的新道路，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光辉著作中深刻指出：“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还证明，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根据地就发展，革命就前进；受到“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的干扰，根据地就缩小，革命就后退，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四、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内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曾经追随陈独秀的老机会主义分子瞿秋白，利用当时党内出现的“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对陈独秀假批判，真包庇，窃取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开始推行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同年十一月八日，在瞿秋白把持下，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性质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并提出一条以城市工人暴动为中心的极其错误的道路。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的暂时低落，却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是所谓“直接革命形势”。他不顾南昌起义及各地农民暴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遭受挫折的事实，否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认为各地“民众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借口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从“左”的方面竭力贩卖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鼓吹所谓“一次革命”，说什么“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

剧地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疯狂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说什么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在革命策略上，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方针。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并制定了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提出“工厂归工人”、“征收有产阶级的财产”等错误口号。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要求“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和烧毁一切地主富农的房屋。他甚至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端荒谬的政策。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他对各次起义中没有占领城市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一概给予组织处分。他对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大为恼火，竟滥用职权，蛮横地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深刻批判和坚决抵制。毛泽东同志首先科学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明确指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因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权，而遭遇到暂时的失败，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同时也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仍在一天一天

发展着，全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地会迅速到来。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这种科学分析，既驳斥了瞿秋白关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左”的论调，又纠正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形势的悲观估量。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论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革命转变的问题。他说：“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井冈山的斗争》）这就有力地批驳了瞿秋白的反动的“一次革命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批判和抵制了瞿秋白提出的损害中间阶级利益的过“左”政策。他指出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反动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贫农阶级成了孤军”，党在城市“难以立足”，根据地与白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影响到一般人民生活。（《井冈山的斗争》）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政策，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切拥护，活跃了井冈山的经济。如当时草林圩逢圩，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毛泽东同志又驳斥了瞿秋白的“城市中心论”，指出这是“于中国实情不适宜的”。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发展，这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毛泽东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广大党员的反对、抵制下，瞿秋白的错误路线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就基本结束了。可是，它的影响和遗毒，还在一些地方留存了一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就是由于当时的湖南省委继续推行“左”倾

盲动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在错误路线被批判之后，瞿秋白仍未吸取必要的教训，依然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陷入了悲观主义的泥坑，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写了《多余的话》，自告叛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

五、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

大会正确地肯定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因此，“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实行土地革命是当前革命的两大任务，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

大会正确估计了当时革命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党在当时的策略路线不是实行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做艰苦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大会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清算了陈独秀的右

倾向投降主义路线，指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指出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忙乱的瞎干”，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丧失了革命的力量。大会特别指出了党内当时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

上述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方针。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

但是六大也还存在若干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同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矛盾，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一九二八年冬，毛泽东同志先在井冈山，而后又在进军赣南、闽西途中，向红军和地方党传达贯彻了六大决议精神。一九二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还在长汀县城翻印了数千份六大文件，转发给地方党组织。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解决了六大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六、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它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位一体的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这三者是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失去任何一项，三者都不能存在。这条道路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在革命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把退却和进攻辩证地结合起来，推动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全党对此并没有一致深刻的理解。当时党中央仍设在上海，许多同志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的中心，仍然幻想以举行城市武装起义来迅速夺取全国胜利；陈独秀一伙取消主义者恶毒诬蔑红军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内部，也存在着悲观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等错误思想，妨碍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从理论上阐明关于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发展和取得全国胜利，已成为驳斥“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责难，统一全党思想，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给予这一重大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回答。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论两个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遵循的革命原则。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

践、深刻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中国革命不能象俄国的十月革命所证实了的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党必须“用大力做军事运动”。（《井冈山的斗争》）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还有勾结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大资产阶级。它们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在农村则是它们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敌人面前，“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是坚持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重要条件，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第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

主力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而革命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则是大革命失败后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毛泽东同志不但论证了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而且科学地说明了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削弱了反革命力量，而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地方的农业经济，使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地独立，又成为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

省。”这些地方有过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广大的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群众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这样就使红色区域能继续发展，而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且发展的一个紧要条件。

上述条件中的前三个，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后两个，则是取决于革命政党的主观努力。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党和红军就存在、发展，就能把客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反之，路线和政策错了，党和红军就缩小，就后退，客观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存在、发展并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它从根本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谬论，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引着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第二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一、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

下，挺进赣南、闽西。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转战，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了革命力量。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分，也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这时，湘赣两省敌人又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向湘赣边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会剿”。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和开辟新的革命区域，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在宁冈白露村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即白露会议），决定留红四军一部和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较优越、仅有少数地方军阀盘踞的赣南、闽西进军，侧击敌后，以粉碎“会剿”，并扩大红色区域。

红四军向赣南进发时，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说明了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号召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起来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斗争。红四军经过遂川、上犹、崇义、大余、信丰、寻邬和会昌等十余县，行军千里，于二月初到达瑞金县境。二月十日，红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围歼了尾追的敌人刘士毅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红军乘胜攻占宁都，进入吉安县的东固地区，同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胜利会师。

三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首次进入闽西，消灭军阀郭凤鸣旅，占领长汀，建立了长汀县革命政权，初步打开了赣南、闽西的局面。

此时，国民党蒋、桂两派军阀间爆发新的战争。毛泽东同志决定利用“军阀重开战”的有利时机来发展赣南、闽西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遂于四月初，亲自带领红军返回赣

南。五月，红四军首先在赣南的宁都、兴国、于都三县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县政权和赤卫队。五月下旬，红四军再次入闽。“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六、七两个月，红四军在闽西革命群众武装配合下，消灭了盘踞在这一带的地方军阀陈国辉和卢新铭部，解放龙岩、上杭、永定广大地区，建立了三县革命政权。至此，赣南、闽西共建立了七个县级政权，红四军发展到四个纵队。

二、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在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和红军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怎样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就成为摆在党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

自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在党和红军内进行路线教育，不断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并不断总结经验，以加强党和红军的建设。

但是，由于根据地的党和红军是在农村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党员和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经常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两条建党建军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而随着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数量的扩大和成分的日益复杂，这种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当时，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在：否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甚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否认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认为红军只是单纯地打仗；不愿做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扩大红军主张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反对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

或主张极端民主化；不尊重地方党和政府等。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在龙岩和上杭召开的红四军第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两次党代表大会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控制下，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红四军应全力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闽西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主张红四军到群众基础较差的闽中和粤东地区流动游击，并迫使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之后，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不断泛滥滋长，并且接连在闽中和粤东梅县等地吃败仗，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引起广大指战员的不满，纷纷写信要求毛泽东同志复职。犯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于是请毛泽东同志重返部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底，毛泽东同志重返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后，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四军党内的泛滥，为了把红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首先深入部队召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以及各纵队、支队党代表及部分大队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详细地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情况，并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耐心说服教育了犯错误的干部。在此基础上，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余名。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个会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以来到一九二九年底建党建军的丰富经验，进一步划清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军队的界限，批判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规定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根本路线。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指出，首先必须着重在思想上建

党。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正确路线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使党员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意调查研究，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并能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党内斗争，克服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决议具体地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号召全党起来予以彻底肃清。

在思想上建党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从组织上建党。组织建设的中心就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左”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右的各种非组织观点；加强党的团结，严格党的纪律，增强党的战斗力。

在红军建设方面，决议强调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的错误思想。

从上述根本原则出发，红军必须担负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任务，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坚决反对流寇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还规定了红军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项原则。并建立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的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照此做了，这样就使

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践证明，古田会议决议是永放光芒的，它永远指引着我党我军的胜利前进。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紧接着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党内通讯，对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还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当毛泽东同志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时，就受到红四军党内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悲观主义者的竭力反对。他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被红四军在进军赣南、闽西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环境所吓倒，认为革命形势“未可乐观”，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会到来，并再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他错误地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时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主张在闽、粤、赣三省的边界区域流动游击，以此扩大政治影响，等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那时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林彪这种右倾悲观主义思想，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红四军瑞金会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以后，林彪又以这种悲观论调写信给毛泽东同志。

为了纠正林彪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想，并进一步阐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更好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

毛泽东同志首先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出，当时“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

适当的描写。”毛泽东同志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充满信心地指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同志坚决驳斥了林彪提出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谬论，指出这主要是没有认清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特点。如果认清这一特点，就会明白中国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的。

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强调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响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右倾悲观主义者林彪散布的各种谬论，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前进。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红军中掀起了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高潮，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管理教育工作，红军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大大提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

倾向被逐步克服，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红军的战斗力加强，真正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党和红军更加坚定地贯彻执⾏发动和武装农民，实⾏土地革命，在农村建⽴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因此，赣南、闽西根据地更加迅速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一九三〇年初，红四军为了粉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敌⼈对闽西根据地的“会剿”，巩固闽西根据地，再次回到赣南，在更⼴⼤的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了游击战争，深⼊了土地革命。这年三月，赣南、闽西工农民主政府相继建⽴，包括了十七个县。两区分别建⽴了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六月，红四军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军团，兵力达二万。至此，赣南、闽西根据地正式形成，它为以后中央根据地奠地了基础。

三、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

红军战争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进⼀步推动了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开展。红军所到之处，传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号，燃起了阶级斗争的熊熊烈⽕，呈现出⼀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没有⼀个⼤的农村变动，要实现农民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土地分配是极不合理的，占农村⼈⼝百分之五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占农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土地。⼴⼤的劳动⼈民，尤其是贫雇农，他们遭受着军阀、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压榨，⽣活是异常悲惨的。因此，“打土豪，分田地”早已成为他们的迫切要求。但是，

要变革几千年来旧的土地制度，却是一场极其深刻、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党要领导这个斗争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先后作了宁冈、永新、寻鄔、兴国等农村调查，为制定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打下了基础。

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经验，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使土地分配更加彻底。

经过几年来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反复实践，特别是总结了反对土地革命中“左”右倾错误的经验，到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保护中小工商业，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这条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集中力量消灭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障碍——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根据地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地开展起来。红四军二次入闽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闽西的土地革命斗争，闽西八十万农民群众分配了土地。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吉安陂头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土地革命政策，批判了赣西南特委中的机会主义思想，把赣南土地斗争推向一个高潮。经过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取消了苛捐杂税，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踊跃参军支前，如兴国一县，一九三〇年就有三千人参加红军。闽西的长汀、龙岩、上杭、永定、连城等县翻身农民建立了地方武装独立

团。同时，广大农民积极劳动，兴修水利，开始组织劳动换工组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根据地，支援了长期战争。

四、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在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光辉照耀下，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除毛泽东同志直接开创的湘赣、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外，全国各地还建立了下列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七月，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十二月，红五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留下的一部分，转入湘鄂赣边境活动。次年十月，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使它与湘赣根据地联成一片。一九三〇年七月，红五军与湘鄂赣发展起来的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团。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冬，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横峰起义部队，在地主豪绅武装进攻下转入山区打游击。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后，连续打击了敌人，根据地迅速扩大到赣东北和浙西的十几个县。同时，党又领导了西北崇安的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夏，这两支红军发展成红十军，形成闽浙赣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春，湖北黄安、麻城一带工农革命军，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鄂东根据地。同年夏到第二年一月，党又领导了豫东南和皖西农民起义，分别建立了鄂东南皖西根据地。到一九三〇年三月，这三个地区的红军合编成红一军(后改红四军)，三区也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后来红一军和鄂中红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团，

徐向前同志担任总指挥。

洪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春，周逸群、贺龙等同志发动了华容、石首等地的农民斗争，开辟了湘鄂西地区，建立了红二军。同时，段德昌同志领导了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建立了红六军。一九三〇年七月，两军会师公安，成立红二军团。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十月，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红七军和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农民武装会合，建立了右江根据地。第二年，又举行了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建立了左江根据地。

此外，党在广东的海陆丰、海南岛，陕西的渭南、华县，以及四川等地，先后组织了红军和建立了小块根据地。

总之，在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十个军，约有十万人，战斗在全国十多个省二百多个县。同时，党在城市的工作也有相当恢复和发展。全国革命出现了一片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

五、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

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的同时，敌人营垒内部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一九三〇年五月，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派之间再次爆发大混战，削弱了反动派对革命的压力。红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打了一些胜仗，解放了不少城市和乡村。就在这时，党内的“左”倾情绪重新滋长。掌握了党中央实际领导权的李立三便神气起来。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一点也不了解，不顾主观条件，不接受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失败的教训，

看到一点有利形势，就头脑发胀，忘乎所以，蛮干起来。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他的把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再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一样，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上。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李立三不承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荒谬地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发展是一样的，“没有丝毫差别”。只要全国一个中心城市爆发革命，就会引起全国革命的爆发；甚至中国革命爆发，就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进而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李立三还否认敌强我弱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否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他胡说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这种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其结果必然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李立三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和瞿秋白一样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胡说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因此，提出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消灭农村富农和建立集体农庄等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的政策。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李立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斗争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因此，李立三极力反对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诬蔑这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是“一种幻想”。他们还讥笑革命的游击战争是所谓“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城市），“要等头发白了才能看到革命的胜利”，因而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

李立三为了推行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炮制了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把城市党、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一九三〇年七月，一个偶然机会，彭德怀带领红三军攻入长沙。李立三认为总暴动的时机已到，立即命令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全国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同时调各地红军配合行动，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桂林等城市，以期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目的。李立三大搞“一言堂”，在党内大反所谓“右倾”，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扣上“机会主义”帽子，错误地打击了许多党员和干部，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毛泽东同志曾尖锐指出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的结果，使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红二军因远离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去打长沙，全军由三万人减到一万多人，

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十军离开闽浙赣根据地去打九江，全军两万人减到三千人。红七军远离右江根据地去打柳州、桂林，全军七千人减到一千多人，丢了右江根据地，剩下的部队后来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城市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损失。如天津当时有五百多党员，只剩下二、三十人，几个区委均遭破坏。

毛泽东同志始终不赞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并同它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正确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的转变问题，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又说：要完成这个伟大的革命任务，全靠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了解中国情况，学会社会调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是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个严重警告和有力的批判。

当李立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一错误。六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军团从长汀出发，推进到南昌附近，在樟树镇主持召开了红一军团干部会议，说服和教育了红一军团干部，作出不打南昌的决定，同时在此分兵发动群众，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八月，毛泽东同志带领红一军团进到湖南浏阳与红三军团会

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兼政委，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又说服中央代表和红三军团干部放弃二次攻打长沙的计划，撤出攻城部队，回师湘东、赣西，连克醴陵、攸县、茶陵、萍乡和吉安等十余县，在袁水流域和赣江两岸广大地区开展了群众工作。这不仅使红一方面军免遭损失，而且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时，毛泽东同志又在袁州（宜春）和罗坊等地接连召开了总前委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彭德怀等人顽固地坚持立三路线，仍然主张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并胡说什么“不打南昌，就会断送中国革命高潮”。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主张。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事实；指出在这种形势下，红军决不能去进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而是应采用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加以消灭。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在新余罗坊作了为期一星期的农村调查曾说到“因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农村调查》）袁州会议和罗坊会议，深刻地批判了李立三路线，肃清了李立三路线在红军中的影响，并为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作了思想准备。

由于李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到处碰壁，引起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反对，党即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工作，从而结束了党内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的中央，对停止李立三路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斗争方法上有缺点，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也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

六、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六届三中全会，党纠正了立三路线，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矛盾论》）但是，当时窃踞全国总工会党团领导职务的罗章龙，却对形势作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为党内出现的暂时困难现象所迷惑，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对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所吓倒，把时局看成一团漆黑，对中国革命完全丧失信心。罗章龙叫嚷经过立三路线，“中国革命已被断送”，党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革命高潮已经完结”，“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任何群众的基础”，“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他还污蔑党的六大路线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胡诌党自六大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总之，把党说得一无是处。由于他对形势的悲观估量，对中国革命便完全采取了取消主义立场。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恶毒咒骂红军，胡说党在当时的任务，只能是“细小”、“日常”的“经济斗争”。这和托陈取消派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公开为托陈取消派翻案，叫嚣要把托陈取消派头子陈独秀、彭述之“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如此等等。完全暴露了他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中国革命的丑恶嘴脸。

罗章龙为了分裂党，在组织上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他炮制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的反党纲领，疯狂攻击党中央，叫嚷要“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根本改造政治局”。他在上海非法组织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妄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来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当这一阴谋被粉碎后，他便公开打出分裂党的旗帜，非法成立了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

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他派人到东北、河北、山东、广东等地进行活动，企图从中央到地方分裂我们党。最后，他还公开和托陈取消派勾结在一起，丧心病狂地利用散发传单和告密等方式，将党的干部名单报告给敌人，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别动队。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初，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向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时，蒋介石收集大批叛徒，为其效劳，罗章龙右派分裂党的活动，正适应了敌人的需要。

罗章龙，自钻进共产党后，积极追随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组织反党小宗派，阴谋分裂党。

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是根本对立的。他的阴谋暴露后，激起广大党员的义愤，包括一些受蒙蔽的同志也纷纷起来，与他展开斗争。罗章龙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清除罗章龙等人出党。以后，罗章龙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七、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农村土地革命的广泛深入，动摇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基础，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迅速求得其内部的暂时妥协，掉过头来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于是从一九三〇年底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阶段。这时斗争集中在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其中又以中央根据地为主。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阎、冯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集十万兵力，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采用了“分进合击”的作战

方针，在西起江西吉安，东至福建建宁的八百里线上，对根据地布成了一个半圆形包围圈，由北向南，分八路发起进攻。这时中央根据地有红军四万人。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排除了“左”右干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退却到根据地中心宁都的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十二月下旬，敌军深入我根据地。这次“围剿”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主力，张又是前敌总指挥，如能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被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师是绝对优势。张、谭两师所在地龙岗、源头一带接近我军集中地，群众条件好，又有优良的阵地，我军实行中间突破，敌人就被东西分割。于是我军决定先向张辉瓒开刀。红军在龙岗布下了天罗地网，引诱张辉瓒进入我伏击阵地。三十日下午，红军向敌人发动了猛烈进攻。“万木霏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一仗歼灭张师，师长以下九千余人全部被俘获。一仗胜利，吓得各路敌军纷纷向后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又消灭谭师一半。五天内打两仗，歼敌一万六千人，缴枪一万三千支，胜利地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又纠集二十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分四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这时，红军仅有三万，要对付七倍于己的敌人。毛泽东同志英明决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当时的弱敌是新从北方调来的王金钰部，住在富田。于是红军决定先打富田的敌人王金钰和公秉藩。敌人躲在富田的“乌龟壳”里不

出来，红军等待二十五天，终于把王金钰引出“乌龟壳”，在东固地区加以歼灭。接着打白沙、中村、广昌、建宁，相继取得胜利。“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第二次反“围剿”从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三十日止，共十五天，红军从江西打到福建，走了七百里，打了五仗，歼敌三万余，缴枪两万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再调集三十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到南昌指挥，带来了英、美、日等国军事顾问团，调来了他的嫡系部队，兵分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妄图压迫我红军主力于赣江而消灭之。这次反“围剿”战争距上次仅有一个月，红军苦战未得到休息和补充，人数仍为三万，并分散在闽西一带。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避其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战略方针和“磨盘”战术。七月，红军越过闽西、赣南的高山峻岭，昼夜兼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集中。这时，敌军四面围上来，根据地只剩下兴国高兴圩周围几十里地面。八月四日夜，红军机智地穿过敌军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直捣莲塘、良村、黄陂敌军巢穴，五日三战三捷，歼敌两师又两团，缴枪逾万。敌人发觉掉头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态接近我军。红军主力从容不迫地越过敌军二十华里间隙的一座大山，又回到兴国地区。及至敌军发觉，我军已休息半月。敌军则被弄得疲倦不堪，士气沮丧，“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无力再战，只好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又歼敌一师一旅。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了。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

展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形成了整套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同志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在正确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掌握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第一次大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顺利的条件和困难的条件同时存在。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而这种形式的长期反复，则成为中国内战的基本规律。

从这些特点和规律出发，红军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在战争中实行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民兵相结合，正规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红军必须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战争形式，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充分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敌人的弱点，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战争指导上还必须实行下列作战方针：战略的防御战和战役的进攻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以少胜多和战役上的以多胜少，诱敌深入，集中优势

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革命军队如何在劣势的情况下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问题。它是人民军队百战百胜的强大武器。它树立了世界革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光辉范例，有力地反对了战争问题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

第三节 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 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帝国主义企图从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中寻找出路，它们为争夺霸权发生了激烈冲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帝对我国的侵略事件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的。早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从沙俄手中攫取我国辽东半岛，霸占了南满铁路，设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等侵略机构，并派军队进驻南满铁路沿线，实际控制了东北大片地区。一九二七年日、美、英三国曾举行日内瓦海军队会议，一九二八年八月，美、英、日、德、法、意等帝国主义签定所谓“和平”式的非战公约。而它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后面正是侵略的继续和准备，一旦“实力”变化后，协议就成了一张废纸，因此，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召开的裁军会议，实际上是扩军会议；它们所讲的“和平”公约，实际上是战争的前奏。就在它们高谈“和平”签定“和平”公约，召开裁军会议的同时，从

一九二九年起，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公开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大造侵华舆论，加紧武装侵占我国东北来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经过长期精心策划，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震动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为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国民党驻军奉蒋介石密令，不放一枪，撤退到山海关内。国民党曾幻想美、英、法操纵下的国联进行干涉，但是这些帝国主义用牺牲中国领土来讨好日本的扩张主义，对日本的侵略听之任之，实际上采取了纵容态度。日本侵略军在十九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进占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在短短几个月里，全部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并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成立了一个名为“满州国”的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仇恨和愤怒，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这时，革命根据地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革命“围剿”，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在此基础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主席。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中心和强大支柱。

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连续发表声

明，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国人民在党的号召下，掀起抗日反蒋运动的新高潮。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组织了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展开游击战争。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抗日武装总数达三十万以上。一九三四年，在党的领导下，东北各抗日武装联合组成抗日联军，编为七个军。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大中城市，像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举行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们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抗日义勇军，展开各种抗日活动。各地学生还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选派代表赴南京请愿。愤怒的学生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机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进攻上海，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而且一九二七年退出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因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和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开始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们实行了对日经济绝交和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发表言论，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求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同时，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我党的推动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北抗日义勇军。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时，蔡延错等率领的

国民党十九路军，拒绝执行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武装抵抗了日寇的进犯。特别是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万余人，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内战、卖国政策，在董振堂、赵博生等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

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发生了严重危机。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狗咬狗的斗争，各派军阀、政客借机纷纷起来攻击蒋介石集团。汪精卫和胡汉民首先策动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抗。蒋介石不得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宣布“下野”。国民党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

上述情况表明，九一八事变，已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抗日反蒋运动新高潮，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低潮已经过去，革命在走向新的高涨。

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全国有利革命形势的丧失

在全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的形势下，我们党内又有一些人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严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再次遭受巨大损失。

王明，一九二五年混进党内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去莫斯科学习期间，就搞宗派，和张闻天、杨尚昆等人组织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〇年十月前后，王明一伙相继回国。这时，党已开过六届三中全会，揭发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这条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已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抵制和批判。虽然当时对立三

路线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都已基本纠正，并且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还采取了积极措施，进一步批判了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全党应该团结起来，继续开展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可是，当罗章龙从右的方面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时候，王明却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他打着“国际路线”代表的招牌，以“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为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胡说“立三路线是‘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丝毫揭破和打击”，并认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叛徒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和战略问题》）

同年二月，王明抛出了《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在这个纲领及其以后所炮制的许多决议案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论政策》），王明一伙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他们所推行的是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嚣张、形态也更“完备”、更“系统”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反对毛泽东同

志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所作的正确论断，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荒谬地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已“跨过”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强调“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学说。否认“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拒绝广泛地联合要求抗日反蒋的政治势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经济政策。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不了解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或夺取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污蔑中国当时没有“真正”的红军和“真正”的工农民主政府，要建立一套所谓“新原则”，“正规原则”，要红军去“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白区工作中，大搞冒险主义，疯狂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王明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他认为在一九三一年初，“直接革命形势”就已经“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的省份”。在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

后，则进一步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已在“加速崩溃”，“形成了全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中国目前两个政权对立的尖锐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求同国民党决一死战。

在组织问题上，王明一伙大大发展了前两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他们大搞“以我为中心”，以太上皇姿态，把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在“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下，“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的亲信在全国各地篡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对反对他们的错误路线的人，一律扣上“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和团结。

王明一伙对“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并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政策。他们否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把它说成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他们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进攻中国和苏联问题上的一致性，否认其他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口号，这样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也不能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来推动抗日运动的开展。王明一伙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和反革命营垒内部的分化，强调两个政权的对立，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和中间派别反对革命的一致性，把中间派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采取关门主义的政治策略，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当时参加东北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参加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他们对其全体官兵的正义行动不是加以积极的鼓励和支持，而是采取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策略，

促使其内部分裂。结果孤立了自己，便利了国民党反动派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向革命进攻。

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联合亲日派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重新上台后，立即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国家机器，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统治，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行更为残酷的镇压；在经济上进一步加紧对人民搜刮和掠夺，形成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三月，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出卖和破坏了上海军民的浴血抗战，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四月，蒋、汪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一方面调动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另一方面在“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禁令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和杀害抗日群众和爱国人士。就这样，“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全国抗日反蒋运动高潮被打下去，全国出现的有利革命形势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葬送。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王明一伙仍然认为全国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要求全党继续采取进攻的策略。一九三二年六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召开了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强行通过《革命危机与北方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口号下，要求在北方农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国民党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建立红军。在这条错误路线指导下，北方各省农村举行的多次暴动（如河北省的高蠡暴动等）都失败了，使党在农村的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时，他们还在城市组织了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赤色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群众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

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及武装暴动，使党在城市的力量也接连受到摧残，最后连王明控制下的临时中央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于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

三、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以前，王明一伙就陆续向那里派遣所谓“中央代表”，对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进行了种种非难和污蔑，并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于瑞金召开的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同志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临时中央迁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全面贯彻。

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秋，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在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红军要“不停顿的进攻”、“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毅然率领部队消灭了根据地内部的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反“游击主义”为幌子，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军事原则，要求红军去攻打南昌、赣州等城市。大野心家彭德怀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率领部队攻打赣州，企图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赣州三面环水，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军围城一个月，四次攻城不下，造成部队重大伤亡，且敌人不断派兵增援，使红军受到严重威胁。在形势十分危急之际，毛泽东同志赶到前线，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批判了彭德怀执行“左”倾机

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以反潮流的精神抵制了王明错误军事路线在红军中的泛滥。撤出围城部队。三月，毛泽东同志亲率红一军团东征，连克武平、上杭、龙岩，打下闽南重镇漳州，歼敌两个旅共四千余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红军打开漳州后，执行了正确的城市政策，获得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首先集中力量对鄂豫皖和洪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了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曾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窃踞鄂豫皖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的张国焘，却被这个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是“偏师”，无力再与红军单独作战，麻痹轻敌，不让部队休整，一味实行进攻；当敌人第四次“围剿”到来时，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命令红军仓促应战，正面拒敌。虽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在七里坪等战斗中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此时张国焘由恃胜轻敌一变而为右倾恐敌，认为四次“围剿”再无法打破，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未经中央批准，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根据地失利的情况下，红二军团也被迫退出洪湖、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十六军则离开根据地南下与湘赣根据地红八军会合。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向中央根据地进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王明“左”倾军事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中央红军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采取了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作战方针，仍然取得四

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在宜黄以南地区歼敌李明、陈时骧两个师，接着又在草台冈附近歼敌肖乾一师另一个营。两次战斗共歼敌三个师，缴枪万余，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毛泽东同志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权的情况下，仍然以革命事业为重，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主持和领导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继续与王明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一九三三年春至一九三四年初，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经济建设、查田运动、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运动，创造了模范的后方工作，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残酷的经济封锁，红军的给养和根据地群众生活遇到极大困难。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只知片面地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敌人拚消耗，根本放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同时还推行了一套过“左”的经济政策，主张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和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行错误的劳动政策和过高的税收政策，严重地影响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针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著作，批判了王明路线，指导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同志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著作，深刻地论述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与政策及其重要性，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

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认为在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或把经济建设当作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离开革命战争去单纯谈经济建设，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同上）根据地的经济成份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三个方面组成的，首先要尽可能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的发展合作社经济，保证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坚决反对贪污浪费。“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同上）由于上述经济方针政策的实施，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许多工业开始走向恢复，其中造纸、织布、制糖、钨砂等业的发展尤为显著。同时，合作社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仅据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

统计,各种合作社共有一千四百多个,股金达三十余万元。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配合,成为苏区经济发展的枢纽。

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要著作中,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群众“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同志针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提醒全党同志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紧密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全力支持革命战争,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毛泽东同志还领导根据地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在于彻底摧毁农村的封建势力,提高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根据地,发展生产,支援红军战争。一九三二年二月,毛泽东同志首先在瑞金叶坪乡进行了查田试点工作。同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于都、宁都、胜利等八县查田大会,把查田运动推广到全区。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同“左”右两种倾向进行了斗争,既反对了包庇地主、富农的右的错误,又反对和纠正了侵犯中农、打击小工商业、消灭富农的过“左”政策。十月,毛泽东同志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光辉著作,规定了正确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地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路线和政策问题,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土改路线。经过

多的时间，查田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央根据地共查出瞒成份的地主、富农一万三千六百多户，肃清了农村封建残余，洗刷了混进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严厉镇压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一步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收获大为增加，中央根据地粮食产量一九三三年比一九三二年上升了百分之十五，有效支援了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这四篇光辉著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正确路线，为制定党对农村各阶级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思想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伟大的指导作用，对于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竟然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热河、察哈尔东部及长城一线的侵犯，公然无叫嚣；东三省、热河的丢失，“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却把共产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把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称为“就是行仁”，更加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口号下，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由德、意、美的军事教官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蒋匪军官施以“杀身成仁”的孔孟之道的思想毒化和法西斯的军政训练，经过半年的准备，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了配合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蒋介石再次搬出孔老二高尊孔读经复古，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他指屠杀人民的南昌行营里提出了提倡孔孟之道的所谓“新生

活运动”。把“礼义廉耻”等整套的孔孟之道作为“新生活的中心准则”。在各地修建孔庙，举行大规模的“祀孔典礼”，在上海出版四书五经，并被编成课本，先后在湖南、广东等省强迫中小學生读经，国民党中央一四七次会议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国民政府还规定孔老二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企图以此禁锢革命思想，实行思想统治，阻止革命的发展，维持它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一面高谈尊孔，一面已纠集了一百万军队扑向革命根据地。在这次“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了以往“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作战方针，仅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就修筑了近三千多个碉堡，企图逐渐消耗红军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罪恶目的。

这时，根据地军民所面临的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这时中央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土地革命深入，根据地更加巩固，工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又有几次反“围剿”的经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反蒋运动也因日寇扩大侵略和蒋介石进一步采取的卖国投降政策而又回升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粉碎蒋介石这次反革命“围剿”仍然是有把握的。

可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却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当时形势作了极端错误的分析。他们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

在中国存在着”，断定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我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等等。

与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相适应，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逐步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在建军问题上，他们把红军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打仗一项，要求红军不适当的“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诱敌深入，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王明一伙，在反“游击主义”的旗号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匣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原则视若无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所谓“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等口号。九月下旬，敌人为了切断我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的联系，首先占领位于中央根据地东北之黎川。红军从福建回师途中，不期在洵口遭遇战中获胜，歼敌一个旅。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把洵口战斗看作第一仗，不看这一仗所必然引起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去引导战争向胜利方

向发展，反震惊于黎川一地的失守，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要红军去打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同样是敌人的巩固阵地兼白区的资溪桥，又不胜，尔后红军即转战于临川、金溪、黎川地区的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生了“福建事变”。被蒋介石调来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把进攻根据地的军队东调镇压十九路军，造成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好时机。此时，毛泽东同志主张，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之围攻线，进攻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建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然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了这一英明决策，不但不组织打出去，也拒绝援助十九路军，让敌人畅通无阻地通过根据地去镇压十九路军。“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后，又集中全力进攻红军。一九三四年春，敌人纠集了十一个师，向中央根据地北部的门户——广昌进攻。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同上）他们把兵力分的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堡垒面前，

构筑工事，实行“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当时，担任一、三军团主要领导职务的林彪和彭德怀，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他们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林彪通过写文章、写信、发电报和提建议等方式，狂热地鼓吹“短促突击”战术。一九三四年六月，林彪在他的《论短促突击》一文中，疯狂地叫嚣“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由于王明及其追随者，推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遭到重大伤亡，广昌终被敌占领。

广昌战役后，敌人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推进，我军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命令红军主力分别布防在兴国高兴圩、古龙岗，广昌陂头、高虎脑等地；同时还命令一部分红军在福建朋口和会昌筠门岭两地布防。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地防御战中，红军采用“短促突击”战术继续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在敌人日益缩小的包围圈中，愈来愈陷入被动地位。“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消灭之。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了这一英明决策。“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同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八万人被迫

退出中央根据地，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而由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三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陕甘边区外，也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进行了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惊慌失措，实行了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在离开根据地前，既没有在红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转移后，又不能把握有利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动地歼灭敌人。他们为了实现会合红二、六军团的目地，和敌人死打硬拚。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防线，前堵后追，阻挡红军。红军携带着笨重的辐重和武器，沿着粤桂湘边界向前缓慢地移动。虽然红军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接连突破敌人的防线，但却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广西全县湘江东岸战斗中，红军与敌军激战一星期，“左”倾机会主义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防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不到三个月，中央红军减少到三万人。王明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贯彻王明路线的“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五、遵义会议——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的标志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时，如果红军再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拚，就有全军复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变被动为主动。十二月，红军进入贵州攻占黎平后，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向敌人力量薄弱地区进军的正确主张，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红军在黎平稍事休整，继续向贵州腹地挺进。在连克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等县后，十二月底又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等地。此时“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知按照情况变化，在川黔边歼灭蒋介石追击部队，而只满足于歼灭小股敌人和土匪。毛主席在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一错误，并提出红军应到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粉碎敌人“围剿”。会议向红军发出打过乌江去的战斗口号。一九三五年元月一日，英勇的红军打响了强渡乌江的战斗，摧毁了被敌人吹嘘为“重迭坚固，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胜利地突破了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乘胜于五日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多次失利，极大地教育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干部，他们逐渐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这时一些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的同志，也在毛泽东同志耐心教育下开始觉悟。在这种情况下，一月六日到八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就是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刘伯承、聂荣臻等同志，以及中央和一、三、五军团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共十八人。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集中全

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领导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决议明确指出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指出：在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下，“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深刻批判了“短促突击”论，驳斥了王明一伙认为在敌人“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等谬论，指出“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围剿’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这些批判击中了“短促突击”论的狂热鼓吹者林彪等人的要害，因此他们在

会后便伺机反党。决议还分析了单纯防御路线的实质和产生的思想根源。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对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的主观力量，特别是对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决议最后强调指出：当前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

会议在组织问题上，通过了关于改组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组织的决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党才彻底地走上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共产党人》发刊词）。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从多次反复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同志才是自己的伟大领袖，认识

到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广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得来的最宝贵的成果。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四节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四渡赤水。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师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红军中重新得到贯彻，广大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红军获得新的生命，一反过去的被动局面，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继续北上。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在两个月中，进行了四渡赤水河战役，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当时，蒋介石纠集各路敌军，凭借长江天险，企图将我军压缩于川、滇、黔边境的赤水地区，加以“围歼”。毛主席纵观全局，制定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我军分三路向川南挺进准备出赤水过长江，进入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迅速突破嘉陵江，逼近成都、重庆，箝制四川敌军不能集中力量于长江一线；令二、六军团在川黔鄂之间积极活动，拖住敌中央军，以造成长江沿线的空虚。但是，当我军从土城、元厚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渡

江时，从鄂豫皖逃到川陕边区的张国焘却违抗中央命令，拒不向西南靠拢，使敌解除后顾之忧，蒋介石遂令川军封锁长江沿岸，全力阻我北上。毛主席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被张国焘的叛卖行为所破坏。

为了实现战略转移，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争取主动权，毛主席根据敌情变化，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师进入云南扎西（威信）。当敌人向扎西方向移动时，我军突然回师东进，于二月十九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空虚的黔北发起攻击，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我军出敌不意，于二月下旬，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歼敌二十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毛主席运动战的威力。

此时，蒋介石又纠集各路敌军，步步推进，层层包围，企图将我军歼灭在遵义、桐梓、赤水地区。蒋介石还亲赴贵阳督战。为了进一步调动和摆脱敌人，我军于三月十六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摆出要渡江挺进川南的架势。敌见我军有北渡长江之势，即调重兵增强长江防线，继续堵截追击我军。我军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突然又挥师东进，在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后调头南下，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待蒋介石急令滇军驰援贵阳。我军已实现了毛主席的“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军在贵阳虚幌一枪，又突然转向西南，分三路直捣内部空虚的云南，威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惊恐万状，急调民团防守昆明，但我军却又迅速向西北金沙江边开去。五月上旬，红军强占绞车渡，依靠七只小船，经九天九夜，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等数十万敌军人马赶来，我军早已远走高飞，愚蠢的敌人，只能站在滚滚的江流面前隔江叹息。从此，我军摆

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部署，为战略转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四渡赤水战役，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这个紧急关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林彪，又跳出来，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他在遵义会议后，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他动摇徘徊，违抗军委命令；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带头反对毛主席，伙同彭德怀等人，阴谋夺毛主席的权。毛主席在中央会理会议上，严厉地斥责了林彪这个罪恶行径，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红军在会理稍事休息后，继续北上，路经西昌、泸沽、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五月中旬，红军攻占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左岸红军主力部队与在此强行渡河的部队夹河而上，一举夺得泸定桥，打开了前进的通道，使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全歼在大渡河边的迷梦彻底破灭。我军飞渡大渡河后，在前进道路上又击溃了四川军阀部队四个团，经天全、芦山、宝兴进入川康边境，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六月中旬，攻占了川西北的懋功等地。在这以前，四方面军已在川陕根据地粉碎了敌六路“围攻”、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张国焘竟被胡宗南匪军向川陕区发动新的反革命“围剿”所吓倒，于一九三五年三月违抗中央命令，擅自放弃根据地，率领部队向川康边境逃跑。中央红军到达懋功，才制止了他的逃跑。两支红军遂在懋功会师。

二、党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六月下旬，党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用武力威逼华北，卖国的“何梅协定”在准备签订，华北局势日趋紧张，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民主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潮。毛主席在会上正确分析了这时的政治形势，认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造成了中国革命在西北发展的胜利前途，主张红军迅速北上，在西北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以便使我党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张国焘却认为，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两大红军西征表示中国革命的低落。他对蒋介石反革命力量估计过高，对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表示怀疑，反对红军北上，主张红军向川、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毛主席和党中央严肃地批判了他的退却逃跑路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因为，红军是不是北上到陕北去，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和革命兴衰的重大政治路线问题。后来事实完全说明了：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我们就不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就不能在抗日时期建立那么多根据地，就不能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张国焘的向西退却路线，是适应蒋介石反动政治需要的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七月上旬，毛主席率领红军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这时，张国焘继续寻找借口，拖延北上。他只看势力，不看路线，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把军队看成是个人的私产。他认为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势力大，妄图以枪指挥党，以军队威逼党，并竭力挑拨两支红军的关系，暴露了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鉴于张国焘的错误，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次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强调继续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等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正确

性；批判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退却路线；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错误；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加强党的团结，加强红军的团结，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迎接抗日民族战争的高潮。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决定分兵两路北进。毛主席亲自率领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

从八月初起，红军分别在毛儿盖、卓克基两地区集中。八月下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踏上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座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经六昼夜艰苦行军，终于胜利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原定经阿坝出草地，到班佑和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但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暴露出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反对北上，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然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违抗中央命令，不仅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变本加厉，妄图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张国焘这一罪恶阴谋为当时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现，立即报告了毛主席，遂使这一阴谋彻底暴露。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开展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严厉遣责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揭露了其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嘴脸。并决定将

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八千人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即陕甘支队），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继续向陕北前进，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

张国焘截击中央、危害毛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率领被其欺骗的一部分部队，重返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十月初，张国焘不顾其他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在绰尔碉非法自立伪中央，自封为“主席”，公开掀起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朱德同志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并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

九月初，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毛主席率领下，从巴西出发，渡过包座河，到达四川西北的俄界。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后，部队继续向川甘边界的腊子口挺进。九月中，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千里雪，到达甘南地区。随后我军又连续突破敌人的渭水封锁线，会宁、静宁之间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翻越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吴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写下了歌颂长征的壮丽史诗《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处在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统治着陕北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政治上搞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分裂党和红军，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刘志丹同志。毛主席及时地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十一月，毛主席又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富县西南直罗镇一带，伏击了敌人，歼敌一个多师。“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三、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由于遭到敌军的多次围攻，部队消耗很大；又因张国焘推行错误路线和政策，难以立足，遂于一九三五年底又向西退至道孚、炉霍、甘孜一带。张国焘还企图继续向青海西宁逃跑。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决定，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原活动在湘鄂川黔边界的红军二、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为配合红一方面军长征，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人的围攻，毙伤敌一万多人，缴枪万余，创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六军团奉命开始长征，经贵州、云南，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西康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企图用强制和欺骗手段，迫使二方面军同意他

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遭到可耻失败。由于毛主席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从实践中认清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他们和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起来，纷纷反对张国焘路线，要求北上；还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持同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作不调和的斗争，张国焘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七月，部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座，再次过雪山草地，八月到达甘南。这时毛主席正指挥部队西征，迎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歼灭敌胡宗南部。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正当右路军攻克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拖住了胡宗南的尾巴，一方面军也包围胡宗南军的一部，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时，张国焘却以组织岷(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率左路军西撤，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但静会战役却被他破坏了。

此时，张国焘仍然野心不死。十月下旬，竟假借中央名义，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命令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五千多人组成西路军，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进至甘州(武威)、凉州(张掖)、肃州(酒泉)地区。西路军在高台、酒泉间陷入敌人重围。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但终因孤军深入，遭受失败。剩下不到一千人，穿过祁连山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派人营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才回到陕甘宁根据地。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又一严重罪行。毛主席指出：“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为了教育全党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叛党行为。会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从鄂豫皖开始，到川陕边区发展成为政治路线的错误。自退出川陕到成立伪中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西路军的失败，则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把错误路线的头子张国焘同受他欺骗的广大干部战士区别开来，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精神。会议号召全党全军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对张国焘本人，也尽力挽救，会后仍分配张国焘担任一定的负责工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但由于张国焘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的。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表示接受党对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但实际上却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他终于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充当了可耻的特务。四月十八日，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将这个无耻叛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经验时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

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还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这时，我们党的力量，虽然从数量上看暂时地减少了，党员由三十万减到四万人左右，红军由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但是，由于全党全军已转移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轨道上，并经过长征过程中的艰苦磨炼，从质量上看却比过去更强大了。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我党历史上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毛主席曾作过如下的精辟论述：“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肩负着中国革命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新的高潮而奋斗。

第五节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一九三五年是中国革命重新走向高潮的一年。那就是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这个高潮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为了扼杀革命，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反动派，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对我们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文化，实行大规模的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在蒋介石反动派看来，这样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似乎一定可以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剿尽杀绝”了。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喜欢的。它把灭亡中国的计划寄托在蒋介石的“剿共”事业上。蒋介石“剿共”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就策动了九一八事变，炮制了一个“满洲国”；再“剿”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就把日本帝国主义

“剿”进华北来了。

但是，事实恰恰同反动派的愿望相反，蒋介石的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胜利地到达陕北；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总之，几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相互勾结演出的侵略和“剿共”的丑剧，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驱使他们团结起来，进行反蒋抗日的伟大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日联军声势越来越大，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同时，附和蒋介石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也开始动摇或中立。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寇占领长城北部和东部的整个地区以及沿长城的重要关隘，并继续向冀东扩张。蒋介石却仍然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下令“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寇占领我东北和热河，承认冀东为日寇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整个华北放置在日寇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就在这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分子，再次违反国民党的意志，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这支军队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并将其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破坏，把这支部队瓦解了，领导这支军队的共产党员吉鸿昌被杀害。

国民党的卖国投降路线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一九三五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早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就曾狂妄声称：它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反对其他国家插手中国。紧接着这种反动叫嚣，五月二十日，日寇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

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同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六月，国民党派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头目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完全接受了日寇的要求，使我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丧失殆尽。十月，日寇又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十一月又策动汉奸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求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由汉奸组成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现了，由亲日派组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准备宣告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经济上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数达二十亿美元的日本垄断资本，以各种方式控制了中国的煤矿、铁路、纺织等各种主要企业。加上武装走私、商品倾销等，垄断了中国的市场。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继续镇压人民群众抗日民主的要求也根本办不到了。华北形势非常严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民主的革命运动就象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正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到达了抗日前线，更高地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阴谋，指出只有抗日反蒋才是全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广泛联合起来，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的号召，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猛

烈发展，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爆发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一万余人，在我党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国大示威。示威群众冲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恐怖统治，以满腔的热血，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防共自治”，“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武装保卫华北”的口号声响彻祖国上空。游行队伍遭到手持水龙、大刀的反动军警的袭击，爱国学生赤手空拳，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反动派的镇压，激起了爱国学生更顽强的斗志。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二万多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迫使原定在这一天成立的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纷纷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杭州、广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开封、太原等地先后举行抗日游行，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一二·一六”后，广大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的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排除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走向农村和工厂，同工农群众斗争相结合。党在先进青年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它成了抗战前后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一二九运动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成了全国抗日新高潮的起点。

二、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上升

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步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突出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这种变化扩大了以我党为核心的民族革命阵营的力量。为了适应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急剧转变的新形势，进一步推动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我们党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政治方针策略，并纠正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在长征途中召集的遵义会议，只能就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才有可能解决政治策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接着，在二十七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在报告中，毛主席首先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充分地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毛主席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毛主席对中国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他们和农民一样，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现在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在民族危机严重

的情况下，有没有变化的可能性。毛主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此，在今天殖民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变化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对于地主买办阶级，毛主席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们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叫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种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对于革命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样毛主席就有力的驳斥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反革命、地主买办阶级反革命营垒内不会分裂的错误观点。

毛主席正确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指出：由于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革命的总的形势是向前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还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把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和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因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积聚革命力量，打倒敌人的中心一环，是完全必要的。

据此，毛主席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

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毛主席在报告中彻底地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九一八以来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依然坚持打倒一切，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如果不用统一战线策略武器去射击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就会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孤立起来，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王明“左”倾关门主义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它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人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提出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吸收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赞成抗日反蒋的阶级与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参加根据地的政府，并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政策，如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并鼓励其发展等。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决不能违

反工农群众的基本利益，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主席的报告，深刻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从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同时毛主席提醒全党警惕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危险，使我党在新的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领导亿万人民迎接抗日民族战争的到来。

毛主席这个报告，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交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有时联合有时破裂的极端复杂尖锐的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仅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又联合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而以中国革命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理论，对于当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红军东征、西征和西安事变

瓦窑堡会议后，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进行了艰巨和复杂的斗争。

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给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航向。当会议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传达后，大家深受鼓舞，人心振奋。在陕北，县一级部长以上干部，都亲聆了毛主席的报告，大家从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推进抗日形势的高涨，为进一步清除“左”倾路线的影响，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六年一月，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等发出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党的抗日主张，表示希望首先同东北军实现停战一致抗日。

同年二月，为了实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毛主席亲自率领红军东征。当时组织了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过河后，我军所到之处，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争取和团结一切主张抗日的阶级和阶层，积极发动和武装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二十多个县的革命政权。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军阀阎锡山十分恐惧，他纠集其全部军队，拦阻我军东进抗日。同时蒋介石派了十个师三十万人进入山西堵截红军，并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为了保持抗日实力和贯彻团结抗日的政策，在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之后，于五月初回师河西。回师后，为了击破敌人散布的谣言，党中央宣布进驻保安（今志丹县）。

五月五日，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鉴于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冲突日益激烈，蒋介石政府在英美主子的指使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压力下，有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此，党从回师通电开始，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为了达到此目的，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为了扩大根据地，红军于五月底又向甘肃宁夏地区进发，开始了西征。

西征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南面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西面是马家匪帮。我党采取了在军事上打击马鸿逵的反动军队，一举解放了绥远、甘肃、宁夏广大地区，使陕北根据地

扩大到甘肃、宁夏，由原来十几个县发展到近三十个县，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进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广泛、深入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主张，不仅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而且由于我军在东西征时，主动而积极的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政治攻势，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对他们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我党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其反动统治和对外妥协投降政策，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再一次申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准备重建国共合作关系的愿望，建议两党能尽早地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党估计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不能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在此信中改用了形式上不同而实质上仍是一致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我党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变成了各种救国团体的共同纲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有了新的高涨。五月，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于上海，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团结御侮、联共反日的政策。十一月到十二月，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的工人数万人先后举行了反日大罢工。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鲁迅，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要无条件加入这个战线，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迅猛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营垒内部进一步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寇和伪军进攻绥远，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不顾蒋介石政府反动的妥协退让命令，奋起抵抗。这一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十二月国民党将领张学

良和杨虎城又发动了西安事变。

当时，驻西安的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由于在陕北进攻红军中屡遭挫败，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在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在一九三六年春便开始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实际停止了与红军之间的战斗，并一再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建议。但蒋介石不仅加以拒绝，反而调遣嫡系军队三十个师和一百架飞机，准备大举进攻红军并严密监视张、杨。十二月初，蒋介石携带大批反动将领亲自去西安，积极布置和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的罪恶行径，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忍无可忍，加之蒋介石又在西安屠杀抗日青年，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和西北军在临潼拘捕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的进攻，并乘机置蒋介石于死地，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竭力主张先设法营救蒋介石，反对马上进行“讨伐”。各地方实力派系头目，因为他们切身利益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有的对事变表示同情；有的主张杀掉蒋介石；有的两面讨好，居中调停。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分歧，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指望乘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十二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发表声明，威胁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

政府不能坐视。”它除公开表示支持何应钦打内战以外，还唆使韩复榘、宋哲元等亲日派主张杀蒋介石。英美帝国主义从它们的切身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打击日本的侵略政策。

这时，在我们党内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少数人，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持怀疑态度，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的错误主张。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纵观全局，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十二月十九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这一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并指出这一事变的发展有两个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日战争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反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使全国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以及一切抗日救国分子所希望的。

根据这个分析，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地决定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其中间派，反对和揭破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立场；给张、杨以积极援助，切实作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对于蒋介石的处理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认为，蒋介石是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他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根据这一正确方针，十二月十五日和十九日，党中央先后发出通电，要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召集和平会议。十六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亲赴西安谈判；同时将主力红军开向三原、渭南、西安附近，准备迎击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在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经过种种艰巨的斗争，蒋介石被迫于二十四日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次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遂和平解决。这是毛主席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正确，正是在这条抗日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党和红军的努力终于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红军进驻延安城。一九三七年一月，毛主席和党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我党为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必须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我党将停止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在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终于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降日的政治决议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我党提议的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决议案。至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基本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四、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新形势下，为了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党内不仅要继续肃清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恶劣影响，而且还要反对当时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掩盖下的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开始滋长。他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一九三五年冬在国外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抗日救国政策》等文章中，鼓吹阶级合作论，否认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继续进行贩卖革命事业的罪恶活动。早在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就在东北再次叛党投敌，严重地破坏了满州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一九三六年春，他窃据了党的北方局的领导职务后，把自己打扮成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代表，在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幌子下，竭力鼓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六、七月间，他以莫文华的别名发表了《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和《人民阵线和关门主义》两封公开信，绝口不谈党的领导权，大肆叫嚷“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不要“怕领导权被人抢去”。刘少奇在实际工作中，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搞合法主义，乞求国民党政府参加抗战，妄图把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拉向右转。八月，他还指使薄一波、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叛变自首，结成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叛徒集团。同时，思想一贯右倾的林彪，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天下。

为了唤起全党对新投降主义的警觉，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

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主席明确指出党的新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而“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因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要实现党的新任务，毛主席指出：在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同时，还必须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这时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主要表现在对时局的片面估计上。西安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正在逐渐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表面上暂时采取了某些和缓态度，这就使有些人认为“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他们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否认新阶段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提出，这在实质上是否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和一年多来为建立统一战线所作的种种努力。持有这种错误观点的人，企图在一个早晨把国民党的十年污浊洗刷干净；他们不了解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都是正常的现象；不了解要把革命推向前进，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努力。毛主席指出，为了把革命车轮继续向前推进，实现党的新任务，就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种“左”的倾向。

毛主席在报告和结论里，着重揭露和批判了党内正在滋长着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毛主席针对王明、刘少奇的“只要抗日不要民主”，企图以民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抹杀

国内阶级矛盾的右倾观点，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毛主席又针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的错误，尖锐地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只有坚决反对尾巴主义，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领导责任。

毛主席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在中国现阶段情况下，要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革命。”（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同时，毛主席还结合中国现实斗争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四个条件：（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的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前者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后者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以此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

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党的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主席还强调了党内民主，全党团结和培养干部等问题。指出：“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毛主席这两个报告，批准了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政治路线，为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

在国内革命战争向全国抗日战争转变的历史时期，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击败机会主义路线，教育全党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自觉性，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毛主席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的哲学著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这是一部关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以及对当时错误路线的大争论的总结，同时又提出了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系统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特别着重批判了王明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而且是一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又发表了伟大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践论》中，毛主席从物

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出发，着重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首先强调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阐述了认识论中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的飞跃。《实践论》指出，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这种认识只能从实践中产生，由于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的这种感性认识反复多次，在人的头脑中发生认识的过程的突变（飞跃）到达理性的认识。毛主席强调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论的天才论。批判了哲学史上的“唯理论”。与此同时，毛主席又指出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批判了历史上的“经验论”。

第二个飞跃是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主席指出，理论是重要的，但它的重要性，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强调经过实践得到的理性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这是认识过程更重要的阶段。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深刻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共同的思想根源，指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无论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他们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他们轻视社会实践，看不起人民群众，拒绝作调查研究，从根本上违反理论

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反对唯物论和辩证法，坚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响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当作真理，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脱离了实践，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着重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毛主席指出单凭经验，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还有犯错误的危险。我们党内有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由于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规律，因而经常容易上当受骗，做了陈独秀、王明一类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俘虏。

因此，要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必须做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把革命推向前进。

哲学上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归结蒂表现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为了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因此，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样，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首先指出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形而上学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进一步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又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起作用的。当我们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又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当我们清算了王明路线的时候，革命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毛主席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由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又说：“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要认识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在于具体分析具体的情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

魂。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在阐述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时，毛主席提出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对于矛盾不平衡情况的研究，不去分析每个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在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时，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毛主席还进一步论述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因此，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论者，他们不按事物的辩证法办事或者否认矛盾的斗争性，或者否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在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者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具体表现。

毛主席最后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

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我们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历史证明，党内犯路线错误的人，在毛主席和党的教育挽救下，绝大多数能够改正错误，继续革命。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正错误的。

《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从根本上清算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促使全党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主席的这两部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总结了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战胜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第六节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文化革命也深入发展了。文化革命深入发展的主要表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并日益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队伍的逐渐形成和向反动文化展开勇猛的冲击。文化革命的深入引起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们的恐惧。于是，他们在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发动了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化新军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人民军事反“围剿”斗争胜利的鼓舞下，英勇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这就形成了文化战线上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和农村革命战争相配合，成为当时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在文化“围剿”中，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反动文人、政客，在它们的刺刀保护下，打出种种招牌，疯狂地围攻革命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种种卑鄙的法西斯手段，对革命文化和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残酷的摧残。许多进步的文化团体和书刊被查封和捣毁，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被逮捕和杀害。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在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被查禁的图书杂志就达千余种。柔石等五位青年共产党员作家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枪杀，鲁迅也长期被“通缉”。鲁迅曾愤怒地指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艺术家’早以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在文化反“围剿”斗争中，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文化新军，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文化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使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归于惨败。这时候鲁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首先对形形色色的国民党走狗文人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对他们的疯狂的叫嚣，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里，深刻地批判了“新月派”胡适、梁实秋等人所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指出这些隐藏在虚伪的“人性论”背后的“学者”、“批评家”，实际上是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在思想文化界的“刽子手和皂隶”，是在“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等文章中，鲁迅斥责挂着“民族主义文学”招牌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王平陵、朱应鹏等一伙，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犬”，是一群“流尸”的堆积。他们的目标，就是按照主子的叱声，“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既欢迎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又拥护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其实质是反共、反人民的，是毫无民族意识可言的。鲁迅在《论第三种人》等文章中，愤怒地揭露了自称“自由人”的托匪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的假面具，指出他们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他们所标榜的“真的，永久的文艺”，在现实世界是没有的，他们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永远办不到的。鲁迅还写了《小品文的危机》、《论语一年》等杂文，把斗争

锋芒指向大肆提倡“闲情逸致”的“幽默”的小品文，以消磨革命人民斗志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周作人等人。鲁迅尖锐地指出“论语派”是一群“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他们的“帮闲文学”，就是要“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借以“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丧失斗志，任人宰割。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还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拿起犀利的笔作投枪，对中国历史上剥削制度的反动思想支柱——“孔孟之道”，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尊孔活动，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用大炮刺刀抢占我国东北后，在东京大造孔庙，制造舆论，扬言要在中国“建设”什么“王道乐土”，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恢复“孔子之教”。帝国主义的奴才，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公然向日本侵略者献计说：要征服中国只有“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一唱一和，也搬出孔老二这个“亡灵”来，作为文化“围剿”的武器。蒋介石的帮凶戴传贤（即戴季陶）鼓吹什么“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于是，“尊孔读经”之声，喧嚣一时。鲁迅在这时写下了《中国的两三件事》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讨孔檄文，揭露了敌人。鲁迅首先彻底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王道乐土”和“仁爱”的伪善面纱，揭露了他们妄图麻痹、奴役中国人民的凶残本相。他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出来的。”鲁迅辛辣地指出：蒋介石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听命国

联爷爷的孝”，就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离庖厨的仁爱”，就是“遵守卖国契约的信义”，就是“‘诱敌深入’的和平”。鲁迅同时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指出：孔老二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历史上那些大肆吹捧孔老二的人，都是“怀有别样的目的”，这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权势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企图获得权势的人”是为了爬上权势者的地位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拿孔老二来做“敲门砖”的政治投机家和骗子，历史注定他们必然灭亡。

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还奋不顾身地直接参加了政治斗争。他写了《友邦惊诧论》、《战略关系》、《文章与题目》和《天上地下》等一系列战斗檄文，猛烈抨击国民党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又以“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等诗句勾画了国民党达官贵人投敌逃跑，荒淫无耻的丑态。所有这些，都有力地配合着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在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的英勇斗争下，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和它的军事“围剿”一样，彻底失败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新民主主义论》）

二、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实质上是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它必然反映到党领导的左翼文艺界内部来，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文化战线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是鲁迅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在文化战线上的响影的一场严肃斗争。当时，创造社、太阳社里的某些人，由于受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教条主义地硬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妄图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文化战线上他们混淆了敌我，推行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多方面围攻鲁迅。鲁迅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在《“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文中，尖锐指出，他们只是一些“挂革命招牌”的“号称革命文学家者”，对国民党“暴力与黑暗”的反动统治，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都没有；他们的“所谓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他们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并非真的革命文学”，“都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针对他们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鲁迅严肃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这场斗争中，鲁迅是正确的，创造社搞唯心主义。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它既是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深刻总结，又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批判唯心论的战斗檄文，实际上成为指导左翼文化运动的纲领。

“左联”成立后，鲁迅又和周扬一伙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尖锐斗争。一九三〇年，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及其一伙窃取了“左联”的领导权，他们在政治上执行李立三、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上则以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为指导，形成一条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周扬一伙炮制的“左联”《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强调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却只字不提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强调“整饬纪律，严密组织”，把“左联”搞成一个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半政党”式的团体。周扬一伙以此来进一步贯彻王明路线，打击和排斥鲁迅所执行的正确路线。

但是，鲁迅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与陷害，一点也不避锋芒，他领导和团结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搏斗的同时，又同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起初，鲁迅为了帮助周扬一伙认识错误，曾多次给予严肃的批评和诚恳的忠告。在《上海文艺之一瞥》、《论“第三种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等文中，指出一个革命作家不要做“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不要堕落到“敌党的暗探”；在作品中，不能认为“骂詈越多，就越是无产阶级作品似的”。周扬一伙表面接受批评，实则怀恨在心。他们坚持宗派主义立场，招降纳

叛，结党营私，唆使同伙或亲自出马，化名发表文章，恶毒诬蔑和攻击鲁迅，甚至造谣恫吓，公开告密，挑拨离间，手段极为阴险卑劣。周扬一伙实际上充当了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别动队。对此，鲁迅曾愤怒指出：“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给杨霁云的信》）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早就提出过警告：如果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在红军长征胜利，日寇入侵加深，国内外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之时，“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的周扬一伙又追随王明，由极“左”跳到极右，于是，鲁迅又向周扬一伙的右倾投降主义展开了坚决斗争。

一九三六年春，周扬一伙按照王明在国外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抗日救国政策》等文所鼓吹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论调，公开提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并背着鲁迅，解散了“左联”，欺骗蒙蔽了一些人，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进一步围攻鲁迅。这时，陈独秀托派匪帮也跳出来与周扬一伙相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

六月九日，鲁迅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痛斥托派匪帮“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严正声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十日，鲁迅又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抓住统一战

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正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击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这次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次大搏斗。“国防文学”反动口号一出笼，大叛徒刘少奇就亲自出马，接连抛出黑文，替“国防文学”打气壮胆。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也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一方面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浪费气力”，应当立即“休战”，另一方面又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不可驳倒的”，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陈伯达还伙同章乃器等人，在《读书生活》上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的口号，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陈伯达连续发表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国防哲学”是投降主义的哲学，它为“国防文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有种种诬蔑和威胁，丝毫不能动摇鲁迅决不调和的严正立场。于是，周扬一伙采取了更为卑鄙的手段，对重病中的鲁迅大布围剿阵，指使徐懋庸写信攻击鲁迅。信中诬蔑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不应

“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信中还公开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对的”。鲁迅敏锐地看出“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代表着某一群”的“新的挑战”。他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病痛，扶病口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并花了四天时间亲自修改。文章再一次声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文章进一步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而周扬一伙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诬蔑，和对“国防文学”的吹嘘，只不过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更一针见血地揭露周扬一伙叛徒、特务、托派的丑恶嘴脸，指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还在《死》等文章中，严厉地批判了“休战”论者，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坚决表示他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在卧病期间，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奋不顾身地坚持战斗，充分体现了他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鲁迅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顽强战斗中，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

幸在上海病逝。鲁迅的一生，是共产主义者光辉战斗的一生。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崇高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三、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一场斗争

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接着又发生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反映，也是文化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的一场激烈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认清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还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因此，探讨中国社会的现在和过去，就成为理论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一九二九年，我党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但是，被清除出党的一小撮叛徒和托派分子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进一步同国民党反动文人勾结起来，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起猖狂进攻，挑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这一小撮无耻的叛徒、托派分子和反动文人们，为了效忠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他们创办的《动力》和《新生命》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劣手法，散布种种反动观点，来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历史。

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这一小撮托派分子竭力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所作的正确分析，否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独秀等人荒谬地认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便“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给自己的荒谬结论找到的根据是：帝国主义的入侵，绝对地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华洋资本应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两者加起来就足以压倒封建经济。他们并进一步宣称：帝国主义的工业与殖民地的农业也只是统一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他们只一般地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的不可调和，而不分辨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和侵入到一个丧失独立的国家内所起的不同作用。他们故意把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作用混同起来，并把分别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作用的人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实际上，他们是在无耻地歌颂帝国主义的侵略，赞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了“人间天堂”。陈独秀等一

小撮托派分子散布这些反动谬论，完全是为他们的反革命取消主义路线服务，为他们的“不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卖国方针服务。

在中国社会史问题上，托派分子撷拾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的反动观点，否认中国社会存在奴隶社会，歪曲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托派头目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三年就胡说什么“人类社会之历史，……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存在奴隶社会阶段。一九三七年，他在《实庵字说》一文中更大肆宣扬：中国奴隶都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因此中国氏族社会瓦解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就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他说：“谓古之中国氏族社会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则大误矣。”另一个托派头子杜畏之（又名杜沧白）也叫嚷：“中国的历史实际指出，在氏族社会内部怀有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五种形态的普遍真理为“死的成见”、“刻板的表格”。他说“历史是个活的过程，谁机械地固执了一种死的成见或方式”，使中国历史“合于干燥而刻板的表格，谁就是科学的罪人了”。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陈伯达，一九三五年五月发表了《殷周社会略考》他从反动的生产工具决定论出发，竭力宣扬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他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对于殷代，我们所能证实的，也只是由氏族刚脱胎出来的原始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直至殷代，铁还未曾参加生产的领域。”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经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这一小撮托派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文人还把中国封建社会说成是特殊社会，如什么“专制主

义社会”、“谜的时代”、“X社会”等等；并说什么春秋战国已是“封建社会解体开始的阶段”，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托派分子们极力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和歪曲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其恶毒用心就是反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企图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达到他们反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这场论战中，我党教育和影响下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初步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托派和国民党反动文人散布的各种谬论，比较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郭沫若同志曾根据他对卜辞周金文字和各种古代文献的研究，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肯定了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在，并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是封建社会，对这次论战作出了贡献。

毛主席在这一阶段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作了最正确最精辟的分析，对托派的各种谬论作了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光辉著作中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现实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毛主席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

指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沿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同道路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又说：“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是对托派散布的各种反动观点的一个全面批判，也是对这次论战的一个系统的总结。

这场论战，彻底揭露了托派分子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走卒的面貌，驳斥了他们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上的种种谬论，粉碎了阶级敌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进攻，捍卫了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推动了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深入发展。

第四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九月)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反对王明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一九三六年，资本主义世界又酝酿着新的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在日益逼迫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面前，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急切地要从冒险战争中寻找出路，加紧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内务、外务、陆军、海军、大藏五大臣）通过了以“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为中心内容的《基本国策纲要》。所谓“大陆政策”，就是侵占朝鲜、我国东北和内蒙之后，并吞全中国，进而霸占亚洲大陆。所谓“海洋政策”，就是以我国台湾为跳板，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独占西南太平洋。不论“大陆政策”还是“海洋政策”都把中国作为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强盗的“基本国策”，赤裸裸地暴露了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

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为了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

内一方面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生活等各方面的法西斯控制。一切工农运动都遭到残酷镇压，人民的言论、集会、通信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一九三六年，日本内阁设立了情报局，用以“指导”和“统一”舆论。从此，所有宣传机器，更大力地进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反革命舆论。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更积极地、更具体地进行着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一九三六年日本在华北增兵，在古北口建立炮台，在北宁线屯驻重兵，占领丰台作为切断华北与华南联系的重要军事据点。大批日舰驶抵青岛、上海并进入长江各埠。在华北及其他地区，用各种借口制造的局部事件日益增多。一九三七年，日本关东军进驻通县及平津一带，经常进行大规模的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在此期间，日本还召开了各种军事会议，具体研究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和步骤。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完成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一切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得到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支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日签订了反共协定。一九三七年，意大利加入了这个协定，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侵略的军事同盟。

英、美帝国主义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它们从维护其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出发，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拖住和削弱日本；一面又纵恿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扩大对日贸易，把钢铁、石油、飞机等大批战略物资卖给日本，据统计，一九三七年美国对日输出军需物资占其输出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八年占百分之

六十六，一九三九年占百分之八十一，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这就大大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嚣张气焰。

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它长期以来对外侵略政策的继续，是它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早就作了充分的估计。如前所述，早在一九三五年党的瓦窑堡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根据这一形势特点，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一九三六年七月，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领土和主权就能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毛主席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主席特别强调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问题在于动员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只有这样才能胜利地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之后，党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抗战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艰巨与复杂的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发动工作，使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进攻，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又进

攻上海，妄图一举灭亡中国，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狂妄计划。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我党中央立即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主张坚决抗战，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七月十三日，延安召开了全体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的准备，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工农红军立即集中，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行动，立即传遍全国。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怒火在全国各地很快地燃烧起来了。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

得道多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了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持，得到了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抗战开始不久就来到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二、洛川会议。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改变了中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全国除少数汉奸和少数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外，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抗日。但是由于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因此对抗战又有着不同的态度。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抗战最坚决最积极，

是抗战的基本力量；而工人、农民则是抗战的主力。

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维护他们的财产、权力和保持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出发，对全国人民的抗战，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政策。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他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破坏抗日和反共方面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利用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抗战一开始，我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重申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七月十七日党中央又派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由于我党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寇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蒋介石不得不接受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蒋介石政府仍然和日寇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寇和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到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于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被迫先后发表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和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具有新的特点。首先是作为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已锻炼成长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心支柱。这就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种种阴谋破坏而胜利发展。其次。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和目标是团结全民族反对深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包括的阶级和阶层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中小地主，甚至包括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是后一种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也没有适当的组织形式，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着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一贯采取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争取抗战的胜利，党坚决主张实行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总动员，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一整套办法，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就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国民党的路线是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属于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一贯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抗日。这时虽然被迫参加抗战，但他们的反动本性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毫改变。蒋介石一方面宣称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放弃妥协退让、准备投降的方针，他们鼓吹什么“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亡国论，并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妄图出卖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们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企图依仗它那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而对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十分仇视，极力反对发动人民起来抗日，并阴谋借日寇之手，“在抗日战争中

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这是一条民族投降主义的片面抗战路线。

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抗日战争中一切问题的关键，实质上是中国的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因此，抗战一开始，毛主席就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揭示了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指出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为了具体地确定党的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毛主席领导下，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指出芦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党在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深刻地分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预见到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指出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冲破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反对与全面抗战路线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针对党内正在开始滋长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毛主席尖锐地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问题，着重地强调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会议要求共产党员及党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概括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它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强大武器。

为了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又决定以下具体行动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洛川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转变关头，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战斗的行动纲领和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方针政策，坚持了党对抗战的领导权，使抗日战争有了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指出，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战争和战略问题》）因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缩

小敌军的占领地，扩大我军的根据地，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人心，然后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步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但是，只有游击战争，而没有根据地也是不行的。毛主席指出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没有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洛川会议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挺进华北、华中敌后，积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早已开辟的陕甘宁边区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抗日的指导中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一九三七年八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同志任总司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巩固抗日后方，八路军留下一部分部队，大部分部队由陕甘宁边区出发，于九月初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敌后战场。十月，红军长征后留在华中地区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同志任军长，下辖四个支队，挺进大江南北。

为了具体实现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毛主席明确地指示：八路军要分散兵力，深入敌后农村，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彭德怀及其同伙林彪拒不执行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主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

击战的战略方针和关于建立吕梁山根据地的指示，而在山西依靠国民党搞所谓的“运动游击战”。毛主席与彭德怀、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指示》，严厉批评了彭德怀、林彪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错误，指出了山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指示八路军必须执行真正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我军要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主，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大仗为主。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作出了《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全华北党必须注全力于游击战争。毛主席还从九月至十二月多次打电报给林彪，指示他必须到吕梁山区，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毛主席的坚决斗争下，林彪才不得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吕梁山区。

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挺进华北敌后时，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依靠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在粉碎和击溃敌人的进攻和围攻中，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依靠着这些根据地，有阵地有依托地向前进攻；东面跨过平汉线，东北面达到北平的门头沟、昌平、丰台等地，北面靠近平绥路，有力地打击着日本侵略者。

在晋察冀，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七年秋挺进晋东北敌后，在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收复的地区已达五十多个县，随即在党的领导下，于一月十日，在河北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一九三八年春又挺进北平西郊，开辟了平西根据地，同年四月，建立了冀中抗

日民主政权。六月间，又深入冀东，开辟了冀东根据地。

在晋东南，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于正太线痛击日寇以后，首先创建了太行区、太岳区两根据地。同年十二月，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四月，又粉碎了敌人三万余兵力的九路围攻，奠定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二九师还派遣部队越过平汉线，进入冀鲁豫大平原，先后开辟了冀南、冀鲁边、冀鲁豫等根据地。上述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建立统一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在晋西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国民党放弃太原后，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下，在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一二〇师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的进攻，收复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推动了晋西北抗日局面的迅速发展。同年八月，一二〇师一部北上绥远，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大青山区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在山东，我党地方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冬即在敌后组织了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秋，山东全省的人民武装发展到九个支队，达三万人左右，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并在胶东的蓬莱、莱县、掖县，建立了抗日政权。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山东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华中，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新四军除军部和三支队留守皖南外，其余部队分江南、江北两路东进，深入敌后，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解放区和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随后又开辟了淮南解放区和淮北解放区。

在东北，芦沟桥事变后，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发展到十

二个军，在日寇的层层封锁、残酷扫荡的艰难条件下，仍坚持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总计从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四万余人发展到十八万人，抗击着四十万敌军，占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截至抗战第一周年，八路军、新四军已毙伤俘敌伪军三万余人。经过一年半的战斗，我敌后军民建立了大小十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五千万以上。解放区战场的胜利发展，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粉碎了它企图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坚决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民族救星”的声浪传布全国。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伟大胜利。

与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相反，在国民党战场上，由于蒋介石实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则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寇于八月一日占领天津，八月十日侵占北平，八月二十六日占领张家口并继续向晋绥进犯，十一月占领太原和包头。在津浦、平汉线，敌军于九月二十四日攻占保定之后，越过黄河，于十一月十二日占据济南。在东南方面，敌军于十一月十二日占领淞沪后，便沿京沪线向南京进攻，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十二月二十五日杭州也被敌侵占。这样，华北五省的主要城市，以及津浦、平汉线之一部、东南的上海、南京，和京沪、沪杭两线都陷于敌人铁蹄之下。不仅如此，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寇侵占开封，蒋介石不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下令炸毁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止日军前进。结果黄河在花园口改道南流，淹没豫、皖、苏平原六十余县，使八十九万人死亡，五百万人流离失所，并造成连年灾荒的

黄泛区。而日寇仍迂回进攻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仅一年零三个月，蒋介石国民党就从华北、华东、华中一直退到四川，使中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沦陷区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日寇占领南京后，把居民当作活靶，在全城展开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的“大竞赛”。在一个多月内，全市被烧毁房屋达三分之一，被屠杀的群众达三十万人以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反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带来的严重恶果。

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抗日战争开始后，党胜利地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但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第二次建立，象潮水一样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阶级、两条抗战路线的复杂斗争，在党内有了严重的反映，开始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倾向。

早在洛川会议前后，彭德怀等人就提出了一系列右倾主张。他们否认国民党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力量，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取得抗日战争的速胜，反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他们主张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兵力搞所谓“运动游击战”，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他们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因而反对毛主席关于陕甘宁边区要留兵防守的正确意见，主张全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出现某些人不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新军阀主义。有些部队迁就国民党的干涉，一度取消了政治委

员制度。在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上，也出现了右倾主张。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改编时，闽粤边区游击队负责人何鸣对蒋介石消灭我军的阴谋缺乏警惕，以致千余名游击队员集中起来，竟被国民党包围缴械。新四军成立后，其主要负责人项英一心想背靠国民党后方，一切依赖和迁就国民党，反对向敌后发展，不敢独立自主地扩大新四军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有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放弃党对政权的绝对领导；有些地区对国民党特务、土匪、暗探斗争不力。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产生了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如西安市委迁就了国民党所谓“统一救亡团体”的无理要求，解散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使西安地区的抗日群众斗争遭到严重的挫折，等等。

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正如列宁所说：“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四九页）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改变对我党进攻的策略，过去的敌人，今日以“朋友”的面貌出现，对我党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叫嚣“停止阶级斗争”，进行所谓“共产党投降”的广泛宣传，对我党、红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限制和削弱的政策，以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等卑鄙手段来引诱腐蚀我党干部，这就使党内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迷失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这就使国民党的影响通过这些因素在我党内有了反映，产生了

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出现，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上，就尖锐地提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洛川会议后，党又采取各种措施，对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参加政权问题上，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参加地方政府，只能“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和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在八路军中，党也向新军阀主义倾向展开斗争，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也及时恢复了，坚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日根据地也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坚持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坚持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在各个地区和国民党的关系上，也都开始纠正了无原则的迁就倾向。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并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迫切任务。

在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个不同集团。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毛主席着重指出作为右翼集团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因此，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毛主席再一次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毛主席指出国共两党的抗战主张存在着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因此，“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但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

在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

毛主席唤醒全党同志应记取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投降主义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坚决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

内部的阶级投降倾向，并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主席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是指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文献，是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开反对毛主席这个报告。

早在抗战爆发前，王明就歪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背着党中央，在国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鼓吹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领导了党内已经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并把它发展成为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提出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理论，公开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随后，他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发表所谓《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并炮制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和《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等黑文，大肆鼓吹孔孟之道，胡说忠、孝、仁、勇等封建道德在抗战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使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为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造舆论。

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根本错误，就是反对毛主席规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送给国民党，鼓吹国民党政府是什么“领导抗战的中枢”。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的阶级集团，抹杀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无视两条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王明主张“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认为在统一战

线中划分左中右，就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前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王明甚至无耻地美化国民党和蒋介石，胡说什么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吹捧蒋介石是什么“抗战建国领袖”，是什么“不朽的民族英雄”。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王明就提出了许多荒谬的主张。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王明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对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王明认为不应采取“已成事实的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这样对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先由阎锡山批准，再由阎呈报蒋介石。这实质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

王明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无原则退让，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敢在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他甚至提出“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的荒谬口号，主张把八路军、新四军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以适应国民党吞并我军的反动要求。

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王明反对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而醉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斗争。他所进行的合法斗争，又不是认真组织城乡广大群众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而是致力于拉拢国民党的上层，迎合国民党的反动要求，拿党和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作政治交易。例如要求民众团体“向（国民党）政府机关登记，并接受政府的领导”，企图以所谓“建议”、“赞

助”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在战争的指向上，王明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主张“普遍的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错误方针。王明夸大国民党的力量，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超过相信群众，宣扬国民党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经济力量最雄厚，军事力量也最强大”，是“抗日前政治经济中心力量。”他认为依靠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就能迅速取得抗战的胜利。由此，王明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而热衷于帮助国民党策划“保卫”武汉等大城市的活动。

在抗战的前途上，王明把人民解放同民族解放对立起来，把争取民主同坚持抗战的胜利对立起来，认为抗战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而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的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而只能是国民党的天下。

总之，抗日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与一九二七年里陈独秀一样，自愿地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完全适应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需要。王明当时窃踞长江局书记职务，他为了贯彻其投降主义路线，竟然不顾党的组织纪律，无视中央的指示，妄图凌驾于党之上，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宣言和文章。由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中顽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长江流域的革命武装丧失了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并在项英负责的新四军工作中产生恶劣影响，造成以后“皖南事变”中的惨痛损失。

四、《论持久战》的发表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在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下，国民党战场一溃千里，

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的亲日派就大肆叫嚷“再战必亡”，极力鼓吹“亡国论”，为投降制造借口。蒋介石集团也是“亡国论”的鼓吹者。他早就高唱“三天亡国”的论调，说什么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但蒋介石集团在被迫抗战后，他们从侥幸心理出发，又幻想依靠外援取得速胜。八·一三事变时，他们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可以取得胜利。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由于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牵制了日寇兵力，国民党在台儿庄集中四十万军队对日军七八万人，取得歼敌七千的胜利（国民党军队损失的兵力更多），这一战更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速胜论”就更加传播开来。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一再溃败之后，他们又重弹起失败主义的“亡国论”。

当时，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也在鼓吹“速胜论”。他们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取得速胜，宣称“南京军队表现他们能够抵御日本机械化部队从海陆空各方面的攻击”，认为不出四年就可以打败日本。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则诬蔑说，“现在大家都喊游击战，好象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

“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叫嚣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因此，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战争的发展是持久还是速胜？怎样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就成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为了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

毛主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从这个根据出发，毛主席指出敌我双方存在着以下四个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

第一，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这就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

第二，敌退步，我进步。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内外矛盾已使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它所发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因而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而且是处于进步的时代，有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这个战争性质上的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必败、中国抗战必胜的主要根据。

第三，敌小，我大。日本是小国，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第四，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由于敌我的战争性质不同，日本在战争中将遇到日益增长的国际反对力量，中国则将得到国际的广大援助。

根据上述唯物辩证的分析，毛主席作出了“抗日战争是

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英明论断，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毛主席指出：“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而忽略了其他有利条件，使人们产生妥协倾向；“速胜论”者则夸大了其他有利条件而忽视敌强我弱这一不利条件，使人们产生轻敌倾向。二者都是认识论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都是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毛主席还根据上述特点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的发展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主席指出现时敌我强弱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日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但是，敌强我弱的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加以我们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也将发生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则逐渐下降，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与此相适应中国将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则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最后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整个抗日战争进程证明，毛主席所揭示的抗日战争发展规律是完全正确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还具体地指出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毛主席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

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为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抗战的胜利，毛主席着重指出，必须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把全国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主席痛斥了反动的“唯武器论”，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那么，怎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呢？毛主席指出，必须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和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方法告诉军队和人民，并实行全民武装，使战争与人民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毛主席明确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而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这里，毛主席把人民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把建立新中国与坚持抗战紧密地联系起来，教导人们努力争取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王明所宣扬的抗战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而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的投降主义观点。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指导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以争取抗战的胜利，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同时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

文中，还进一步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

毛主席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是广大而持久的。它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它将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对敌人的包围，并在斗争中不断地积蓄力量，逐步提高，向运动战发展，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影响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者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把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的错误观点，毛主席强调指出，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作战方针，毛主席运用和发展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应该“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行这一方针，“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论持久战》）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以至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可以实行战略反攻，把日本驱逐出中国。

《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道路。它有力地粉碎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

抗战路线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部伟大著作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既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关于矛盾运动及其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的分析，关于自觉的能动性对矛盾转化的促进作用等论述，关于实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等理论和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战术原则等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杰出贡献。《论持久战》不但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当前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被克服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出现，毛主席就坚决同它进行斗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党中央在给长江局和东南局的一些指示中，就明确指示王明，必须坚决从城市组织力量到农村去，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为此，即使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但王明坚持错误，拒不执行。《论持久战》发表后，王明不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中央一再指示也不执行。相反，王明不经中央同意，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擅自发表他起草的《保卫武汉坚持第三期抗战的意见》，把保卫武汉视为战略重心，幻想以此作为全国反攻的起点。一九三八年八月起，日寇开始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迅速溃退，事实证明，王明的保卫武汉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抗日战争的发展，日益暴露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了总结抗战十五个月来的经验，彻底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九三八年

十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是抗战以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光辉总结。

针对王明否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的反动观点，毛主席严肃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指出“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并深刻地论述了如何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发出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同上）

针对王明抹煞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否定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毛主席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同上）毛主席深刻地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精辟地阐明了统一战线

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指出在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的原则下，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口号，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针对王明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投降主义的纯消极让步，毛主席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错误，毛主席在结论中总结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说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毛主席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毛主席还论述了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再一次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決定因素之一。”（《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主席这三篇光辉著作，有力地驳斥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坚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深刻地阐明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政策。但王明仍坚持错误，拒不改正。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报告，继续兜售投降主义黑货，向国民党蒋介石卑躬屈膝，声言对蒋要“诚心诚意地拥护”，妄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一党一党的私利。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毛主席的报告和结论，批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否定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全会还撤销了王明负责的长江局，解除了王明的长江局书记职务。鉴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事实以及张国焘反党叛党的罪恶行为，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提议，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规定不经中央同意，党员个人不得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宣言和文章。全会并制定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这一切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的贯彻，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第二节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 坚持进步。粉碎国民党 的反共投降活动

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占领了广州、武汉，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重要变化，抗日战争从此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一年多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和“闪电战”的战术，占领了我国高平、包头、武汉、广州以东的广大地区，大大扩充了领土、人口和资源。但与此同时，敌人的致命弱点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敌人以少兵临大国，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交通要道等狭小的地带，后方十分空虚，而且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丧失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敌人进攻的锐气已大为减弱，士气颓废，特别是在战争领导集团内部由于“速战速决”战略的迅速破产，滋长了深刻的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情绪；在日本国内，一百亿日元以上的军费支出，使财政经济危机严重，人民的厌战情绪日益增长，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相反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持久战和战略方针，深入敌后，在觉悟空前提高的广大人民配合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猛烈地打击日寇，解放了大片的土地和人民，先后建立了十几块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这些根据地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形成了许许多多对敌人的包围圈和夹攻敌人的火线，八路军建立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绥根据地就从三面

包围了同蒲铁路和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此外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都出现了我根据地包围敌占区的大好形势。总之，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了抗战的主力军，解放区战场已经成为主要战场；日寇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逐渐集中侵华兵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回过头来保守其占领区，进攻解放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了。毛主席曾英明地指出：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论持久战》）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的政策重点却变了。战争初期，敌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现在敌人转而采取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集中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声称要和国民党谋取妥协的和平，放弃过去不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的政策，取消“反蒋”口号等等。从一九三九年起，日本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国民党的重大军事进攻。之后日寇又弹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滥调，挑动国民党反共，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还进一步表示，只要国民党投降，日本军队可以退出华中和华南，华北也可在名义上

属于中国，并以“合办实业”为名，允许中国资本家在华中、华南投资百分之五十一，在华北投资百分之四十九，作为诱降的钓饵。

面对德、日、意三国法西斯的侵略政策，美、英、法三国采取了姑息养奸、纵容侵略的所谓“不干涉”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英、法同德、意签订了所谓“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换取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自己则“坐山观虎斗”。结果是美、英、法三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首先侵占英法的势力范围波兰、捷克等地。在东方，英法为了确保它们在远东太平洋上的殖民利益把日本帝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竭力策划“远东慕尼黑”，企图以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为名，再次出卖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英等国际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政府不断施加压力，示意他议和投降，美驻中国大使更往返于蒋日之间，劝蒋介石向日本投降。

自从抗战开始以来就存在着投降反共倾向的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战争的失败和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愈战愈强的现实，在日寇加紧诱降、美英积极劝降的情况下，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仇视共产党的情绪日益发展起来。抗战相持阶段刚到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就发生了分化。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内一小撮亲日派以汪精卫为首公开投敌，同日寇秘密地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条约，并在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汪伪“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还留在抗日阵营内，但其投降倾向也在迅速增长。为了准备投降日寇，他们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决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它企图依赖美英帝国主义

“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同时设立“防共委员会”，秘密颁发《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了许多“集中营”，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他们还派遣特务潜入陕甘宁边区搞“点线工作”，进行破坏颠覆活动。此外，国民党还把军队主力从前线调回，一部分龟缩在西南和西北后方，避战观战，保存实力，还有几十万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准备内战。一批专吃磨擦饭的反动将领则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蓄意挑衅。从一九三九年四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和湖北东部等地制造一系列惨案，围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及家属，企图再次挑起内战。

正当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倾向冒头的时候，毛主席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指示和演讲，及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毛主席指出，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不是孤立的，它说明了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已经成为最大危险，而反共则是他们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因此，全党“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斗争，党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了三大政治口号，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

进步，反对倒退。”针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活动，毛主席代表我党宣布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针对河北等地发生磨擦问题，党中央指示我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七月，我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制造反共事件，实行所谓“限制异党”，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紧接着延安各界人民在八月一日召开了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并发出电报对蒋介石表示强烈抗议。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部队指战员和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了形势，积极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为击退蒋介石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做好准备。

二、《〈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时刻不忘阴谋破坏我们的党。尤其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他们在制造严重的磨擦事件和掀起反共声浪的同时，还企图从思想上溶解我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取消共产党、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甚至派遣暗害分子混进我们党内，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任务也比过去艰巨得多了。

经过三年多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党已经从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然而，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缺乏足够的革命经验，对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而我们党当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方面的教育。近几年建立

起来的大批新组织还不巩固，而且还混进了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同时，老党员也存在进一步提高水平的问题，原有组织也存在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的问题。

这时，在怎样进行党的建设这个根本问题上，叛徒刘少奇对抗毛主席的马列主义建党路线，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抛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黑报告。在《修养》中，他闭口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作斗争，也不谈党的政治路线，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对孔孟之道顶礼膜拜，关起门来去搞“吾日三省吾身”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意识修养”，身体力行孔老二的“忠恕之道”做到能够“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他所兜售的这一套东西，实质就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用一条右倾投降主义的建党路线，把党员“修养”成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完全适应了蒋介石“溶共”政策的需要。

为了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使党更有力地领导全国人民去夺取抗战和人民革命的胜利，一九三九年十月，毛主席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十八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毛主席指出了当前党的建设的任务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國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里提出了进行党的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原则，那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党过程中，是坚持这条思想原则，还是脱离当前的革命实践搞什么“修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两条建党路线的根本分歧，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生动地证明，当我们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党的发展就受挫折，革命就要失败。而当我们党更多地学会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党就兴旺发达，革命就会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要贯彻这条思想原则，不仅要求我党的干部更多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必须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规律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民主革命有哪些最基本的特点呢？

毛主席深刻指出，一个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十八年来，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这一规律。他们或者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表现为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或者忽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方面的原则区别，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一损一益的私利，表现为陈独秀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都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特点，是“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

装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就是游击战争。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陈独秀、王明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不是放弃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就是轻视党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毛主席深刻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了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当我们党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时，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经过十八年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正确地掌握三大法宝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了。

实践证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就会后退一步。因此，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过程；党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实现的。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

《《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的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在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党的建设的思想，是古田会议提出的坚持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教育的伟大思想

的进一步发展。它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彻底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建党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谬论，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和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相配合，蒋介石国民党策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变本加厉了。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胡宗南部攻占了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和镇原五座县城。十二月，山西省国民党阎锡山的爪牙孙楚以六个军的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并在晋东南破坏了阳城、晋城、沁水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被屠杀和逮捕的达二千人。次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派遣朱怀冰、侯如墉、石友三等部分三路袭击太行区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奋起自卫反击，给国民党进犯军以“礼尚往来”的迎头痛击。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我八路军三五九旅立即从华北敌后调回，协同边区的留守部队，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猖狂进攻，并且解放了国民党控制的绥德分区的五个县，赶走全部国民党行政人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联成一片。在山西，我军利用蒋、阎之间争夺晋东南的矛盾，集中力量首先打击积极进攻我军的孙楚，并将新军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在太行区，我军先打击附敌有据、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侯如墉部，再打击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第三仗一举歼灭朱怀冰部三个师。

在军事反击取得辉煌胜利以后，为了尽可能争取蒋介石集团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党中央毛主席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及时结束反击战，并在同反共顽固派的谈判中继续揭露其投降反共阴谋。到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党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继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投降危险依然存在，时局尚未根本好转。我党的任务就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积极发展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坚决反抗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当时党内有些人没有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左右摇摆。彭德怀这时从极右跳到极“左”，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国共合作已经破裂或者很快就要破裂，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全面内战又要出现了等等。他们怀疑在抗战中，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只看到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倒退的危险，看不到时局好转的前途。他们从上述错误估计出发，以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不加区别地把国民党都看成是顽固派，不注意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忽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主张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这种“左”的倾向，一度成为党内主要危险。与此同时党内还存在右的倾向，他们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抱幻想，甚至被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所迷惑，对国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为了从政治战线上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批判党内的错误倾向，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武装全党，毛主席于一九四〇年全面深刻地总结了我党同国民党顽

固派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毛主席总结了党在各个革命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反复论述了执行党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针对当时的形势，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

毛主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而“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主席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时，指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那种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毛主席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相互关系，重申了我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进步势力充分体现了我党的方针的基本点，这就是发展壮大人民力量。进步势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进步势力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它只有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顽固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才能发展起来。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

方实力派。他们虽然同工农群众有矛盾，但同顽固派也有矛盾。所以当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作斗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参加，大部分人则往往采取不同程度的中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我们和顽固派都在争取他们。因此，中间势力的去向，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所以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最严重的任务。毛主席指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中间派的利益，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一步步地取得胜利。如果缺乏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甚至会成为顽固派的同盟军。

反对反共顽固势力。反共顽固势力指的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两面性，它一面和日本有矛盾，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广大人民对立。它采取一方面口喊团结抗日，一方面又摧残进步势力的反革命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它，这就是说对它还能抗日、还不敢从根本上破裂统一战线的方面，采取联合的政策；而对它反共投降的方面，则采取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如果我们不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特别是对它反共投降的方面如不进行坚决的斗争，统一战线就会破裂，进步势力就会被消灭，就没有力量阻止它们投降，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关键。

在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遵循“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论政策》）的重要策略原则，这是我们党在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我们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

进步势力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毛主席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三项原则。“有理”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利”就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利用顽固派的矛盾，首先打击那些最反动的部分，把斗争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有节”就是休战的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打退顽固派的进攻而它们又没有举行新的进攻的时候，我们应适可而止，实行休战，决不可胜利冲昏头脑，无休止地斗下去。

毛主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各地具体政策，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它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利用各种矛盾，发展自己，团结同盟者，打击敌人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纠正了党内“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抗战的胜利发展。

四、《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时，雇佣了玄学鬼张君勱，托派分子叶青以及一批御用反动文人。在蒋介石授意下，他们摇动笔杆枪，乱唤乱叫，乱打乱刺，向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宣扬“一次革命论”的反动滥调，胡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

割据呀等等，不一而足，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这些反动家伙重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老调，为坚持法西斯一党专政和反共投降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斗争的继续。

在我们党内，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应声虫，在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散布了不少谬论。抗战以来，王明吹捧法西斯头子蒋介石，美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否认抗战的前途是人民的胜利。刘少奇、彭德怀则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要在解放区建立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专政，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混进党内的托派分子陈伯达，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在这本黑书中，他抹煞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大肆鼓吹蒋介石宣扬的反动的三民主义是什么“救国主义”。他胡说三民主义不仅要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中古制度前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这些谬论的要害就是贩卖孔孟之道，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吹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维护蒋介石法西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由此可见，抗战以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严重的。这一场斗争的前途怎样，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批判党内修正主义路线，我党必须在理论战线上同上述一切反动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用革命理论击破反动理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此期间，

毛主席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为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指明了胜利的航向。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毛主席批判了托派分子鼓吹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指出了两个革命过程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只有完成前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托派分子叫嚷“一次革命论”的目的就是企图消灭一切革命，反对将抗战进行到底，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中国现阶段进行的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了。这是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哪些特点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十月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资

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在这样的时代里，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因此，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也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毛主席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由于本身的发展壮大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政治力量了。它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而且单独领导了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伟大的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两面性，决定了它不愿和不可能把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

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核心。它是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历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中心问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在这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因此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根本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专政之所在。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在抗战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三三制政权。我党

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这种新型的政权，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毛主席驳斥了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之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都不容许在中国出现资产阶级专政。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强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赞成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所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过时了。至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而是极端反动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严正警告反共顽固派：企图在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的人民，自己独占胜利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等待它的必定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以什么思想指导革命，这是关系革命成败、中国向何处去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因为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因此，中国新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的指导是决不会成功的，更不必说社会主义革命了。毛主席还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反共顽固派鼓吹的“一个主义”就是要分裂统一战线，就是要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王明之流抹煞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不要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再加上社会主义欣欣向荣、资本主义日暮途穷的有利于我的国际条件，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必然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毛主席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全面深刻的分析的基础上，将这个革命概括为一个公式：“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指引我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的根本保证。

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国家政权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允许那些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建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一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

争，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丰富经验，深刻地阐明了关于文化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

毛主席首先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整个思想文化战线，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的。剥削阶级总是把极大的注意力倾注于意识形态这个“世袭领地”，并从这个“领地”出发，用旧思想、旧文化这些精神鸦片来麻痹腐蚀群众，破坏人民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政治、经济革命的同时，必须相应地进行文化革命。一切轻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忽视文化革命的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毛主席高度重视革命文化的伟大作用，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这是我们进行文化革命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它明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展开批判斗争，无产阶级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文化战线，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决不能搞统一战线，也决不能休战。我们必须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武器，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主席还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

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当时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唱尊孔读经的时候，也是王明、刘少奇之流竭力吹捧孔学的时候，毛主席的精辟分析，既揭露了尊孔读经的反动本质，又从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限，划清了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家、思想家同机会主义者的界限。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地批判了尊孔反法制的反动思想，而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刘少奇、林彪之类，又都是顽固的尊孔派。

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一个发展规律：革命文化只有在长期反复曲折的斗争中才能前进。旧思想、旧文化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根子既深又广，渗透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不经过长期反复的艰苦奋斗，是不可能彻底消除它的影响的。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道路无论怎样曲折，前途是无限光明的，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我们既要有一股热烈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对于古今中外文化思想，必须采取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要吸收无产阶级用得着的精华，而排除其糟粕。那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所谓“全盘西化”，形式主义和颂古非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无情地剥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武装，打退了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我党的进攻，而且从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了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统一提供了理论指导。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科学地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这就极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思想，对世界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人民抗日力量的大发展。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又与日寇、伪军进行着生死搏斗。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敌后斗争的方针，因而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蓬勃的发展。抗战三年来，仅八路军就毙、伤、俘敌伪军四十万人，充分说明了游击战的巨大威力。到一九四〇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在三年作战中收复县城一百五十座，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亿，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八十万。从东北、华北直到广东和海南岛，都有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成为全国范围的人民群众的大革命了。

敌后各根据地开辟后，党又领导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陕甘宁边区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最早的地区。还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边区就进行了普选运动，十一月，成立边区各级人民民主政府。一九三九年一月，发

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晋察冀，一九三八年一月，举行了边区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了边区行政委员会。晋东南太行、太岳地区，一九三八年设置了各级行政会议，接着建立村政权。一九四〇年八月，冀南、太行、太岳各区成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一九四一年通过选举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此外，山东、华中敌后根据地，也都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我们党领导的又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了敌后各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了。

与此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相应地建立了我军前军区、军分区，深入发动群众，发展民兵、游击队组织，开展野战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

在经济建设方面，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以前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政策。在农业方面，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调剂劳动力；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籽的困难，并发放农业贷款，流通农村资金。在工商业方面，奖励手工业生产，发展合作运动；严禁垄断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同时，为适应军队和机关的需要，国营经济也积极发展。

在敌后各根据地，则大力贯彻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当建立根据地的初期，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因此各根据地虽有减租减息的明文规定，但明减暗不减和地主向佃户夺租夺田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经过各地普选运动地开展，各级政权机关得到整顿，群众觉悟也普遍提高，减租减息政策才逐渐贯彻下去。以晋察冀边区为例，一九四〇年实行了二

五减租（地租不得超过千分之三七五）和一分减息（放债以年利一分为最高标准，超出者减去），取消了一切正租以外的杂租、小租、劳役等额外附加和现扣利、出门利、利滚利等一切高利贷剥削。此外，为保护农民利益，晋察冀边区还掀起了清理旧债和“抽地换约”运动，即未死亡抵押地，要按年利一分订立新约，将土地抽回。这样，一部分在抗战前被高利贷者巧取豪夺的土地，就被农民抽回了。其它根据地减租减息的情况也大体相同。通过减租减息，限制和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因而推动生产的发展，使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在文化教育方面，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及时地出版和发行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革命人民，指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报刊、通讯社工作也大大加强，除《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外，各抗日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报刊杂志。一九四一年五月《新中华报》改名为《解放日报》，同时新华社在各根据地设立了分社。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根据地还开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同时大力推行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使解放区的文教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这对于提高人民觉悟，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们都把矛头对准着中国共产党。但是，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反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还是国民党军事上经济上的封锁，都阻止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解放事业。中国解放区在敌后猛烈地发展着。八路

军、新四军已活跃到滨海区域和长江下游。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法西斯订立了军事同盟，妄图吞并全球。日本因此加紧了对中国解放区的“扫荡”，对国民党则加紧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顽固派以为有机可乘，便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起来，进攻我党，于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一年春，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再次指示全党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为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投降危险而斗争。但是林彪、彭德怀等却顽固坚持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再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四〇年七月，林彪在苏联共产国际杂志上公开发表反党文章，反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根本不提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却连篇累牍地美化中国法西斯头子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鼓吹全国军队都听蒋介石的指挥，极力散布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幻想。

八月，彭德怀擅自调集我八路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万人，在华北敌后战场全线出击，发动了所谓“百团大战”。这次战役虽经解放区军民英勇作战，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适应了蒋介石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的罪恶阴谋，也适应了日寇寻我主力进行决战的需要，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种军事冒险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更为无耻的是彭德怀还企图以“百团大战”来“保卫重庆”，“保卫西安”为蒋介石撑腰，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右倾投降主义的丑恶咀脸。

在大江南北，身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和政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从一九四〇年春天开始，国民党顽固派

就不断对新四军大搞磨擦，妄图乘机消灭新四军。可是项英在皖南借口所谓“江南特殊性”，一再拒绝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具体指示，否认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敌后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工作上和组织上缺乏必要的准备。

一九四〇年五月，毛主席为党中央给东南局写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指示批判了项英强调特殊性，反对发展的方针是错误，指出必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們手中”。中央再次强调了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十万人枪的具体要求。

毛主席还批判了项英认为党越发展，蒋介石越投降，党越退让，蒋介石愈抗日的修正主义谬论，指出只有斗争才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同时提醒东南局要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严重错误。

中央的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并立即执行了。六月，他率苏南部队渡长江向北发展。在八路军第五纵队的配合下，黄桥一役歼灭了无理进犯的国民党顽军韩德勤的主力，打开了苏北的局面，形成了以皖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根据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项英仍然无视中央指示，对于国民

党的可能的进攻，依然不作准备。

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了“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的河北、山东北部、山西北部 and 现在的内蒙一带地区，阴谋在北移过程中歼我军。他们还无理要求把五十万人民军队缩编为十万人。自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十一月九日，我党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的名义，发出“佳电”。在电报中，我党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揭发了他们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荒谬要求。但是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我党同意将新四军江南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另外电告项英提高警惕，认真准备渡江北移，并强调了不走国民党指定路线。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驻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余人由皖南泾县的云岭起程北移。七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七万多反共军队预先周密策划的突然袭击。由于项英事前不做准备，北移又不按中央指示的路线走，临阵又惊慌失措，我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革命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十七日，头脑昏昏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出通电，宣布什么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并要对叶挺进行所谓“军法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针对顽固派十七日的通电，中共中央军委于二十日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为了反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我党的肆意诬蔑，毛主席以中共中

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于二十二日发表谈话，痛斥国民党反共投降、蒋日勾结“剿共”的阴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要求，作为解决时局的根本办法。毛主席在谈话中还严正警告顽固派，“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第一个《十二条》的提出，成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的行动纲领。紧接着各解放区广大军民纷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坚决声援新四军的斗争。在重庆，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的罪恶，击败了他们封锁消息、歪曲事实、蒙蔽群众的阴谋。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委任新四军七个师的师长。次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正式宣告成立。在八路军的有力支援下，新四军向窜犯的国民党顽军实行猛烈反攻，彻底肃清了他们在江北的残余势力，建立了七个解放区和江南的二个游击区。在反顽军的斗争中，新四军不是减少了，而是由原来的十万人发展到十三万五千人。

由于我党在斗争开始时采取“佳电”的正确立场，使我党转入猛烈的反攻以后，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的各阶层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纷纷发出通电，反对反共内战，要求团结抗战。全国大多数的中间派人士在严重斗争的现实面前，对顽固派消灭异己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他们在事变中由开始劝我党让步转为支持我们的反击行动。在我党的推动下，他们开始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民主党派，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反动派搬

起石头打了他们自己的脚，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国民党的地位一落千丈，我们党的政治威望却大大提高，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关键性变化。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蒋介石为了掩饰其罪恶和减少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极力诱骗我党出席参政会。这时我党于三月二日以董必武、邓颖超二同志的名义又提出了第二个《十二条》，作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从而抵制了参政会。我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欺骗阴谋。

毛主席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是十分仇视和残忍的，所以对蒋介石的反革命两面政策要采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两面政策。“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合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与此同时，毛主席也重申了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要克服党内那种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等“左”的偏向，从而引导全党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

第三节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斗争

一、解放区的严重困难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遇到了极端的困难。

一九四一年德国法西斯侵占欧洲后，在六月二十二日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相呼应，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积极准备发动反英美的战争，以占领整个太平洋区域。一九四一年日本终于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变中国为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以扩大它在国际上的冒险，提出了“治安强化”的新战略方针，对中国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相结合的“总体战”。它们一方面加紧进行奴化教育和各种欺骗宣传，叫嚷建立“东亚新秩序”，并且企图恢复“孔子之教”，来实现它扩张主义的目的。孔孟的“仁”、“礼”之说被规定为沦陷区小学的必修科目，各校悬挂孔老二牌位，敌伪的钞票上也印上孔老二的偶像，并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大搞祭孔活动。还宣扬什么“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完成大东亚圣战”等等谬论，以图腐蚀群众，消磨人们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军事“扫荡”，实行极为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妄图从根本上摧毁解放区的生存条件。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敌人对华北根据地的“扫荡”异常频繁。每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共有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达八十三万多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止，敌人在华北修筑的碉堡达七千七百余个，封锁沟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为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圈的四分之一。对游击区，敌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平毁

村庄，制造“无人区”。对沦陷区，敌人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加强对人民的残酷搜刮和镇压。日寇的“治安强化”，使广大的敌后地区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人间地狱。

为了以战养战，日寇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加紧掠夺战略物资，掠夺煤、铁、铜、铜、盐、粮食、棉花和各种油料作物。这一时期，一些地区曾出现了一些洋行，专门进行这一罪恶活动。以铁砂为例，一九三九年掠夺了四百五十万零二千二百二十二吨，一九四三年就增加到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五吨；生铁，一九三八年八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五吨，一九四三年增加到一百八十一万八千五百一十七吨；煤炭，一九三八年是二千七百四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八吨，一九四三年增加到五千万零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一吨。至于人力的掠夺更是骇人听闻。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前，仅华北被抓去的“劳工”达六百万人。这些“劳工”被运往各地工厂、矿山、码头，当做牛马使用，过着非人的生活。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使成千上万的“劳工”濒于死亡线上。无数“劳工”被埋进惨不忍睹的“万人坑”。同时，日寇还把大量的“华工”劫运日本做苦役，以弥补其国内因大量征兵而造成劳动力不足。敌占区的人民在日寇的残酷掠夺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每天只能领到少量发了霉的三合面。

国际形势的急剧发展，也助长了国民党的投降活动。欧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从国际政治投机的心理出发，竭力推行“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政策，以积极的投敌叛变和反共活动来配合日寇对解放区的进攻，妄图削弱和打击人民革命力量。它一方

面继续调动军队对解放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另一方面又有计划地秘密派遣大批军队投降日寇，在日寇直接指挥下进攻解放区，实行所谓“曲线救国”。国民党反动派这时用来包围解放区的军队达七十九万人，其中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则有四、五十万人。国民党内有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六十七个高级将领先后投降了敌人，形成所谓“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投降的国民党军队则达到五十多万，占伪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这样，直接进攻解放区的伪军就从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二万余人迅速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五十五万人。

由于日伪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上华北各地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解放区出现了极端严重的困难局面。

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从一万万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由一九四〇年的四十万减少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十多万，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人减少到十一万人。解放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困难到极点。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在极端困难的年代里，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只要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能事先预见到困难，不被

暂时的困难所迷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一定能够绕过暗礁，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对敌斗争，普遍建立三三制政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贯彻减租减息，深入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大力发展生产，开展整风运动，普遍审查干部，加强时事教育等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中心思想，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最后战胜日寇。

党是领导一切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全党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以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实现我们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党的领导下，全党步调一致，团结对敌，各根据地都切实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抗日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也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减租减息削弱了封建势力，调整了生产关系，农村的团结进步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空前提高，这就打下了实行三三制的现实基础，筑成了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

当时，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在鱼大水小的矛盾情况下，为了使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一九四一年十月，党中央又发布了精兵简政政策，把自己的身子变得小些，但是却更扎实些，更显得有力量，这样就不被敌人战胜，而最后地战胜敌人。

一九四三年在解放区又展开了蓬蓬勃勃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导，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党政军民空前的团结。

同时，党还加强了时事教育，增加对胜利的信心。毛主席教育全党，要树立两点论思想。当时困难已到头了，但还要准备应付更加困难的局面，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十大政策中，毛主席突出地抓住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空前统一地大踏步而且又稳步地前进了，大生产运动则使解放区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这两大运动是其他各项政策的基础，也是推动整个工作、夺取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

由于十大政策的贯彻，我们党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日寇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面前，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我们一面从事根据地的建设，一面和敌人进行斗争，不仅粉碎了日寇的总体战，也打退了国民党的疯狂进攻。我们站住了脚，巩固了革命阵地，解放区依然屹立在敌后。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地渡过了三个艰难的年头，把抗日战争推向胜利。这是我们党的光荣。

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在严重困难面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个时期，毛主席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

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著作，制定了大生产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自力更生是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也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一再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论政策》）还说：“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到来时，毛主席向全党尖锐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自古以来的人类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我们对这方面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些行动口号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军民兼顾”是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和经济的关系是：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

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

“组织起来”是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毛主席指出：组织起来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组织起来》）毛主席提出“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要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并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推动生产工作。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按照上述指导方针，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解放区开展起来，一九四二年后又迅速地扩展到敌后各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大生产运动中的突击力量。八路军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一九四一年开进了南泥湾。他们自己挖窑洞，用废铁造工具，吃野菜充饥，靠自己的一双手，开荒二十六万亩，挖窑洞四百孔，把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品的全部自给，还上交公粮一万担（每担三百斤），达到“耕一余一”。只有人民的军队，才能够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付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

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组织起来》）机关学校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巨大成绩。一九四三年仅延安一地就生产了六千担细粮，陕甘宁解放区机关和学校的经费绝大部分都作到自给，实现了“丰衣足食”。敌后各解放区，虽然战争异常频繁，但在生产方面也取得巨大成绩。他们实行劳武结合，一面打仗，一面进行生产。一九四三年，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个区，扩大耕地面积六百万亩以上，达到部分粮食、蔬菜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纷纷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一九四四年，陕甘宁区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人口达百分之四十五。敌后各解放区也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劳力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生产，并为以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积累了经验。

解放区军民，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办起了许多小型工厂。在陕甘宁解放区有：纺织厂、兵工厂、农具厂、造纸厂、煤油厂、化工厂、印刷厂和火柴厂等。到一九四四年，陕甘宁公营工厂发展到七十七个，职工达一万二千余人。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不但战胜了由于日寇进攻和国民党包围、封锁造成的物质困难，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使解放区人民的生活达到衣食无虞或者衣食有余，锻炼了干部，培养了军民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密切了解放区军民关系，使解放区面貌为之一新。毛主席当时生动地对比着说：“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饥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

何等舒服。”（《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历史雄辩地证明：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就是延安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毛主席曾在给延安同志的一个复电中号召：

“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培育的延安精神将永放光芒！

三、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英勇斗争

在日寇残酷的军事进攻面前，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新情况，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群众武装三结合的新方针。各军区建立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一元化的军事领导机构，并选派了优秀的干部到地方领导民兵工作。一九四一年，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较前增加了一倍。民兵是一个有机的战斗体系，村设中队，区设大队。县设总队，实行劳武结合，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针对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政策，解放区军民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清乡”斗争。

在反“扫荡”斗争中，我们依照毛主席制定的“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战略战术原则，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我军主力兵

团，或分散，或集中，或转移，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在敌人“扫荡”开始时，我军主力兵团一般避免与敌人决战，常由内线转移到外线，或侧袭敌人的据点，或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迫使敌人回援其后方；当敌人分股“清剿”或撤退时，我主力兵团则适时集中，转入内线，歼灭敌人。地方武装和民兵就地坚持斗争，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以高度分散的“麻雀战”等方法，袭击和困扰敌人。因此，敌人一进入我根据地，就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饥渴交加，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解放区军民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寇的残酷“扫荡”，巩固了解放区。

在晋察冀解放区，一九四一年八月，敌人集中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对我岳北区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敌人分兵十三路，采取了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战术，并使用了伞兵和毒气，妄图将我军主力消灭于长城的两侧。“扫荡”开始后，我军主力转移到敌后，只留游击队配合民兵坚持斗争。当敌人合击扑空而分股“清剿”时，我军主力转戈回击，一股股地消灭敌人。这次反“扫荡”历时两个月，我军作战八百多次，毙俘敌伪八千多人，破路八百多里，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这次反“扫荡”中，守备在易县狼牙山上的五个战士，为掩护主力转移，凭借着棋盘陀顶峰的险要地势，以五支步枪和一些手榴弹、地雷，牵制着三千五百多敌人，同五百多敌人加飞机大炮整整搏斗了一天，打死打伤数百敌人，最后弹药已尽，石头扔完，而顶峰是三面万丈悬崖，一面敌人追上，他们共同宣誓：“宁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绝

不活着当俘虏”。他们砸了枪，扔到深谷，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一齐跳下了万丈悬崖。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写下光荣壮烈的一页。一九四二年冀中五一反“扫荡”是平原地区反“扫荡”斗争的一个范例。这次敌人集中了五万兵力，在冀中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布了一千五百个据点，在万里网状的公路上，经常出动上百辆巡逻汽车，采取了“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战术，妄图将我主力一举歼灭。这时，我军主力有计划地转移到山区，仅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斗争。留下的部队分成排连活动，配合地方游击队，依靠民兵，创造了迎击、侧击、尾击和速战、速决、速撤的急袭战术，积极主动歼灭敌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共打死敌坂本旅团长以下八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两个连在深泽县北宋庄，与民兵配合，坚持战斗十四个小时，击破敌人二千五百人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二百余人，最后突出重围，创造了平原近战中以少胜多的奇迹。

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也日益频繁，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扫荡”，多者一星期一次。敌人的“清乡”由苏南开始，扩张到苏中、皖中以及武汉近郊。敌人“清乡”的办法是，用强大兵力占领我一区后，编造几百里长的竹篱木栅，构成军事封锁线，使“清乡”区与其他地区隔离，然后挨村挨户搜查、登记，稍有反抗，全村即被屠杀。为了配合“清乡”，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增筑据点二千五百余处，以分割我各战略区、各军分区，使我军活动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紧紧依靠群众，高度发挥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的特点。当敌集中兵力对我一地区“清乡”时，其他各区我军就全面出击，捣毁其后方，使之顾此

失彼。在敌“清乡”区，我主力转移外线，向敌之后方或侧翼进攻，逼敌缩回兵力，保护老巢，再以精干游击小组打击“清乡”人员及小股敌人。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量发展民兵，并将一部分主力兵团地方化，充实地方武装，加强各地区的对敌斗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群众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创造了很多灵活的斗争方法，使敌人伤亡很大，穷于应付，有力地配合了我主力部队的对敌斗争。如敌人费时三个月修造的由南坎镇到天生港的二百余里的竹篱笆，一夜间完全被烧光。由于我军民通力合作，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粉碎了敌人的“清乡”，为一九四三年解放区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游击区，根据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我党采取了广泛发动群众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在敌人点线的正面，我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组成联防线，给“蚕食”的敌人以直接打击，使其无法立足，或将敌人据点加以围困，断绝其交通和水源，逼敌撤走。同时，我军还经常派武装深入点线后面，使敌人背腹受敌，顾此失彼。在晋绥解放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军采取这种方法，挤掉了敌人据点五十多个，摧毁伪政权八百多个，使游击区变成巩固的解放区。

在敌占区，我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后。武工队是一种新创的组织形式，一般以三十至五十人为一队。它是党领导下的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斗争的小型游击队。武工队的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们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打击和消灭日

寇，摧毁敌伪组织，瓦解敌伪军，镇压反动的汉奸，使“治安区”变为游击区。

在粉碎敌人的残酷进攻中，民兵发挥了伟大作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集体智慧创造了一系列适合平原、山区、水上不同特点的作战方法，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围困战、破击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等。男女老少齐参战，布下了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如英雄的冀中人民以民兵为骨干，深挖地道，由地面转入地下，坚持斗争。这种地道，纵横交织，村村相联，户户相通，形成了伟大的地下长城。民兵以地道为依托，从村里打到村外，从村东打到村西，从这村打到那村，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随时随地可以打击消灭敌人。著名的清苑县冉庄民兵的地道战，在一次战斗中，打死打伤日伪军一千多人，充分显示了民兵在战斗中的伟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民兵斗争的丰富经验证明，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实行全民皆兵，“深挖洞”，做好民兵工作的三落实，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防止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斗争，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力、财力。据统计，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一万四千六百八十四次，毙伤俘日伪十三万二千人。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七月，毙伤俘日伪十九万九千三百零一人。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一天天走向下坡，为我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光辉文献的发表和整风运动的胜利

抗战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战胜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获得了伟大的进步。党拥有几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和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和军队干部。党领导着抗日根据地和广大人民，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整顿党的作风》）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毛主席亲自领导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我们党对于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对危害最大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已经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行了批判和纠正，但还没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上加以彻底清算。王明的那一套，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还在起作用，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危害着党的事业。王明本人也始终不认识错误。一九四〇年三月，他还公然再版了他的臭名昭著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他的错误路线翻案。同时，抗战以来，我党发展

了大批新党员，他们大多数出身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着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不少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情况就是在老党员中也是存在的。

为了彻底地从政治上、思想上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长期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遵义会议上王明倒台了；长征到达瓦窑堡后，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九三六年十月，毛主席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一九三七年七月和八月，毛主席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彻底揭露了王明及其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清算机会主义路线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整风运动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历了准备、全党整风和总结三个发展阶段：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发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提出全党要警惕两种倾向，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上提出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紧接着中央组织了在延安的一百二十个高级干部，集中学习《论政策》、《新民主主义论》和马列著作，开始了高级干部的整风。

一九四一年三、四月，毛主席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作风。七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八月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十一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讨论，肯定了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中的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还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组织达到进一步统一和团结问题；决定了中央政治局应将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同时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全国有三百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学习。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学习组组长。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四月三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从此，伟大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中央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总学委为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关。周恩来、康生等同志分别在重庆和延安等地，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在此期间，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

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著作，是指导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对整风运动的内容、任务、方针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毛主席指出，整风运动的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

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主席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同上）在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一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根本对立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它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式。前者轻视实践，只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着僵死的教条，而不去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去说明和解决问题；后者轻视理论，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局部的经验当成普遍的真理，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但都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是理论和实践分离、主观与客观分裂，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王明一伙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反对革命实践和调查研究。他们信奉的是孔孟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英雄史观”，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出一付理论家的架式。讲话时，搬来一堆本本，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大串；写文章时，夸夸其谈，咬文嚼字，哗众取宠，装腔作势；指导工作时，“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把一些坐井观天、满足于一孔之见、盲目称英雄、摆老资格的经验主义者俘虏过来，又把天真烂漫的青年充当自己的工具。

我们党内曾经发生过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样一个极坏的典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

党内统治四年，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教条主义严重毒害了党。如果我们同志的思想不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无法前进一步。不打倒主观主义，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所以，毛主席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为了剥掉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伪装，毛主席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毛主席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只有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呢？毛主席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整顿党的作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对准中国革命实际之“的”。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联系实际。这就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原则。

毛主席痛斥了王明之流那种“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或只会称赞“好箭，好箭”就是不放等等教条主义的作风，将

他们骗人的资本剥了个精光，使教条主义分子往日的“体面”、“威风”扫地已尽，露出了一付“瘪三”的丑态。

毛主席还进一步指出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号召：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为了克服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信奉神学，因此要作许多调查，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又由于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同主观主义展开斗争，加强调查研究。要宣传唯物主义，要宣传辩证法，要加强对现状、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使党的学风来一个根本转变。

学风问题也就是路线问题。党内两种学风的斗争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无产阶级认识论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分离，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承认不承认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没有这种学风，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所以，学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向全党提出整顿学风的任务，也就是要全党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宗派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腐朽作风，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历次机会主义头子和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搞宗派主义的。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不能以理服人，必然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立山头，结死党，直至施展种种阴谋诡

计来进行分裂活动。宗派主义破坏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残余的种种表现，号召全党每个党员都必须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顾全大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以及党员和群众的关系。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八股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文风，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是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这种党八股是孔老二的那套老八股的一种变种和继续，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毛主席指出，反党八股是与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紧密相联的。“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反对党八股》）毛主席列举了党八股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大罪状，并号召全党对流毒害人的党八股大张挞伐，痛予抵制。

为了保证整风运动的胜利进行，正确地对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

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整风运动的方针，也是开展党内斗争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毛主席对这个方针作了如下解释：“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这个方针的贯彻，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保证了我党不断巩固、兴旺和发达。

在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全党的整风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全党出现了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热潮。

在深入整风运动过程中，揭发出一小撮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托派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于是一九四三年春开始，结合整风又开展了审干运动。毛主席规定了审查干部的九条原则，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以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审干运动保证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加强了党和军队的组织建设。

全党群众性的整风运动，一九四三年夏基本结束。为总结整风成果，特别是总结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编了党的历史文件——《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供干部学习参考，通读对比，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明辨是非。同时又召开了西北高干会和华北

工作会议。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这次高干的党史学习作了总结，并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向全党提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毛主席号召全党干部“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要以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遭受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指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在党中央、高级干部和全党大讨论的基础上，一九四四年四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深刻批判，对党的历史作了全面总结。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极其广泛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它帮助广大干部和党员解决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促使大量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脱离了原来的立场，转到了无产阶级立场；它扫除了在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从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高度清除了历史上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认清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分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效。“这种成效，主要的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由

于路线斗争觉悟的提高，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方面顺利贯彻。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全国革命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整风运动是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我们党内斗争的实践经验创造的党内斗争和思想教育的最好的形式。整风运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相结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整风运动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来解决，反映了党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整风运动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唯一正确的方针。这个解决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方针，后来发展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套完整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光辉发展。

整风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批孔运动。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把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思想武器。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反复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毛主席领导的整风运动，把清算王明路线同批判孔孟之道联系起来，深挖了王明路线的思想根源，狠批了来源于孔老二“生而知之”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主观主义和唯心史观，为党内开展正确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提供了极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解放区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文艺

整风是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以来，革命的文艺运动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文艺运动和当时的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时，混在革命文艺队伍内的周扬一伙，继续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扬一伙与混进延安文艺队伍里的托派、叛徒和反党分子相勾结，利用他们窃取的职权，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进行反革命宗派活动，刮起一股反党妖风。他们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诬蔑革命圣地延安。一九四一年七月，周扬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反党文章，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周扬的煽动下，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反党文章纷纷出笼。他们以反对功利主义为名，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叫嚷“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煽动作家去暴露延安的“黑暗”，去丑化人民，鼓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反对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世界观。另外，抗战爆发后，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文艺工作者虽有革命的要求，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但因他们当中许多人过去受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又长期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思想感情仍然是旧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因此，他们对解放区的新的环境、新的群

众不适应，不协调，甚至格格不入。在创作上，“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严重地存在着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的倾向。总之，“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彻底批判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政策。《讲话》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讲话》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问题。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主席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结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详尽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与革命的关系，批判了周扬等人散布的超阶级文艺的谬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

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按照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毛主席这一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理论。

《讲话》又指明了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问题，正确地回答了普及和提高、歌颂和暴露等关系。普及和提高是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紧密相联系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的，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暴露什么，歌颂什么，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毛主席斥责周扬一伙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

《讲话》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这就击中了周扬一伙推行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要害。

《讲话》还为一切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指明同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道路。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

归根结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一切文艺工作者和革命者，要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立场和世界观问题。“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转变自己的立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讲话》推动了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实际，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调查研究，坚决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创作了许多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歌曲《东方红》、歌剧《白毛女》和秧歌剧《兄妹开荒》，都是文艺整风后出现的优秀作品。根据毛主席“推陈出新”的指示，在旧剧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开创了新生面，把长期以来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此外，在诗歌、小说、散文、木刻、漫画等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第五节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世界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斗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苏联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已由防御转入进攻。德国法西斯濒于复灭的边缘。同年九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亦已陷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它的寿命也为时不长了。正如毛主席分析的那样：“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解放区战场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提高了路线觉悟，在思想和物质基础两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到了一九四三年，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这一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解放区再一次地深入减租减息，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抗日的积极性；加强了地方各级政权的建设，使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在我党领导下更加团结起来，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军队帮助地方建设，地方大力支援前线战争，出现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新高潮；人民军队的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日益发展壮大，民兵更加普遍地建立起来。总之，随着解放区的巩固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党的队伍得到空前的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春，党员人数已达一百二十万。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已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根本力量，成

为全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基础。

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害怕和仇视。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妄图消灭人民力量，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维护其反动统治，于一九四三年春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笼，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这本书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却不说抗日。它所宣传的是孔孟道统，说什么“中国固有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任何派别哲学有过之无不及”。一再声称要保持固有的道德文化，妄想把中国拉回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去。它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而它所反对的则是中国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叫嚣要在一两年内解决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高唱的“东亚新秩序”是一个调子。国民党的党棍，根据这一基调，大搞尊孔活动，几乎一切要人都动员了。尊孔是为了反对革命。六月，蒋介石就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六月十八日，由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撤回担任宜川至潼关一段河防任务的两个军，开到邠州、淳化、洛川一带，包围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队已达五十万人。七、八月间，国民党反共军队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几十次试探性的挑衅进攻，并准备分兵九路，闪击边区，夺取延安，发动内战。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挑战，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立场。整风运动的开

展，对王明路线的清算，使我们党更加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周围，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六月，党中央召开了会议。七月六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指出：“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这种错误，是滔天大罪的性质，和日寇汉奸毫无区别。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各解放区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发通电，抗议、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滔天罪行；并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准备严惩敢于侵犯解放区的反动军队。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加紧生产和练兵的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与军事上作好对付国民党进犯的同时，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利用一切宣传机器，向蒋介石匪帮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批判蒋介石乞灵于孔孟之道的罪恶目的，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的事业就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卖国事业，因而颇得日本的称赞，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毛主席在这时发表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历数国民党对内发动内战，对外投降的罪行。党中央这时也发表了两个文件，一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一是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剥掉了蒋介石的画皮。正在策划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在军事上已处于被动地位，在舆论上也处被审判的地位。

由于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并且作好了一切准备，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了。

国民党政治上的极端反动腐败，使它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个反动腐朽真相，在日寇一九四四年新的进攻中完全表现了出来。

一九四四年，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已经陷入了相当不利的地位。为了挽救其南洋的孤军，并准备在中国大陆上作最后挣扎，发动了打通从北京到广州和南宁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从三月到十二月，日本使用不到二十万的兵力，使国民党近百万军队接连溃败。在不到九个月中间，日本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六千多万同胞陷入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下，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

正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处于全面崩溃的时候，解放区战场则再次扩大。人民军队主动进击敌人，并派出南下支队，配合华中、华南根据地军民，向被国民党丢失的广大敌后地区挺进，开辟了一批敌后根据地。到一九四四年，各解放区军民都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

在华北，晋察冀军民从一九四四年起，连续发动攻势，不仅恢复了一九四〇年的局面，并且使我军抵达天津外围。北岳区军民把敌人封锁我区的第一线碉堡完全摧毁。晋冀鲁豫区八路军的攻势也极为活跃，一年内恢复国土二十多万平方公里。一九四四年春组织豫西支队，建立了豫西解放区。在山东，一九四四年一年内共歼敌伪三万六千人，收复县城八座、国土十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使滨海、鲁中、鲁南三区连成一片。晋绥区战绩也很显著，一年中，收复国土九万七千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三十七万。

在华中，一九四四年三月，新四军在淮安县东南的车桥

镇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毙俘敌伪一千三百人以上。继车桥镇战役后，新四军又连续出击，攻克了长江沿岸的新生港、张黄港和连云港南面的陈家港等重要港口，阻塞了敌人的水上交通。十一月，我军又攻入阜宁，使苏北、苏中两区连成了一片。在淮南、鄂豫皖、苏南、皖中、浙东等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各部，也不断主动出击，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大片国土。我军已挺进到宁沪杭外围，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使华中的解放区更加巩固和扩大。

在华南，东江和琼崖根据地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四五年春，华南解放区已拥有三百万人口，并有民兵数万和正规部队一万五千余人。这时，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已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

总之，在一九四四年中，由于各解放区军民的英勇奋战，获得了局部反攻的巨大成绩。一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共作战二万多次，毙伤敌伪军二十六万多人，俘虏敌伪军六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三万多人，攻克敌据点五千多处，收复县城十六座、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到一九四五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的主力，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余万。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十九块解放区，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总面积达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九千五百五十万。解放区的发展与扩大，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寇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海岸线的强大的战略包围，为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解放区战场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夺取

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同时，人民也就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内战的法西斯狰狞面孔，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国民党统治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运动，提出了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的口号，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成都人力车工人，为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殴死拉车工人举行罢工。一九四五年二月，重庆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共八万人，为反抗国民党特务枪杀电力公司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农民暴动也不断发展起来。一九四四年七月，河南信阳、确山和遂平等县的数万农民，在“反对不抗日的军队”和“反对军队派勒壮丁”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织了“农民救国军”，打垮了汤恩伯的反动的十三军。在昆明，一些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公开提出了反对专制主义、争取民主的口号。一部分民主党派，于一九四四年五月，指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民主的专横态度，甚至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出了“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的呼声。所有这些，表明一切受压迫阶层的人民都在强烈要求彻底改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和领导了这一运动，并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压迫人民、拒绝民主改革、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的种种罪行，而且强调指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是这一切罪恶的总根源。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党代表林伯渠同志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适时地提出了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党的这一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重庆、成都、昆

明等地工人、农民、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青年学生纷纷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并举行集会和游行，一致拥护我党的主张。各界民主人士还成立了民主促进会。这样，不仅加强了进步力量的团结，推动了中间势力向左转，并且把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的一般民主要求集中起来，引导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正确方向，从而把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地拒绝了人民的正义要求，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欺骗口号下，抵制我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蒋介石还企图将其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扩充到解放区，阴谋消灭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并且要“限期取消五分之四”的抗日人民武装。这样，在抗战胜利前夕，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斗争就日益激化。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涨、蒋介石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为了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公开出来干涉中国革命，支持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政府，打击中国的民主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它一方面以大批的贷款、物资、武器供给蒋介石，派遣大批“军官”、“顾问”、“专家”渗入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同时又装出一付“公正”的面孔来“调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华。他在重庆活动两个月之后，于十一月初伪装成第三者的身份飞到延安。一开始，他在口头上还表示赞成我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不久他就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要中国共产党首先把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

交给国民党，或者组织一个由美国人主持、国共两党各派一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人民军队，然后国民党再给共产党“民主”，“邀请”某些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企图以此来打消人民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消灭人民的军队和解放区。当这个罪恶阴谋被我党揭穿之后，赫尔利便公开宣称，美国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并扬言要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以此来威胁中国人民。

毛主席及时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反革命阴谋，指明了美帝国主义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的危险性，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斗争，并警告美帝国主义：如果继续其干涉政策，那就“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同时，毛主席坚定的指出：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丝毫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坚定意志，也决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前进。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美帝国主义采取扶蒋反共政策，妄图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蒋介石则进一步投靠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破坏抗日，准备内战，这样就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而严重的内战危机又在不断增长。在这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重要关头，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粉碎美蒋反动派妄

图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罪恶阴谋，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万党员。这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大会。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四月二十三日，大会正式开幕。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毛主席提出的战斗任务和伟大号召，高度概括了“七大”的基本精神，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夺取胜利的航向。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敏锐洞察力，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战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个历史的总趋势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同时，毛主席又指出，战后广泛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和反民主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

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在国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将近八年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很大的锻炼。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和国内反动势力，但是，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近百年中国人民一切伟大斗争从来没有过的。因此，“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

“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机会，已经到来了”。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因此，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的危险严重地存在着。毛主席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对国民党反动派放松警惕，不去揭露它的准备内战的反革命阴谋，那么，“会有一天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内战阴谋，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制定政策提供根据，毛主席在报告中对于抗日战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指出两条抗战指导路线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详细而鲜明地对比了两条不同指导路线所产生的两种根本相反的结果，彻底清算了国民党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政策，是来自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一总根源。从这一分析出发，毛主席英明地预见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或者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旧中国。

为了反对黑暗的前途，争取光明的前途，毛主席总结了二

十年来革命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我党规定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根据这一政治路线，毛主席还提出了我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以及目前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纲领。

这条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明确的奋斗目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针对国民党坚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和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毛主席强调指出：现阶段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目前，应该废止国民党—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因为蒋介石反人民的法西斯专政，“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这条政治路线规定，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发展壮大上。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和广大的解放区，这就大大改变了我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并使自己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

重心。而国民党反动派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梦想消灭的也正是这个力量。因此，毛主席反复地指出，要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来保卫、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是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在这里，毛主席揭穿了国民党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的骗局，并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谬论，明确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主要是发动农民群众。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人民军队的主要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因此，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实质所在。由于我党放手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所以引起国民党的仇恨和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的关系上。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正是因为国民党反对解决农民问题，所以腐败无能，无力抗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而共产党坚决主张解决农民问题，所以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具有雄厚的战斗力，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实现党的纲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毛主席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党的领导，就必须搞马列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我们的党，从它诞生那天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武装起来的党。毛主席依据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极其深刻地说明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克服党内一切背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强大武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

《论联合政府》这部光辉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党二十四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纲领，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大会还听取了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根据毛泽东思想，详细总结了抗战时期军事斗争的经验，系统阐明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以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经过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路线斗争觉悟，使全

党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明确地写在党章里，这是全党的一致愿望。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信心百倍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大会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月十一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毛主席在《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彻底革命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决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大会闭幕后，许多代表分赴各个战场，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宣传和贯彻“七大”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继续深入发动群众，特别是在沿海和大城市的周围，广泛地开展对敌斗争，建立起一批根据地，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标志着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特征而载入史册。从此，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的光照耀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斗志昂扬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设新中国而英勇奋斗。

三、解放区的大反攻。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鼓舞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一九四五年五至七月，我军在各个战场纷纷出击，战果辉煌。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各解放区的联系，使日寇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就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宣告投降。八月八日，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伟大号召，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同时，再一次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内战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八月十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并向其送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即坚决予以歼灭。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原来东北抗日联军各将领，立即从现地出发，向热河、察哈尔、东北各地进军；其他各军区均向本区所辖范围内之敌人展开猛烈大反攻，占领交通要道及重要城镇，迫使敌人投降。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我军收复各城镇军事管制办法》，命令各地区依照此办法对收复城市进行管制。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延安总部的命令，象春雷一样立即响遍了各个解放区，迅速形成了一个反攻的热潮。八月十一日，各地军区均向各该区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无条件

投降。各地行政委员会和军区也都根据延安总部颁布的办法，具体制定了军事管制办法的细则和条例。晋察冀边区还任命了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市的市长和卫戍司令，积极进行收复城市的工作。

各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在各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参军参战的热潮，出现了无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上前线的动人事迹。据山东胶东区的统计，半个月内，该区参军人数即达一万五千余人。各解放区的后方机关、团体、学校，也纷纷组织了战前服务团，随军到前线服务。留在后方的人民群众，均以支援前线为中心任务，并大力开展生产运动。

延安总部和各军区最后通牒发出后，敌人仍负隅顽抗。在这种情况下，我各解放区军队，纷纷向敌人大举进攻，以战斗来收复每一个城市和每一寸国土。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我军的作战重点是：夺取城市，占领工矿区，截断铁路线，控制交通要道，彻底歼灭敌人。为此，解放区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外线作战，仅留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从事扫清解放区的残敌。在作战部署上，从东北到华南，围绕敌人占领的城市和铁路两侧，组成十几个前线部队，同时展开进攻。各路反攻大军，冲破了蒋介石的种种破坏和阻挠，经过两个月（八月十一日—十月十日）的激烈战斗，共毙俘敌伪军二十三万余人，缴获长短枪十八万枝、轻重机枪二千五百余挺、各种炮六百门，收复国土三十一万平方公里，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解放人民一千八百七十余万。在我军的歼灭性打击下，八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被日本长期占领的台湾、澎湖列岛和东三省，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开罗会议的决定，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次艰难困苦的曲折，由于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才使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策略方针，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是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这对于今天反帝、反修斗争，对于未来的反侵略战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打败了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它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的人民，“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要敢于拿起武器，起来斗争，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一条正确的指导路线，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说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是，正是这个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了严重的锻炼和考验，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扩大。

第五章 人民解放战争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十月）

第一节 粉碎美蒋“和平”阴谋， 准备自卫战争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形势

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英明地指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个“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论联合政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形势总的趋势，前途是光明的。

战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遭到严重的削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了，一齐垮了台。英、法帝国主义一蹶不振，受到严重削弱。美帝国主义虽然发了战争横财，但是它的基础是虚弱的，它脱离人民，内部有无法解脱的矛盾，危机四伏，如同坐在火山之上。与此相反，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世界正

处于“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东欧，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了先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后抗击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游击战争，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了全部国土，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使罗马尼亚摆脱了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同盟，接着又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篡权阴谋，确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在亚洲，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在中朝边境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苏联红军配合下解放了北部领土，建立了人民政权。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遍及全国的武装斗争，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胜利地举行了“八月革命”，在短短十天内，推翻了傀儡皇帝保大政权，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建立起人民革命政权，九月二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总之，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武装斗争之后，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国内，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

量，不但没有如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所设想的那样被消灭，反而在抗日战争中经受极大的锻炼，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觉悟和团结程度，这是近百年来没有一次斗争比得上的。中国人民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

以上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本质和主流。但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我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论联合政府》）因此，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代替德、意、日法西斯地位的美帝国主义变得更加腐朽和反动，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对外积极推行战争和侵略扩张政策，叫嚣要建立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大家庭”，拟定所谓“全球战略”，妄图称霸世界。它凭借暂时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挥舞原子弹，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到处拼凑军事集团，扶植各国反动派，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并在战争的烟幕下，首先进攻美国人民，进攻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抢夺广大中间地带。因此，美帝国主义成为战后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逆流。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苏、美、英举行德黑兰会议，在反法西斯联合作战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叛徒白劳德（美国共产党书记）乘机于同年十二月发表演说，宣称德黑兰宣言“是在我们的时代使文明继续存在的唯一希望”，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全

面系统地抛出了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根本否认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宣扬《德黑兰宣言》的发表，是“整个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转折点”，使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大肆鼓吹“阶级合作”、“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并且在他的主持下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了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战后曾经在一些国家中造成严重的恶果。法共多列士、意共陶里亚蒂等修正主义分子，拜倒在垄断资产阶级脚下，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政府，换取个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的一官半职，掀起“交枪”“做官”的逆流，可耻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葬送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果实。

在中国，日本打跑了，美帝进来了。侵略中国是美帝战后独霸世界总政策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夺取了中国就可以夺取亚洲，亚洲战线巩固了，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欧洲，进而独霸世界，这是美帝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继续其在全国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战后就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样，美蒋反动派就进一步勾结起来，成为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抗日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仍然存在着是成为新中国还是沦为旧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美蒋反动派已经下定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

量，把中国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但是，由于全世界人民的觉悟和斗争，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迫使美帝国主义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重要历史时期，敢不敢于斗争，敢不敢于胜利？要不要坚持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就成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时，隐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与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相呼应，抛出了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出卖人民的胜利果实，断送中国革命。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不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清醒地看到敌人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充分地看到革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预见到人民必定胜利，敌人必定灭亡的前景，以敢于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决抵制和批判了国际上以白劳德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逆流和我们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从而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们党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是当时领导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抵制和批判国际上白劳德

修正主义逆流，警惕和防止我们党内在新条件下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复活，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第一、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内斗争的实质和过渡阶段斗争的特点。

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讲，已经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什么呢？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国内关系，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深刻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里，毛主席英明地预见到，从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斗争的内容和实质就是中国成为新中国还是一个旧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同时在这里，毛主席坚决贯彻党的“七大”路线，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战略任务。

毛主席在讲演中还具体指出，在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我们对于“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对于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要“力争”。为此，毛主席再次着重提醒全党记取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血的教训，并对可能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警告：“这个时期如

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为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毛主席还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作了具体部署。毛主席指出：“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毛主席的部署，规定了明确的战略方向，使人民军队在蒋介石反革命力量的部署尚未展开之时，向日伪主动地发动强大的进攻，从而使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造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大好形势。

第二，毛主席深刻分析和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阶级本性，提出了针锋相对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

毛主席在讲演中指出：蒋介石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国民党蒋介石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靠耍阴谋，耍两面派。他上台后，一巴掌把人民打下去，绞杀革命，屠杀人民，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在抗日战争中，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抗战胜利后，他疯狂篡夺抗

战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蒋介石一贯的方针是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经定了。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总之，美蒋反动派对人民与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认清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美蒋反动派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消灭革命人民力量，这一反革命目的，往往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这样反革命的两手。这两手有时同时使用，有时交替使用，主要是武力一手。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人民应该怎么办？应该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

“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对于美蒋反动派实行军事镇压，我们不怕恐吓，敢于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对于美蒋反动派进行政治欺骗，如“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做官”的无耻澜言，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决不上当，坚决顶回去。“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关于重庆谈判》）

在针锋相对以革命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的斗争中，我们立足于打，立足于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因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我们要组织人民，去打倒反动分子，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扫帚”，在中国地面上“一寸一寸地去扫”。

第三，毛主席强调，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毛主席指出，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国际援助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这充分体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光辉思想。针对美蒋反动派散布唯武器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毛主席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毛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反对和抵制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关头，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有了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充分思想准备，并把革命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正确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在抗战胜利后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胜利后，长期躲在西南西北后方坐等胜利的蒋介石“下山”了，把手伸得老长地要摘桃子，妄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按照赫尔利的旨意，发出两道命令：他一方面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我军受降；一面却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

勿稍松懈”，妄图以这种无耻的手段，来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更无耻的是，美蒋反动派甚至直接利用日伪力量来篡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杜鲁门供认，在日本投降后，“如果我们告诉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那么整个国家将为共产党所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步骤……我们曾训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地点并维持秩序”。蒋介石则认贼作父，通过广播要中国人民去“爱敌人”。八月十一日，蒋介石把各地伪军和打着“曲线救国”招牌早已投降日本的蒋军统称为“地下军”，下令要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解放区人民军队“擅自行动”，并给各地汉奸特务头子封官加委。那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汉奸卖国贼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绥靖司令”、“先遣军司令”。南京汉奸政权的头子周佛海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并立即执行蒋介石“维持秩序”的命令，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八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指示下，国民党反动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下了一道命令，要侵华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并要日军去“收回”人民解放军所解放的地区。

不仅如此，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还积极用美国飞机、军舰从空中、海上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数十万军队运到华北、华东和东北内战前线。随后，美国军队直接在中国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反动派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九月三十日美海军陆战队一部侵占大沽、天津，一部侵入北平。十月二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十月十一日、十二日美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接着美海军航空兵占驻华北。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反动军队大批运到内战前线，直接进攻解放区的蒋匪军达八十八万人，抢

夺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等大城市，并抢占了被我军解放的城市三十一座。

针对美蒋反动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挑动内战的罪行，我解放区军民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八月十三日和十六日，毛主席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了两份拒绝蒋介石反动命令的电报，严正指出蒋介石要解放军“驻防待命”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并继续命令我军“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又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明确指出制止内战的办法：“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遵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以战斗保卫胜利果实，取得了重大胜利，使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得到很大发展。仅从八月十一日到二十六日半个月中，我收复了大小城市五十九座和广大乡村，包括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港口和矿区，连同以前所有地区，解放区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座。同时，我军开始由长城一线，分路进入东北，与我党领导下的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东北抗日联军会合，收复了东北地区的广大国土。从八月十一日至十月十日两个月中，我军毙伤俘虏敌伪军二十三万多人，从日伪手中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热河、察哈尔两省的全部和山东、河北、

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北的一部分地区，解放人口一千八百七十一万七千人，解放国土三十一万五千二百平方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强大，为了欺骗人民，争取时间，准备内战，并阴谋将内战的责任转嫁于我党，于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蒋介石一连三次电邀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在美帝国主义导演下美蒋反动派玩弄起政治欺骗的一手。

以毛主席为领袖的有了三次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洞察蒋介石和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主席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关于重庆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和敌人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谈判。在动身前两天，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规定了我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指出在谈判中坚持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同时，分别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工作作了指示，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要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进攻。“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封汹汹所吓倒。”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广大人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热烈欢迎毛主席，国民

党统治区的人民充满了希望。重庆一群女工写信给毛主席，欢呼“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自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衷心拥护。

毛主席去重庆，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我党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应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就彻底暴露了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去谈判的虚伪性。在谈判过程中，毛主席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和和平欺骗，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面目，团结教育了全国人民，使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重庆谈判是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蒋介石满以为趁谈判之机进行突然袭击，就可以捞到谈判桌上捞不到的东西。因此，在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大量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编写的反动小册子《剿匪手册》。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密令绥远西部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沿平绥路（今京包路）进攻我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迫近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密令山西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与日伪军配合向我晋东南解放区上党地区进攻。《双十协定》刚公布，蒋介石又命令高树勋、马法五等部国民党军，联合伪军孙殿英、庞炳勋等部，沿平汉路北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向邯郸、石家庄一带进攻。我解放区的军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九月中旬，我军打退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对我张家口地区的进攻，收复了失地，俘虏敌军大批官兵。十月，我军歼灭了侵入晋东南解放区上党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三万五千人（进攻军队共三万八千人），俘敌军长、师长等高级军官多名，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

被我解放。十月下旬，我军在邯郸地区消灭了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匪军七万多人，迫使高树勋率部起义。以上绥东、上党、邯郸三个战役，共歼敌十一万多人，痛击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先头部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我军自卫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

经过四十三天的斗争，蒋介石发现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不利地位，被迫同我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我党的有力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这是我党谈判斗争的一个胜利。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万众欢呼声中胜利地回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的结果，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争取了中间分子的同情，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大的主动。十七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并谆谆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我们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便能恰当地应付复杂局面。

美蒋反动派在战场上和和谈上都遭到严重失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美国政府调回驻华大使赫尔利，随后派马歇

尔作为总统特使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实际上是充当蒋介石“幕后司令”，继续玩弄反革命两手，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中国。在马歇尔导演下，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表示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提出：在政协开会之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对我党的军事进攻。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被迫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在同一天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历时二十二天。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和前一次会议一样，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蒋介石反动派提出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实行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这也就是蒋介石一贯的反动主张：“你先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我党揭露了这一主张的反动实质。蒋介石的所谓“国家”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他的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到他的这个反动的国家里面去，到那个时候，国家的民主化就成了一句骗人的空话，人民得到的只能是血腥的镇压和统治。因此，我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和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和军队民主化，即首先必须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论联合政府》）政协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我党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同意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政府、整编全国军队、修改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它虽然与我党的主张还有很大差距，但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不利

于反动派。

四、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进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党内来。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乘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机会，在向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的讲话中，就对重庆谈判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胡说什么“全世界的和平建设阶段来了，不打仗了。”此外还写了一些宣扬修正主义观点的社论和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在《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抛出了一条“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和毛主席制定的“七大”路线以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相对抗。第一，刘少奇完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竭力美化美蒋反动派，散布和平幻想，胡说什么“中国是已经确定的开始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了”，把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说成“要和平”，“赞成中国民主化”，把蒋介石反动派也说成“可以和我们合作办民主，办建国”。第二，刘少奇完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对暴力革命，狂热鼓吹“议会道路”。胡说“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叫喊“现在要靠选票进城”。第三，刘少奇妄图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我们党把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交给蒋介石，把人民军队“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鼓吹向蒋介石反动派“交枪”。第四，刘少奇极力宣扬依赖“外援”的洋奴思想，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希望寄于“美援”之上。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是陈独秀、

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刘少奇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相呼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疯狂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白劳德为代表的一些人，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攻面前，表示软弱，不敢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以革命制止战争，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主席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原则，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件，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实际上也是对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进一步批判。

正当刘少奇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神话时，美蒋反动派却在磨刀霍霍地准备发动内战。蒋介石反动派一面签订《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协议，一面却又肆无忌惮地发动全国规模内战，撕毁这些协定、协议。在停战令公布前夕，蒋介石即下达秘密作战令，命令国民党军“星夜前进”、“秘密迅速”、“抢占战略要点”。停战令公布后，蒋介石或直接调动国民党军队，或指挥敌伪军，或与敌伪军联合在各处挑衅，向我解放区进攻。例如：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至四月底，国民党军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犯，大

小就有九百二十七次，平均每日竟达八次。蒋介石国民党加紧布置反革命内战的重要一步，就是在美帝国主义“调处”的幌子下，疯狂抢占东北。蒋介石反动派的如意算盘是：首先抢占东北，再点起关内战火，发动全面内战。马歇尔来华的第三天，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侵华海军就源源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攻人民解放军。马歇尔根据国民党的需要，主张东北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以便国民党继续向关外运兵，阴谋抢占东北；当国民党进攻我军时，他百般拖延，不肯去“调处”；当我军进行反击，对国民党不利时，他便马上出来“调处”，进行监督停战。美帝在“调处”期间，还提供大量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给蒋介石，积极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美国还组织了庞大的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和指挥国民党军打内战。在美帝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在秦皇岛登陆，一直打到锦州，进攻冀热辽解放区。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前，国民党军侵占了黑山、北镇、义县、阜新、北票、朝阳、凌源、平泉等地，挑起了东北内战。一九四六年一、二、三月份国民党军侵占我沈阳、法库、辽阳、抚顺、铁岭等城，《东北停战协定》下达的第三天（三月三十一日）就分兵向我营口、鞍山、本溪大举进攻。四月十六日，以七个师的兵力猛攻四平街，五月又侵占我长春、永吉等城。此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帝的帮助下，运到东北打内战的兵力已达十五个军，共五十一万人。进犯的矛头达到松花江南岸，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占领城市四十座，村镇二千五百七十七个，前后使用兵力累计达二百七十七万人。到此时，蒋介石已将其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约二百万

兵力)调到了内战前线。马歇尔看到蒋介石发动内战已准备就绪,于是,他在八月十日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回美国去了,以便让蒋介石放手大打。阶级斗争的事实宣告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伟大领袖毛主席预见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准备新的进攻”。“一九四六年春季的战斗,将是紧张的”,在为我党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我党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排除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干扰,以准备自卫战争为中心开展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等工作。

历史经验证明,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严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方针是作持久打算,下决心做艰苦工作,扫除那种依靠侥幸取胜的心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党准备自卫战争的一个重大措施是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各解放区不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都要利用作战间隙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各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首先加强时事教育和阶级教育,使广大军民明确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而战,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着重军事训练,练兵项目主要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特别着重练习夜战;努力建立和扩充炮兵和工兵;重新调整了军队后方勤务工作;整顿了军火弹药的生产;进一步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

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粉碎蒋匪军进攻，保卫解放区，各解放区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抗战胜利后增加了许多新解放区，在这些地区首先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反奸、复仇、清算等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打倒敌伪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并紧接着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进行了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

在反奸清算和双减斗争中，解放区农民提出了分配土地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根据抗战胜利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决定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各解放区坚决迅速地执行了“五四指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纷纷参军参战，坚决投入自卫战争。与此同时，解放区又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农民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成立了变工队、互助组 and 小型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发放农贷、工贷，不违农时，减少误工，打井修渠，改良土壤，掀起以增产粮食为中心的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适当地参加生产。由于广大农民和其它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增长，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自卫战争准备了重要物质条件。**“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党中央预见到东北将有一场激烈

的斗争,东北对于全国局势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此特别重视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党中央派了十万大军和五千干部进入东北,领导东北人民消灭日伪满的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民主政权。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必须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经过全体东北军民的努力奋斗,排除了林彪、彭真之流要“围着大城市转”的错误路线,纠正了林彪在国民党进攻面前的退却逃跑主义,落实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使东北成为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巩固战略基地。

第二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 的被粉碎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全面内战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制造内战借口,六月十七日,蒋介石竟蛮横无理地向我党提出五项荒谬条件,要求我军退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路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以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五、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以后我军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并声明如我军不退出上述地区,国民党政府不考虑停战问题。至此,美蒋反动派背

信弃义地完全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六月二十六日调动三十万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当时，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除了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的二十五个旅以外，他以五十八个旅，约四十六万三千人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攻；以二十八个旅，约十六万两千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攻；以二十个旅，约九万七千人向晋绥解放区进攻；以十六个旅，约十六万一千人向东北解放区进攻；以十九个旅，约十五万五千人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以九个旅，约七万五千多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进攻。加上其他部分共计一百九十三旅（即整编前的师），约一百六十多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数的百分之八十。

当着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十分嚣张的。他们认为，他们有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一百余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余万，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他们已经利用时间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他们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的很疲倦，而且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亿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是不巩固的。从这种估计出发，国民党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进犯，他们狂妄地叫嚣，要在三个月到六个

月内打败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九月，国民党匪军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战争最初几个月，国民党匪军占领了长春、承德、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匪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没有被美蒋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响应毛主席“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伟大号召，决心以革命战争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战争。各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不断地给予进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在美蒋反动派猖狂进攻面前，在敌我力量对比暂时悬殊的情况下，在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共、反人民，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借以恫吓各国人民，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当时，国际上一些好心的朋友在怀疑、忧虑。在国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主张对美蒋反动派妥协，反对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战争。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惧怕长期战争。隐藏在党内的大叛徒刘少奇继续散布和平幻想，无耻吹捧美帝“强大”，渲染“战争恐怖”。

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毛主席坚决反对了一切悲观、右倾情绪，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

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为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敢打必胜的思想，一九四六年八月，毛主席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代表的阶级是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它们是脱离人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人民永远是多数，人民永远是强者，革命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革命必胜。而反动派只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是违背人民的意愿，是脱离人民的，所以反动派只能是弱者。不管他们暂时在表面上多么强大，其本质是极其虚弱的，没有前途的，他们总归要失败。

毛主席这个光辉论断是从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来的。历史上，俄国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曾猖獗一时，但是，都被革命人民打倒了，事实证明它们

都不过是只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点，就是貌似强大，实际虚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针对当时一些人的恐美病，毛主席特别强调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背向，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毛主席还针对美帝国主义推行原子讹诈政策，妄图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尖锐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虚弱本质。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建立在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基础之上的。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主席指出：“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暂时地看来，敌人可能还是“强大”的，“还有力量”，它还要张牙舞爪地垂死挣扎。正如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战争开始，美蒋反动派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疯狂性，就是这种垂死挣扎的表现。而人民

革命的力量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虽然人民革命力量在开始时总是比较弱小的，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真正有力量的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基于上述分析，毛主席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只有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一切敌人，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对待敌人，才能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才能有革命的远见性和坚定性，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个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则，是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又必须重视敌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一方面是纸老虎，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老虎，它们会吃人的。要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就是说，在每个局部上，在每个具体斗争问题上，要重视敌人，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集中全力作战，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否则，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

错误。

在这篇谈话中，毛主席还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针对当时美帝国主义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毛主席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当美国还没有压服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前，就谈不到发动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在这里，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并指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一个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广泛的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制止美国侵略，推动世界革命的战斗纲领。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象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武装和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批判了右倾悲观论调，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能够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科学根据，加强了必胜的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斗争经验的新的概括。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塑巨人”“空架子”一样，毛主席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都是以通俗的比喻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的本质。因此，这个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

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当前的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中，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二、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美蒋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解放区军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信心百倍，奋起自卫，坚决地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表现了解放区军民无比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但是，如何以劣势的兵力战胜优势的敌人，从而剥夺敌人的优势，建立自己的优势，最后战而胜之，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重要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我党二十年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战胜敌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

在政治方面，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因此，在农村中，应坚定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其它阶级阶层。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除团结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在经济方面，必须作持久打算，应努力发展生产，节省人力物力，既要保证军需供应，又要减轻人民负担。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在军事方面，“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

得最后胜利”。随后毛主席又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等指示，深刻阐明了战胜蒋介石的军事方针和方法。毛主席指出：“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为了消灭敌人，每一战役都要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优势兵力，务求速决、全歼。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这些原则，正是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光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毛主席规定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最中心的要求是“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个指导原则，对扭转整个战局，变敌人的战略进攻为战略防御，变我军的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具有决定的意义。历史完全证明，我军在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指导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坦克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

在毛主席制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针指引下人民解放军首先在中原解放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抗战胜利后，中原地区解放军发展到六万余人在豫鄂边界建立了广大解放区。重庆谈判时，我党曾提出愿将这个地区让出，部队北移，虽已达成协议，但蒋介石背信弃义，蓄谋消灭我中原解放军。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向我中原解放区中心腹地——宣化店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实现其对中原解放区“一举歼灭”的毒计。我中原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给予敌人迎头痛击后，除留下少数兵力在中原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向西突围，一部转入陕甘宁解放区，一部进豫西、鄂北和陕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中原突围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歼”毒计的破产，同时也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在华东，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以三十七万多人的兵力，从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八百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军”。我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在长江以北、运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与敌周旋。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中旬至八月底共打七仗，歼敌五万六千余人，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苏中七战七捷，生动地证明了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长这一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为了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的作战，于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分数路向驻在陇海路上开封至徐州一线向敌人出击，先后占领碭山、兰封等十余城镇，歼敌一万六千多人，控制铁路三百八十里，切断了敌人徐州至开封的联系。此外，我军以一部深入豫东，威胁敌后，迫使敌军从苏北、山东和中原战场调离七万余人，减轻了中原和华东解放区的负担。

七月初，胡宗南调动七个旅，进犯晋南，企图打通同蒲路南段，和阎锡山部会攻上党。我晋冀鲁豫解放军太岳部队于七月三日至七月十七日，在晋南闻喜地区迎击敌人，堰掌

一战，歼敌六千余人。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我军又挥戈北上，向驻在同蒲路上临汾至灵石一线之敌军发动攻势，先后解放数城。歼敌八千余，粉碎了胡、阎南北夹攻我军的计划。在此期间，晋绥解放军为配合晋南作战，也于七月四日至八月十一日，连续攻克朔县、崞县两城，完全控制柳县以北至大同以南的同蒲路北段，歼阎军八千余人。

在鲁西南，国民党以二十二个旅向我进攻，九月上旬我集中三万五千人的优势兵力，在定陶地区歼敌一个整师，随后迅速转移，在运动中继续歼敌。八月至十月共歼敌九个旅，四万八千余人。

其它如晋察冀、冀热辽等战场，也取得各个歼敌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三个月的自卫反击战，放弃了数十座城市，但获得了歼敌二十五个旅的胜利。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同时，从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这一点，预示了战争的进程。当我军歼灭敌人第二个二十五个旅的时候，我军就可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主席强调指出：“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

战争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后，蒋介石得意忘形，当天下午下令召开伪“国民大会”。我党于十一月十日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但蒋介石不顾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妄图利用“国大”，通过一个“宪法”，将他的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合法”化。同时他自己可以“登极”当“总统”。然而，“此会开幕

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此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

蒋介石在占领张家口后，用于进攻的兵力已由解放战争开始的一百九十个旅增至二百一十七个旅，占其全部正规军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有半数兵力用去守备城市。战线之广，兵力之不足，形成处处空虚，到处有薄弱环节，大大便利了我军的各个歼敌。

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来，人民解放军开始摆脱了战略的被动地位而转为主动，并开始内线的局部反攻，部分地收复失地，大量地歼灭敌人。例如华东战场，经过苏北、鲁南战役，先后歼敌近八万人。一九四七年二月的莱芜战役，一举歼敌七个整旅和一个交通警察总队约六万人，收复城镇二十余座，使国民党军队陷入极端混乱，一时不敢出战。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等战场，我军分别给予进攻的蒋匪军以沉重打击，控制了陇海、同蒲、平绥、平汉等铁路交通重要地段，收复了许多县城。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为止，四个月来，经过大小八十余战，歼敌四十万，主动放弃了八十七座城市，又收复和解放了八十七座城市。毛主席在《三个月总结》中所预示的“重要而困难”的几个月已经过去，人民解放军夺得了战略主动权。

自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至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八个月中，人民解放军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主动放弃城市一百零五座，歼敌七十余万人。蒋介石以七千兵力的代价换取一座城市。至此为止，他必须以百分之六十二的兵力担任守备，机动兵力只有百分之三十八了。他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凶极一时的全面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将其重点放在山东和陕北。他的反革命意图是：在陕北攻占延安，打击我党首脑机关，妄图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割断我党右臂；在山东，迫我华东野战军于胶东狭窄地区而消灭之，以解除对京沪心脏地区的威胁。实现上述两目的后，再由东西两翼北上，打通津浦、平绥两路，会师张家口和山海关，然后分别消灭我人民解放军。这不过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一个走投无路的黔驴之计。他用于进攻山东和陕北的兵力约七十万人，不仅黄河以北其他地区兵力空虚，而且广大后方十几个省几乎无一正规军了，这对于我军转入进攻是极为有利的。

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方针是，吸引敌之主力于两翼，将敌之机动兵力陷在山东和陕北，准备其它战场的反攻，使蒋介石首尾不应，以便大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

为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指使胡宗南纠集了三十四旅，二十三万人，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当时，我驻守边区的部队只有二万余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延安以南进行了胜利的阻击战，一举歼敌五千余人后，于三月十九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实行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方针。

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敌人的暂时优势吓破了胆，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放弃陕甘宁边区，实行逃跑主义。三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主持召开了党的重要会议。会上，驳斥了刘少奇的错误主张，

指出国民党进攻我边区，并非表示它的强有力，而恰恰说明了蒋政权的统治危机已异常深刻化。会议再次明确决定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的有利条件，保卫陕甘宁边区，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和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部队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运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地周旋，使敌到处扑空，疲于奔命，欲战不得，欲退不能，我则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予以歼灭。

毛主席离开延安前夕，就部署了青化砭战役。毛主席预见到敌人占领延安后，必定要找我主力决战，为了迷惑敌人，我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五个旅进至延安西北的安塞，而将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待机伏击敌人侧翼。敌为保其侧翼安全，派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北犯，三月二十五日进入我伏击圈内，我以六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即将其三千余人全部歼灭，并生俘其旅长。青化砭战役是我军撤离延安后第一个大胜仗，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

青化砭战役后，我军继续采用“蘑菇”战术，以小部兵力诱敌兜圈子，主力则隐蔽起来待机歼敌。结果，胡宗南花了十二天时间，奔走于清涧、瓦窑堡、永坪、蟠龙地区，共走了四百余里，磨得精疲力竭，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四月十四日，当敌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前进时，我军又在羊马河地区实行伏击战，将敌军上至旅长，下至马伕，共四千七百多人全部歼灭。

正当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彭德怀却跳出来对抗毛主席的“蘑菇”战术，提出北上打榆林，或南下打敌后路的荒谬主张。毛主席于四月十五日在给西北野战军的电报中，纠正了彭德怀的错误，指出：我军方针是继续坚持“蘑菇”战术，同敌人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并指出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

羊马河战斗后，敌人又以为我主力已经转至绥德地区，遂集结了九个半旅向绥德急进，留一六七旅及一个团据守战略补给站蟠龙。我军“投其所好”，以部分兵力将其主力引至绥德，同时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包围蟠龙，于五月二日发起进攻，经过两天两夜攻占了蟠龙，全歼敌军六千七百多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蟠龙大捷后，我军利用敌人进退维谷之际，于五月底挥戈西进，经过一个多月的主动出击，收复了定边、安边、靖边等大片地区。八月，我军又东向围攻榆林，调动胡宗南的主力来援。敌分两路，妄图夹击我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八月二十日当敌军进抵米脂东北沙家店时，毛主席亲自指挥，在我军猛烈的打击下，在边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一举消灭敌整编三十六师及其所属两个旅共六千余人。沙家店战役后，敌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即告破产，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这个胜利，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取得的，它说明了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的伟大和正确。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军胜利收复延安。

在一年零一个月当中，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歼敌十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我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或把我党我军赶到黄河以东的阴谋。同时，西北战场我军

以很少兵力吸引和歼灭敌人大量主力部队，不仅实现了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计划，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帮助他们较快地转入了进攻。

在山东，蒋介石指使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向我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我华东野战军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四月粉碎了敌人向沂蒙山区的进攻。五月敌企图以三路重兵压我于胶东地区聚歼之，我军以四个纵队分别牵制敌之左右两翼，以主力五个纵队向敌之主力整编七十四师方向突破。五月中旬，将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崮地区，激战三昼夜，全歼该师，上至师长下至伙伕无一人漏网。蒋介石的“王牌”七十四师被歼，各路敌人纷纷溃逃。山东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了。在粉碎蒋介石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的同时，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的人民解放军，乘敌之空虚，先后转入反攻，大量歼敌，收复并解放许多城镇。特别是豫北我军侧击山东之敌，晋南与陕北密切配合，威胁胡宗南集团的后方，不仅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开辟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阵地，为我军中原突破准备了条件。

三、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现在这些工具已经迅速破产了。在战争的第一年，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同时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反动政府实行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采取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政策的结果。

在经济上，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发动内战和维持其独裁统治，大量出卖中国主权，换取美援。内战爆发前，蒋介石就与美帝国主义订了许多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规定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军事、外交、财政、经济、通商贸易等主权都可以由美国主宰和干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美蒋又签订了“中美商约”（即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是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卖国条约，其主要内容：第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第二，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出产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第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险”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当时蒋介石政府的驻美大使顾维钧曾经公开无耻地说，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因此，“中美商约”乃是蒋介石亡国灭种的大拍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奴隶契约，中国人把它叫做“新二十一条”。美帝国主义经过“中美商约”把它在国民党统治区早已享有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特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控制。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此后，它又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许多“协定”。十二月，订立了出卖全部中国领空权的“中美航空协定”；一九四七年一月，订立了承认美国海军盘踞青岛的“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七月，订立了出卖铁路主权的“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等等，以此作为对“中美商约”的补充和更加具体化。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蒋介石把中国的主权，从天空到地下，从陆地到海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应有尽有的完全出卖给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货物充斥了中国市场；由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和美国的独占资本结合在一起，并在长期掠夺中国人民的过程中，集中了一百亿至二百亿美元的巨额财富，进一步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由于蒋介石政府为了进行内战，长期实行极为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抽丁要粮，滥发纸币，对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刮和劫夺，使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如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为十四亿元，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即增长至十六万亿元以上。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涨了六万倍，年底更达十四万五千倍，法币一百元，在一九三七年能买两头牛，到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根据国民党统治区二十个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六年秋天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工商业倒闭者达二万七千多家，大批工人因此失业。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陷于破产，一九四七年农产

品的总产量仅为抗战以前的百分之六十三。在农村出现了饥民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境况。这一切，说明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和财政已处于总崩溃的绝境。“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与此同时，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危机也更加严重了。日暮途穷的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匪军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宣布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伪“国大”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导演下开幕，通过了伪宪法。参加伪“国大”的，除国民党外，只有国民党御用的历来在社会上毫无威信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及一些无耻政客。连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能不承认：听蒋介石演说的“都是反动分子”。在伪“国大”之后，一九四七年四月，蒋介石又演出了“改组政府”的丑剧，把一批封建余孽、无耻政客、卖国老手拉进他的政府里，组织所谓“多党政府”。这个“多党政府”一登场，就表现了它的法西斯疯狂性，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及游行示威，对人民爱国民主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蒋介石玩弄这些政治把戏，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孤立中国共产党。但是，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一条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成为他们进入坟墓的信号。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反动政府封闭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公开机关，强迫中国共产党撤退了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随即派军队进攻延安。这就堵塞了任何和平解决问题

的可能。蒋介石采取这些反动步骤，是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而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

这样，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由于他自己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了。美蒋反动派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蒋介石反动派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他们把一切同情和希望都寄托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来了。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失败，经济的崩溃，政治欺骗的破产，使它再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国民党反动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这时候，我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革命斗争的领导。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党派遣许多干部深入工厂、学校，具体组织和领导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同时，在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和组织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解放区人民的强大支持，使运动得以胜利地向前发展。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为反对国民党压迫，上海摊贩三千多人用石头、竹杠、木棒同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展开了大规模搏斗。这一天，上海全市汽车、电车停驶，商号停业，表示对摊贩斗争的支持。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事件，激起了北平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一

斗争，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形成一个伟大的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运动和上海摊贩的斗争，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斗争精神，上海各学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行动，立即扩展到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极端野蛮的镇压。五月二十日，在天津和南京同时发生了军警特务打伤和逮捕学生百余人的严重事件，造成“五·二〇血案”。但是，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学生爱国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运动更加高涨，迅速发展到了数十个大中城市，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指出：“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在学运开展的同时，蒋管区的工人和农民，也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展开了反美反蒋斗争。一九四六年八月至十一月，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地，有五十万工人参加斗争。仅上海一地，七、八、九三个月就发生工人斗争五百六十一起。一九四七年五月，蒋管区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工人罢工运动也更加高涨。上海一万五千名丝织业工人举行了反饥饿示威游行，南通有两万多工人举行了反饥饿大罢工。从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天津等重要工业城市，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工人达一百七十万多人。与城市工人和学生斗争相呼应，农村的抗征、抗租、

抗捐斗争和武装起义遍及各省。苏、浙、皖、湘、闽、粤、川、康、陕、滇、黔等十一省的农民起义达二十万人以上，其中陕南人民武装起义声势最大，并成立了“商雒游击司令部”，活动区域达二十余县。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省人民，在毛主席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伟大号召影响下，为了反抗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和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侵略，举行了武装起义，到三月八日，起义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城市，并组织了临时自治性的政权——“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颁布了政纲和命令。这次起义，是台湾省人民一次可歌可泣的爱国反帝革命斗争，它的影响所及，震撼了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

蒋管区人民的斗争，严重动摇了蒋介石政府的统治基础，成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打败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在此期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由于我党在政治上的批判斗争和经济上的正确政策，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美蒋反动派的面目彻底暴露和蒋介石政府对民主势力迫害和摧残的情况下，迅速破产了。他们中间除极少数投靠美蒋反动派外，绝大多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扩大、更巩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

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第三节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表面上蒋匪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继续得到美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可供搜刮，来支持他们的军事进攻；六十万敌军正压在解放区的陕北和山东战场上，重点进攻仍未停止；延安、临沂、张家口等解放区的重要城市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抓住有利时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就成了我们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加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问题。

这时，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指出，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在一年来的军事较量中，敌军被歼一百一十余万人，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三万人，从而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敌人的机动兵力已经大大减少到只有四十个旅，还有二十一个旅守备在从新疆到台湾省的漫长战线上，后方非常空虚。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由于师出无名，蒋匪军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屡战屡败。总之，极端深刻的

失败情绪，已经在整个敌人营垒内部迅速地蔓延开来。

同敌人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万人上升到一百九十五万人，部队的装备也由于大量缴获而大为加强，解放区普遍地实行了土地改革，扩大了民兵，后方巩固得多了。由于我军连战连胜，愈战愈强，军心振奋，人民拥护，整个解放区充满了胜利信心。与此同时，蓬勃发展起来的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扩大和巩固。这一切说明了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不仅可以粉碎蒋介石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使解放区得以连成一片，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设，加强支援前线；而且我军打进敌人后方，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就能调动敌人回救，便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在敌人后方开辟新的根据地，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反动统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全国胜利的基础。

还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即我军在几个战场上已经夺取了主动，敌军已陷入被动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我军战略转变的思想准备问题，教育全党认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阶段就要到来。同年六月，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七月，毛主席在陕北靖边的小河村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具体部署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问题。九月，毛主席更明确地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

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毛主席亲自制定了我军战略进攻的方向和进攻的样式，决定派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大别山地区去作战，先占领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大别山位于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淮河以西、汉水以东的中原地区，历来是战略要地。我军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西逼重镇武汉，南扼长江。当时蒋介石把主力调往山东和陕北向我展开重点进攻，这个地区敌之守备减弱，因此大别山一带便成了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便于我军的进攻。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对我有利。夺取了中原，就如同——一把利刃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为了保证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计划的实现，毛主席又作了周密部署，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主力三军配合，逐鹿中原；陕北和山东我军则实行两翼牵制，支援三军。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人民解放军的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开始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刘伯承等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二万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全国大进攻的序幕。渡河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由鲁西南进入河南，先后跨过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长驱南征，终于

在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别山地区。九月至十一月，我军在这里举行了多次作战和艰苦的地方工作，建立了三十三个县的人民政权，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在大别山站住脚跟的指示。

八月二十二日夜，由陈赓、谢富治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从晋南强渡黄河、腰斩陇海，东逼郑（州）洛（阳），西叩潼关。接着又挺进豫西，先后歼敌四万三千人，建立了豫陕鄂根据地，迫使陕北战场的敌人南撤，吸引了尾随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的敌人。

陈毅、粟裕同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八月底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挺进鲁西南地区，九月底越过陇海路，在豫皖苏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并孤立了敌人的战略要地开封和郑州。

至此，三路大军互为犄角，在中原摆成了品字形阵势，互相配合，纵横驰骋，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人多人，解放县城一百多座，建立了广大的中原根据地，完成了面的占领。敌人不仅被迫龟缩到铁路沿线，而且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困境。这就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粉碎了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敌人不得不实行所谓“分区防御”。

与此同时，我内线作战各军也转入反攻。东北野战军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发动了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收复城市十五座，孤立了长春、吉林之敌，迫使敌人龟缩于四平、沈阳、营口、锦州等地。我晋察冀野战军于九至十一月，在大清河北岸及保定南北的平汉线上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解放石家庄，先后歼敌四万六千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下旬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后，从内线转入反攻，九至十一

月上旬，歼敌两万余人，收复了三座县城。华东野战军的山东、苏北两兵团积极作战，至一九四七年底，收复胶东、苏北大片土地，共歼敌八万余人。以上所有的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战略总进攻的总形势，从而结束了我军诞生以来长期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言》的发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成为全国人民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动员令。

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以便在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

二、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和整军运动

在解放战争转入外线作战后，我军的后方——各解放区也更加巩固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

自从一九四六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以来，解放区的土改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不够彻底，许多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未进行。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彻底地普遍地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积极支援战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环

节。为此，一九四七年九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公布了这个文件。

《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中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一部分”。同时，还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等。《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最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它肯定了《五四指示》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并纠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等不彻底性。同时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方法。“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各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先后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大力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共西北局召开了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完成土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布了关于施行土地法的联合布告。中共东北局发布了告农民书。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了全区土地会议，并发表了告全体共产党员书，号召广大党员坚决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遇事与农民商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农民起来实现这个大纲，达到农民的彻底翻身。各级党组织还派出大批干部

深入农村，发动贫雇农，并依靠他们团结中农，组织农会，对地主阶级展开尖锐的斗争。贫雇农说，“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这样，在农村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了二千多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区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翻身的农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生活得到了改善，从而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巩固了解放区的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运动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各解放区都出现了热烈的支援革命战争的高潮。大批翻身的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仅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九四七年一年中，参军人数就达三十万人；东北解放区：党组织，排除林彪推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实行土改。在平分土地后不到半个月，在辽东、热东两地区就有两万人参军。

为了支援前线，农民一面积极生产，把大批粮食、被服送上前线，一面抽出大量人力、畜力，组织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出征。陕甘宁边区十个月的自卫战争中，共动员民工八十四万三千人，牲畜七十一万五千头；在平汉路北段的一次战役中，冀中有一万三千方民兵，携带三千余付担架、千余辆大车，赴前线协助解放军作战。各地民兵也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组织程度，他们主动开展对敌斗争，消灭了大量骚扰解放区的蒋匪军，使解放军无后顾之忧。

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支持，是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无往不胜的可靠保证。

在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我党开展了整党运动。

我们党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及两条路线斗争的

锻炼，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强大政党。党员的思想水平和路线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使我们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又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一年中，我们党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二百七十万党员，大量的新鲜血液补充了我党，增强了党的战斗力，适应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大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和基层组织中，混进了地主、富农、流氓坏分子等，他们滥用职权，欺压百姓，歪曲党的政策，破坏土地改革。有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反对民族敌人的时候很积极，但由于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他们对土地改革有抵触情绪。还有些党员和干部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因此，必须纠正这种党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才能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顿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从一九四七年冬起，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这次整党运动，按照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错误，同时邀请群众积极分子参加支部会议，帮助整党。经过整顿，除将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清除出党外，对于大多数犯了错误、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都经过耐心帮助，促使其转变立场，改正错误。凡是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者，一般地不给组织处分。

经过整党，农村基层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增强了战斗力；同时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从而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巩固了解放区，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土改和整党运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这个整军运动，是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方法进行的。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和批判某些同志身上存在着的地主富农思想、官僚主义、军阀主义、斗志不高等错误思想作风，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土地改革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这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军民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新经验，所创造的一种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是对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战争目的，清除了不良影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全军出现了旺盛的战斗意志，进一步发扬了三大民主、团结协同、听从指挥、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提高了大兵团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攻坚战、歼灭战和连续作战的能力，为我军攻占大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三、党的十二月会议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

在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为了制定党的行动纲领，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特别是纠正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党中央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陕北

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陕甘宁地区和晋绥地区的负责同志，有在前线的中央委员也赶来参加。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以及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和其它重要决定。会议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领导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毛主席将这一讨论结果写进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中。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的胜利在望。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刻，我们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肃清自己内部一切软弱无能思想和树立战胜一切敌人的信心。同时，认识到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在握，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有困难，敌人必然要作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信任群众，善于领导他们去夺取胜利。为此，毛主席用大量篇幅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党在各条战线上斗争的主要经验，对于党在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需要采取的作战方针，土改、整党、经济政策和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和明确的规定。

在报告中，毛主席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特别是人民解放战争极其丰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各条原则都贯彻了这一根本思想。它生动地反映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和战争的本质。它又是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就是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直至打败美

蒋反动派。

为了各个歼灭敌人，根据战争的发展，毛主席还规定：“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等等。并提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和“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这一系列原则，每一条既有独立性，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是把集中兵力各个歼敌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结合起来；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起来；把连续作战和适时休整结合起来。这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建立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利用不了、也对付不了的，是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集中兵力打开灭战，是毛主席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是我军作战的光荣传统。正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总是变换各种手法来反对。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推出的所谓“一点两面”、“三三制”和“四快一慢”，是反对歼灭战，鼓吹击溃战的货色，这充分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

在政治方面，毛主席规定的党在现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和巩固。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资产阶级鼓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已经破产

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而核心领导是中国共产党。

鉴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毛主席强调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问题，指出“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根据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对于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毛主席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一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在经济方面，毛主席的报告着重阐明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在经济方面的基本政策。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毛主席明确规定党的土改路线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并重申土改中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

在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官僚资本，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在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二十年中，通过搜刮民脂民膏，出卖国家领土主权，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至二百万万美金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不但剥削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因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问题，毛主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国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他们受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压迫和损害。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在政治上，他们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经济上，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他们采取不同方针。必须把从政治上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反动政治倾向和经济上的消灭看作是两件事；必须纠正和防止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以及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等错误政策。

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为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纲领，纠正了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为夺取全国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准

备，大大地促进了全国胜利的到来。这个报告中所阐明的军事科学和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土改、整党运动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曾经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全国土地会议之前，刘少奇在晋察冀解放区搞土改“试点”。他对老解放区执行《五四指示》以来的土地分配和党组织的情况，根本不调查不研究，下车伊始，就大作黑报告，下达黑指示。其主要错误：首先是篡改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侵犯了中农利益。他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胡说，“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在划阶级成分时，扩大了打击面。其次是破坏了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提出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要搞个干干净净。”第三是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尾巴主义。他把老区的党支部和村干部一概当成土改的绊脚石。“不靠干部、政府、党”，“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派出工作组，超过地方各级党组织，踢开村干部，进行“搬石头”，“要把斗地主富农与斗干部结合起来”，“一切石头都在党内”、“搬石头要先搞，先斗干部，后斗地富。”工作组大搞神化术扎根串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他还重复王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并叫嚷“要杀就杀干净、杀他一家”，实行多杀乱杀政策。其结果使一些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混乱现象，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被当做石头搬掉，被打甚至被杀。地主富农分子、流氓地痞以至汉奸等反革命分子乘机搞阶级报复，严重挫伤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损害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工商业，从而使党脱离群众，破坏了土改运动。刘少奇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打

击贫雇农和广大农民群众，破坏人民解放战争，拖延了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时间，妄图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因而是极反动的。

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刘少奇的错误，在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针对刘少奇侵犯中农利益，毛主席多次重申土地改革中的两条基本原则，规定了一系列团结中农的具体政策，从而纠正了刘少奇胡说什么“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谬论。

针对刘少奇多杀乱杀的错误主张，毛主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除极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经人民法庭依法判处死刑外，“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同上）对于地主分子，也必须给予生活出路。

针对刘少奇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毛主席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同上）

为了彻底克服刘少奇的形“左”实右路线的干扰，一九四七年底，中共中央重新颁布了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

决定》。一九四八年一月，任弼时同志根据十二月会议的决定，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随后，毛主席又写了几个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并采取各种措施，批判和克服刘少奇形“左”实右土改路线的影响。

四、党的各项重要政策的制定。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党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在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伟大纲领指引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自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第二年作战中，我军又歼灭敌军一百五十二万人，解放城市一百六十四座，解放人口三千七百余万。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二百八十八万人。我们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军事工业也有相当多的增长。这一切，大大提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极大地鼓舞着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与此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卖国独裁罪恶已暴露无遗，他们已彻底孤立了。这说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

在飞跃发展的大好革命形势下，毛主席提醒“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关于工商业政策》）政策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同上）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

一切的，而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毛主席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导全党提高对政策重要性的认识。

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反对党内“左”右两种倾向。毛主席根据我党的丰富经验，在反错误倾向问题上，总结了这样一条规律：“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毛主席在陕北和以后离开陕北转战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途中，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用极大精力研究了党的政策问题，写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约十篇重要文献，对土改、整党、整军、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等各个方面以及新区、老区、城市等不同情况，规定了一整套具体政策，及时纠正和防止了党内的“左”右倾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提高了全党的政策观念，保证了革命的迅猛发展。

鉴于当时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干扰，以及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发生时“左”时右的倾向，毛主席在晋绥解放区对土改整党情况作了调查后，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的经验，明确地概括出两个公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

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条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毛主席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来了，并一直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纲，指引着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现在毛主席重新明确提出总路线，这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因为，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歪曲或企图改变我们党的总路线；而有些同志往往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自觉不自觉地推行了错误路线。毛主席特别告诫全党，不要忘记党的总路线，“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同上）

同时，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是通过各项具体政策去实现的。如果不能正确地执行各项具体政策，同样会犯错误，给革命带来损失。毛主席指出：“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关于工商业政策》）

毛主席在这里所阐明的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与各别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全党，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主席还对老区和新区的土地改革的不同方针和策略，作了具体的规定。新区的土地改革，应当“分地区、分阶段”进行。新区必须在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全部消灭，环境已

安定，基本群众的绝大多数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党的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之后，才能进行土地革命，缺少上述三个条件的任何一条，都会犯错误。新区又首先应该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然后实行平分土地。这样，才能贯彻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

关于新解放的城市，不能过早实行社会改革。应当首先消灭一切残余的反动武装，解散一切反动组织，没收官僚资本，从敌人手中接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机构，保护工矿企业和恢复发展生产等，然后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各项改革。

在新的形势下，一九四八年九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克服当时在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加强党的领导，统一全党的行动，是保证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贯彻执行和准备夺取全国胜利又一个关键问题。

毛主席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有些地方甚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

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针对党内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毛主席明确规定：“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对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建立定期的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等。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领导，保证了全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基础上的高度统一。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一贯教导全党要坚持这个原则。过去由于战争环境和地下状态，党内正规的民主生活不能不受到一定限制；又由于历史上的机会主义头子总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独断专行，破坏党内民主生活，破坏党委集体领导；又由于某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等等。上述种种不但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而且对革命造成了损失。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总结了我党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及时地提出了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的措施。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要求一切较巩固的解放区，各级党委要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党员的积极性，实现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监督党的领导。

毛主席还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应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集

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在这个时期内，由于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贯彻了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大大加强了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提高了全党的政策策略水平，保证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党在历史转折时刻，为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节 伟大的战略决战。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

解放战争第三年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革命气势锐不可挡。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到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为三百六十五万人。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工兵，积累了打阵地战经验，经过战争的锻炼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军事和政治素质；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以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为中心的几个点上，迫使敌人不得不采取“重点防御”。我解放区经过土改、整党、发展生产，广大人民参军支前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工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大区基本上联成一片，人民革命

统一战线更加扩大和巩固，从而为我军更大规模的作战，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沉重打击下，在蒋管区广大人民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的有力冲击下，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这一切说明已经具备了战略决战的客观条件和形势。但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只是具备了决定胜败的可能性，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只有决战，才能最后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

敢不敢和敌人决战，敢不敢夺取全国胜利，这不仅是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和焦点。伟大领袖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毅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适时地组织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

毛主席从全国各战略区的相互关联和战争的全局出发，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把战略决战首先放在东北战场。因为，东北形势对我特别有利，基本上完成了土改，有了巩固的后方，解放区联成了一片，经济上在全国各解放区居于首位，我军主力发展到七十万人，敌人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蒋介石正在拟定“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收缩计划，但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的决战时机，首先歼灭东北敌军，既可粉碎敌人的战略收缩企图，不令其跑掉；又可使我军实施战略机动，迅速入关，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还可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我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一九四八年九月，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广大人民支援下，发动了辽沈战役。

毛主席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及一系列电报中，

英明地规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充分估计到广大军民的革命能动性，提出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毛主席指出：**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规定的把主攻方向指向北宁线，是大胆地深入敌后作战，这样做能使敌军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使敌愈陷于被动；把主攻方向指向北宁线，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可使华北、东北两翼敌军互相孤立，有利于我军向两翼作战。

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在北宁线作战的关键是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锦州是连接东北和华北战场的战略要地，是敌人的致命点。打下了锦州，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就可以“关起门打狗”，置敌于死地，而且可以调动敌人，把龟缩在几个要点不大好打之敌，变成比较好打之敌，迫敌决战，从而达到在东北境内全歼敌军的目的。

毛主席制定前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东北战场作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但是当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林彪，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害怕敌人，不敢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提出了把我东北主力留在北线打长春的错误主张，并以种种借口反对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对林彪进行了多次的严厉批评，一再指示要南下北宁线，并要求据此“重新考虑作战计划”。

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克服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正确

她转向了北宁线，以神速的行动插入了南线。当我东北野战军歼灭了义县、兴城、绥中等城守敌，锦州陷于重围之时，蒋介石仓惶飞抵沈阳，调华北、山东之敌连同原锦西之敌，向我塔山阵地进攻，妄图解锦州之围。我军守卫塔山的部队，提出“寸土不丢”、“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斗口号，英勇顽强，经六昼夜的激烈作战，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疯狂进攻，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保证了攻锦作战的胜利进行。

敌人除向我塔山阵地进攻外，驻沈廖耀湘兵团，也由沈驰援锦州，被我军阻击在黑山、大虎山之东北地区。

正在此攻锦关键时刻，林彪仍不死心，先是提出打山海关，后却因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提出回兵北上打长春的所谓“建议”，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毛主席坚决驳斥了这种错误主张，详细分析了敌我情况，坚持预定的作战计划，保证了攻锦作战的胜利。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激战十一小时，全歼守敌，解放锦州，俘虏敌东北“剿总”付司令范汉杰以下十二万人。锦州解放后，敌人全线动摇，迫使长春守敌曾泽生率部二万六千余人起义，郑洞国宣布投降，长春遂告解放。

这时，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严令廖耀湘兵团夺回锦州。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后，立即向东北方向回师，十月二十六日，我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十余万人，并乘胜猛追，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十四万九千余人。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胜利，也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胜利。辽沈战役后，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数

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敌人总兵力下降到二百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却增至三百万人。我军通过这次战役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解放了东北全境，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条件，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一九四八年底中央军委决定把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东北的各野战军分别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兵团直辖于人民解放军总部，实行了统一的整编。

辽沈战役之后，我军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邱，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发起了淮海战役。当时在淮海战场上敌人兵力共六十万人，重兵集结在徐州地区，形成一点两线，便于机动和相互增援，妄图死保中原，以作为南京之屏障，并准备在战局不利之时，撤往江南，巩固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根据这一情况，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行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并明确指出整个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碾庄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歼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解放了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两侧、徐州以西以北广大地区，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作战计划，从而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形成了兵临江淮之势。

第二阶段，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十五日，中原野

战军在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配合下，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歼灭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其中一个师在战场起义；同时还歼灭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把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二十多万人包围在徐州西南的永城东北地区，解放了徐州。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到十日。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毛主席综观全局，为了麻痹平津之敌，不使其迅速海运南逃，命令淮海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消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的邱、李等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在此期间，二十万敌人被围困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一块狭小地区，又饿又冻，狼狈不堪。人民解放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战地反复广播毛主席为中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被围之敌在强大的军事包围和政治攻势下，拖枪投诚者络绎不绝。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平津战役的发展已使平津之敌无逃跑之可能，淮海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遂于一月六日向被围困之敌发动总攻，敌人迅速土崩瓦解。十日战斗结束，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历时六十五天，歼敌五十五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广大地区，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巢穴——南京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之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兵团发起了平津战役。当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淮海战场激战方酣，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此时，据守在华北的六十万敌军和其他地区蒋军在地域上的联系已被切断，处于孤立地位，“都已成惊弓之鸟”。敌人为了挽救败局，一方面企图原地固守，迟滞我军南下，以争

取时间，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经塘沽海运南逃或向绥远西窜，以作垂死挣扎。毛主席从战略全局出发，果断地决定在辽沈战役之后，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立即组织平津战役，并亲自制定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出了稳住敌人，不使逃跑，分割包围，就地全歼等一系列英明的战略部署。

平津之敌既已成惊弓之鸟，能否稳住敌人不使其南逃西窜，不使其收缩集中，就成为能否取得平津战役彻底胜利的关键。为此，毛主席令淮海战场我军，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暂留下邱李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令太原前线我军缓攻太原；令平绥前线我军对新保安之敌“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同时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予作准备”，防止平津之敌沿津浦路南下向青岛逃跑。这一些措施都是为了稳住敌人，牵制和拖住敌人，给我军集中兵力争取了时间，为对敌实行分割包围，就地全歼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前，就令东北野战军先遣队向北平附近速进。随后又令东北野战军主力早日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诸点，在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但林彪却制造种种借口，拖延入关时间，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经过毛主席多次督促和批评，林彪的借口一一破产，东北野战军主力仍按毛主席的指示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提前入关。

关于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行动方向，考虑到华北兵团已将敌主力三十五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切断了敌西窜的退路，“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

毛主席明确规定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断敌海上逃路，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兵团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然后各个歼灭。毛主席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就使敌人摸不透我军意图，完全陷于被动的绝境，成为欲收不能，欲逃无路，欲抗无力的“笼中之鸟”，便于我军克敌制胜。

但是林彪却违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先打南口的错误主张。毛主席批评这种主张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因为南口是北平北面的屏障，又是北平与张家口新保安间的必经之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如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过早地去打南口，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影响整个战役的进行。为此，毛主席严令“三纵决不要去南口”，坚决制止了林彪先打南口的错误。

在平津战役的最后部署完成之后，毛主席又及时地抓住全局的关键，指示我军要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这样就切断了敌人从海上南逃或向绥远西窜的逃路，我军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强大攻势，各个歼灭敌人。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围歼了新保安之敌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二十四

日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守敌五万四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在攻城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向坚固设防的“堡垒化”的天津守敌发动总攻，经二十九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陈长捷。我军打下两头后，北平之敌傅作义部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人。

平津战役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成为巩固的后方，为我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华北的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反革命军队，使蒋介石法西斯政权面临全面崩溃的境地，大大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兵民是胜利之本。解放区人民对三大战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各个战场上，配合我军作战的地方武装共达八十余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总数为五百三十九万余人。在战斗中，出现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事迹。辽西战役，部队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们路过苹果园，一个苹果也不摘，在枣树下休息，一粒枣也不拿。人民的军队，受到人民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拥护，抬担架、搞运输、修工事、筹备军粮、赶做军鞋被服，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的子弟兵。仅淮海战役支前的担架就达七万三千九百余付，各种车具十一万四千余辆，牲畜六千三百余

头，船只一万三千六百余只。广大民工和子弟兵并肩战斗，直接在前线执行各种战勤任务，保证了我军的供给和战斗的胜利。

二、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长江以北已全线崩溃，就是在长江以南也无力组织系统的防御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残余敌人进行若干次重大进攻，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完全垮台。总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但是，美蒋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感到继续用硬打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因此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美帝国主义此时也改变了它对华的政策，即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一方面继续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进行顽抗；另一方面又极力策划某些既同美帝和中国反动派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也要带上温和的色彩，以便保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蒋介石反动派取得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进行反扑，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加紧策动重开“和谈”的阴谋，妄图以“和平”攻势来挽救蒋家王朝的复灭。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之下，国民党匪首蒋介石演了一出战犯求和的丑剧。蒋介石装出一付无害而可怜的样子，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就在他的“和平”叫嚷中，提出要求保存伪法统、伪宪法和反动军队等等作为条件，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当时，民族资产阶级

中的一些右翼分子——所谓“自由主义”人士，也出来为蒋介石反动集团效劳。这些曾多次高叫“第三条道路”的先生们，此时又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装出一副“公正”的面孔，极力劝告我党接受美蒋的假“和平”，说什么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他们为了效忠美蒋反动派，竟然扯起孔孟的“中庸之道”破旗，散布“过犹不及”的反动思想，标榜自己对于国共双方是“中立的”，“不右倾、不左袒”，扬言走的是“中间路线”。其实，他们的既不过度又无不及而居其“中”的那套货色，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社会里，人都属于一定阶级，说话、做事都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根本没有什么“不偏不倚”的东西。当革命在迅猛发展，敌我双方力量消长非常分明的时候，那些标榜“自由主义”人士，要走“第三条道路”的先生们，大肆鼓吹“中庸之道”，宣扬“和平”、“公正”、“容纳异己”等等完全是一种政治阴谋。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妄图阻止人民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反对用革命的暴力彻底摧毁反动势力，为行将灭亡的蒋家王朝奔走呼号，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时也跳出来叫嚷“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不如慢一点”，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以适应美蒋反动派养好创伤反扑过来的罪恶阴谋。

这时，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尖锐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就在这个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发表了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文献中，毛主席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坚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新的“和平”阴谋和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本质，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毛主席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中，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是一分一厘一毫一丝也不会改变的。毛主席还用了一个农夫因怜惜毒蛇而被咬死的希腊寓言，极其生动的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真理：决不能怜惜象毒蛇一样的恶人，决不要被敌人的假和平和装作无害而可怜的样子所迷惑，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主席还尖锐地指出，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给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反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所以，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因此毛主席教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决不能听从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劝告”，决不能上反动派的圈套，应该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的声明，为了进一步揭露美蒋新的“和平”骗局，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

是和平的条件。全国人民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宣布：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主席在夺取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充分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我党提出的这八项条件是彻底砸碎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的条件，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的条件，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的条件。实现这八项条件，才能实现国内真正的和平。

毛主席的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彻底地击破了美蒋反动派的“和平”阴谋。在一星期以后，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继续进行阴谋活动。蒋介石表面“离职”，实际上退居幕后发号施令；李宗仁出面假意表示愿意以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骨子里却利用“和谈”，取得喘息时间，掩护战争部署，计划在三个月到六个月在长江以南重整军队二百万，妄想卷土重来，扑灭革命。

我们党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看得清清楚楚。为了揭露他

们的反革命真面貌，毛主席先后写了《评战犯求和》、《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一系列评论，针锋相对地采取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两手。在美蒋以“和平”、“民意”的幌子下玩弄缓兵之计，在“自由主义”人士高唱“和平”、“绝不用兵”的时候，我们党坚持把主要立足点放在用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基点上。谈判是为了更好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提高群众的觉悟，争取中间势力，促进敌人营垒内部的分化。我们两次公布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战犯名单，动摇和瓦解敌人；同时，我军民日以继夜的加紧渡江前的战斗准备，以便在谈判一旦破裂，就立即发起全面进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四月一日到十五日，我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最后修正案）。但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却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从而彻底显露了其假和平真战争的原形，美蒋“和平”阴谋宣告彻底破产。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一举

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千里江防”。渡江第三天，即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渡江之后，我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全国各地奋进，猛烈地追歼残敌。大军所到之处，人民欢声雷动，敌人望风披靡。

三野主力分东西两路追歼残敌，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七日解放绍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了蒋介石严令不惜毁灭一切死守六个月至一年的上海市及其外围的一切城镇，歼俘守敌十五万多人，摧毁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六月开始向福建进军，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

二野主力分兵多路，追歼向浙赣线溃逃之敌，五月上旬控制了南昌以外的主要据点，十七日解放九江，二十二日解放南昌。

四野于五月十五日在九江至武汉间百余公里战线上胜利渡江，并于十六日、十七日解放武汉三镇，接着南下湖南，八月四日湖南和平解放。九、十月与二野一部在衡（阳）宝（庆）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的主力，解放了湘南地区。十一月上旬向广西进军，二十二日解放桂林，二十五日解放柳州和梧州，十二月上旬入桂各路大军解放了南宁等地。

与衡宝战役的同时，二野一部与四野一部相配合自赣粤边境南下，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

与二野三野渡江作战的同时，华北各兵团于四、五月先后解放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地。

一野在五月下旬解放了西安及渭河流域广大地区以后，和华北两个兵团配合向西北进军，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

九月五日解放西宁。全歼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九月十九日和九月下旬分别和平解放绥远和新疆。九月底内蒙古地区全部解放。

十一月初二野主力与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以及一野一部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五日解放贵阳，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成都。与此同时，和平解放了西康和云南两省。一九五〇年四月解放了海南岛。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省和若干海上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破产，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激烈争吵。一九四九年七月底八月初，美国国务院抛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这本反革命的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恶毒的污蔑，表现了刻骨的仇恨。但由于杜鲁门艾奇逊等帝国主义分子为自己的侵华政策失败辩护，为了说服对手，不得不公开暴露若干反革命真相，这就使白皮书在客观上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自供，成为揭露美帝反动本质，教育对美帝抱有幻想的人们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及时利用白皮书这一反面教材，发动全国人民开展广泛地讨论和批判，新华社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六日接连发表了六篇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六篇评论，除《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余五篇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在这些评论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

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和总结。

在评论中，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社会矛盾，深刻地揭示出帝国主义反动派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略就有反侵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在驳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种种谬论之后，深刻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和压迫，为人民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同时也为人民革命准备了精神条件，使人民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一定走向胜利。“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中国革命曾经是依照这条定律，当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革命洪流也将依照这条定律。

针对美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毛主席指出美帝国主义从一八四零年帮助英国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止，这一百零九年的中美关系史，实际上是一部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罪恶史。但是帝国

主义进行侵略的时候总要玩弄欺骗手法，把侵略说成是什么“友谊”、“援助”。昔日美帝是如此，今日的苏、美两霸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也是如此。

美帝侵华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斗争下，终于宣告破产了。这样一来，美国的侵略政策会不会改变呢？不会的。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是要捣乱的。在白皮书中他们公开表示要利用中国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只有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打交道。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历史唯心主义去看问题的缘故。毛主席号召他们对帝国主义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主席在这些评论中还针对白皮书所暴露的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之为“人口太多”和“西方的影响”。毛主席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革命的发生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曾经从西方学来了资产阶

级革命时代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失败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其明效大验，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长征路上对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了这样大的作用，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为了从根本上批判白皮书，毛主席深刻说明了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白皮书中的历史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力图掩盖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从而歪曲了历史，以便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毛主席的五篇评论和对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帮助了那些动摇的人们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丢掉幻想，下定同美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从而有力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巩固了反帝爱国力量，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

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中国的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种形势

表明中国革命处于新的转变的关头，民主革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摆在党的面前。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我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适时地提出了促进民主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路线、任务、方针和政策。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首先必须消灭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毛主席总结了解放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决不可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但同时又指出，按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是一种斗争方式，要求我们注意和学会这种斗争方式，和反革命遗迹、反革命政治影响作斗争。鉴于国民党反动国家机器的被打碎，需要大量干部接管新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同时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把它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毛主席还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但又决不可

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

毛主席在报告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及时地提出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任务。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就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为了推进革命深入发展，关于依靠谁的问题，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还要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毛主席还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从旧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基本情况出发，提出了我党今后的战略、策略和正确的经济政策。没收帝国主义者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之转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允许其有利于国民经济一面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从几个方面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

要形式。这就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奠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毛主席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主席的这一论述，奠定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基础。

毛主席在报告中英明地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新的特点，提醒全党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指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们绝不可以认为反革命顺从我们了，他们的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就不存在，要警惕资产阶级施放“糖衣炮弹”，要准备一付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

最后，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和远大的革命目标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的这一报告是党在革命转变关头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是党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纲领。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具有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四、《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已基本上被推翻。此时，全国人民热烈盼望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民新政权。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党代表与到达哈尔滨的各界民主人士，对成立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进行了讨论和准备。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我党领导下，在北平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开幕典礼上讲了话，说明了筹备会的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筹备会结束后，便着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准备工作。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它的前途是什么？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怎样？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时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主席指出，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毛主席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年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

革命到达胜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结合中国特点而产生的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毛主席分析了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中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但“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敌对阶级说来，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文献中，痛斥那些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历代统治者吹捧孔孟的那套“仁政”，无非是为了愚弄和欺骗人民，掩盖他们反动政权的阶级性质。事实上，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国家政权以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仁政”。那些天天叫嚷施行“仁政”的反动头子们，无一不是依靠暴力来维持他们反动统治的。

毛主席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如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就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但在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和选举权。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对敌人实行专政，才有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只有对人民实行民主，才能对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基本纲领和政策，驳斥了反动派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进攻，大大加速了新中国成立的准备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了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了国旗，规定了国歌，北平改称北京，决定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

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并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宣告了美帝侵华政策的全面彻底的破产，给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巨大鼓舞和深刻影响，大大改变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
讨论稿

作者=

页数=362

SS号=12953946

DX号=

出版日期=1976. 10

出版社=南京工学院政教组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五四运动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

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节 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第二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第三节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

一、国民党背叛革命统一战线

二、两湖地区革命继续发展。陈独秀出卖

革命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第三章 土地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七月）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

二、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四、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

斗争

五、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第二节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一、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

二、古田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

三、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

四、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五、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

斗争

六、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七、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利

第三节 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

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

全国有利革命形势的丧失

三、毛泽东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

五、遵义会议——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的标志

第四节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一、四渡赤水。红军一、四方面军的会师

二、党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

三、张国焘路线的破产。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第五节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二、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三、红军东征和西安事变

四、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发表

第六节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新军反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

二、鲁迅在文化战线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三、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一

场斗争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九月）

第一节 全国抗战的开始。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一、抗日战争的爆发

二、洛川会议。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出现

四、《论持久战》的发表

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被克服

第二节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粉碎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

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

二、《〈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发表

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

四、《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五、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人民抗日力量的大发展

第三节 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斗争

一、解放区的暂时严重困难

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三、解放区军民粉碎日寇残酷进攻的英勇

斗争

第四节 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光辉文献的发表和整风运动的胜利

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党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斗争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解放区的大反攻。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人民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十月）

第一节 粉碎美蒋“和平”阴谋准备自卫战争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形势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发表

三、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

四、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破产。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第二节 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被粉碎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三、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第三节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二、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和整军运动

三、党的十二月会议。《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发表